

Turke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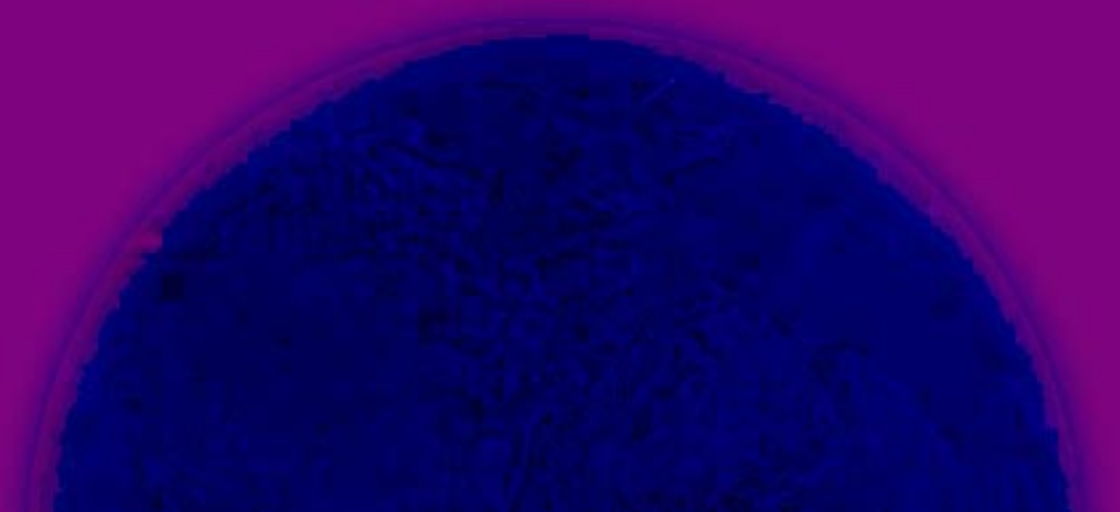
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丛书

从瓦解到新生

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

戴维森 著

道理很简单：奥托曼——土耳其的经历和中国委实太相似了，它历史上的每
一个国境和转折，都值得我们仔细思
量和反省。例如，我们向来认为日本
代化从门户开放的明治维新才不过
年，但鸦片战争之后我们新文化运
八十年才有辛亥革命，回头看土
然而与西欧战争对抗，绝不相
了解或战争的山塔之役，相当
战“土耳其革命”，却足足有
以上。



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丛书

陈方正 主编

从瓦解到新生

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

戴维森 著

张增健 刘同舜译 姚楠 龙协涛校

“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丛书总序

以西方眼光衡量，中国人常被认为过份倚赖与尊重群体；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却又十分自足，即使受到外界极大刺激或面对种种炫惑，也往往无动于中。从中国近代学术史的发展趋向来观察，这种看法似乎是不无道理的。在上一个世纪，讲求西学的前驱如魏源、王韬、郑观应等犹如空谷足音，响应乏人，固不待言。在本世纪西潮澎湃，德先生和赛先生被供奉起来，新思想靡然成风之后，纯学术的主流（这里所指，以人文学科为限）虽然视野扩大了，在方法上革新了，可是，就方向和领域而言，即始终没有大变。固执如辜鸿铭，或者在神州遭逢钜劫奇变之际甘愿身殉的王国维固然不待言，就是继起的陈寅恪、胡适之、梁漱溟、熊十力、郭沫若、冯友兰诸大家，乃至近数十年的许多博学鸿儒，无论才识如何卓越，见解如何不群，学养如何渊通，其为学用功的著力点却绝少有能翻出中土的经史、制度、词章、思想范畴以外。这和欧美、日本许多学者如饥似渴地终生钻研异域文物、典章，思想，乐而忘返，恰好形成强烈对比。

这一现象已经存在大半个世纪了，它恐怕并非由个人或者偶然性因素使然，而是与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有密切关系的。

这传统观念究竟是什么，很难确切说明。它可能是一种强烈的“返本归源”意识，可能是对“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潜在厌恶和恐惧，亦可能是历时已一个世纪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仍然在作祟。

无论其底蕴如何，其结果则是中国的人文学科始终保持近乎浑然一体的状态。西方有汉学、藏学、埃及学、非洲学，日本也曾经有兰学、阳明学、国学并存。至于中国，在大学里虽然也教授西洋史、西洋文学、哲学以及外语等科目，却似乎从没有希腊学、罗马学或越南学、日本学可言，甚至连有十分切身关系的（譬如说）英国历史或俄罗斯文化，在我们的学术传统中也并没有能占一席位，也不能成“学”（马列思想和相关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自是例外，但那有十分特殊的原因）。其所以曾如此，也许是由于欧洲和日本自古以来就习惯于不同文明同时并立，各自保存本来面目，而中国则从来只意识到其本身庞大和融合型的文明之存在吧。

无论其原因何在，中国人文学学术传统之重“本”轻“末”，重中土而轻四裔外洋，是不争的事实。这对于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深植广被，屹立数千载，自然有莫大关系。然而，不能否认，这对于当代中国，又是一个严重问题。图道罗夫（Tzvetan Todorov）在分析西班牙如何以三百勇士征服墨西哥数千万众之后说：“这惊人的成功关键在于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说来奇怪，那就是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也就是这一能力，使得“西欧三百五十年来同化别人，消除外在界别的企图，基本上得以成功。”也许，在二十一世纪行将来临之际，也是国人把心思从自我（the self）稍稍转移到别人（the other）身上，把目光从中土扩展到整个世界的时候了。

这套小小的丛书名为“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目的在于通过世界近代史译著，介绍自十七世纪以来受到西欧势力扩张影响的其他古老帝国的现代化历程，以及促成欧洲本身蜕变的一些深层因素。这两方面，我们认为，都是值得国人注意，而至今大部分还是被忽略的。这里所谓古老帝国，主要是指欧陆东北边缘的俄罗斯帝国，东南边缘的奥托曼帝国，西南端的西班牙帝国（它虽曾占欧洲权力结构的核心地位，但由于思想和制度停滞，到十八世纪中叶已被排斥于主流之外），

以及远东的日本帝国。它们的共同点是各自有悠久的传统与文化，和经过长期发展的政治结构与军事力量，因此具有抵受西欧冲击的相当能力，能够通过一系列反应与蜕变达到某种能够立足于现代世界，甚至与西方作一定程度竞争的状态。也就是说，它们都有一段和中国类似的艰困而漫长的现代化历程。这些历程的考察可以带领我们脱离华夏中心的世界观，令我们以更客观和实际的心态来了解、比较西方与世界其他文化、政治体系的互动。

至于欧洲本身的现代化蜕变，从发轫至今已经有五百年以上的历史。它的基本动力是国人长期探索的问题，但答案至今仍不十分清楚。从服膺于坚船利炮，到科学、民主和各种政治思想的提倡，乃至于今日的经济改革，无疑代表中国对现代社会认识的逐步深入与提高。但这些是否就是答案的全部呢？也许，在更深的层次，我们会发现，现代化并非单纯由一个或者几个固定因素造成，而是由许多在不同阶段各有重要作用的因素相互促进而推动的。麦尼尔在《竞逐富强》一书中对西方军事力量进步的研究便有这样的结果：军器的进步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科学发展四者有错综不可分割、互为因果的密切关系。这正如生物演化是整体的，不可能只是关乎某一个器官或某一生理系统的事。西方学者在这方面已做了许多细致而又深刻的研究，是我们亟需注意和了解的。在这套丛书中我们也朝这方向踏出了一小步。

当然，翻译只是学术工作的起点，它离开原创性研究和建立学术传统还十分遥远。但我们热切希望，它的构想和所提供的比较性视野能引起国人注意，能带来一个虽然微小、但仍然是新的开端。

编纂这套丛书的念头，始于1988年秋季，当时原意只不过是为一香港中文大学课程提供中文参考资料。这一计划自构思迄今，不知不觉已有七八年功夫，其间曾先后得到孔慧怡博士、李弘祺教授、青峰女士以及姚楠先生等的多方协助，但由于我们的经验和编辑力量不足，所以书籍的出版一直拖延，迟迟未能实现。倘若不是刘小枫博士

从 1993 年开始慨然大力帮忙，代为联络出版者并筹划校订事宜，而刘锋先生又大力协助校订的话，这套书的面世恐怕还将会是遥遥无期的。在此，我谨对以上各位表示最深切的谢意。

陈方正
1996 年 3 月

目 录

序	陈方正
前言	1
第一章 当代土耳其	1
第二章 从草原到帝国	20
第三章 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 (1453—1566)	45
第四章 信仰与国家的衰败 (1566—1792)	73
第五章 西化的开端 (1789—1878)	92
第六章 从专制到革命：阿布杜尔哈密德二世 苏丹时代 (1878—1909)	124
第七章 从帝国到共和 (1909—1923)	147
第八章 阿塔图克的土耳其 (1923—1938)	170
第九章 阿塔图克以后的土耳其	190

序

从十九世纪中叶以至本世纪初，土耳其一直是国际政治问题的焦点，而在最后关头把它从被瓜分命运挽救过来的凯末尔将军，也曾经成为孙中山先生所仰慕的英雄。但时至今日，一度令欧洲战栗的奥托曼帝国早已烟消云散；而在一般人心目中，剩下的土耳其共和国只不过是旅游胜地而已。那么，重温这古旧国家的历史、制度、人物、文化，除了作为专业学术研究之外，究竟有没有实际意义呢？

答案是肯定的，道理很简单：奥托曼—土耳其的经历和中国委实太相似了，它历史上的每一个困境和转折，都值得我们仔细思量 and 反省。例如，我们向来为中国现代化觉醒的缓慢感到气馁，认为日本从门户开放到明治维新才不过十四、五年，但鸦片战争之后我们等了足足七八十年才有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然而，回过头来看土耳其，它虽然长期与西欧争战、对抗，绝不能说缺乏了解或争强意识，但从它相当于鸦片战争的山塔之役（1697）到相当于辛亥革命的“土耳其青年”革命（1909），却足足有两个世纪以上。这中、土两国之间的惊人差异只是由领导人物的见识、魄力不同所造成，抑或有更深刻的结构性因素（例如人口、文化、社会组织等等）在起作用呢？那显然是不能忽略的。

又例如，最近有人质疑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意义，认为其推翻传统体制和文化的激烈手段是错误的，应当效法明治维新那种温和渐

进的稳步改良方针才对。明治维新是否真是温和改良姑且不论（这其实是大可商榷的），不应当忘记的是：奥托曼帝国曾经在帝制和伊斯兰国体不变的大前提下，由苏丹和军人推行多次渐进式改良运动，前后达八十年之久，结果却全部归于失败，至终仍有待凯末尔以民族英雄和军事强人的姿态来扫荡旧体制，来发动在许多方面其激进远过于“五四”的文化变革，这样才建立起能够稳定发展的新共和国。这和中国在过去百年间的历程对照，不也显示出相当重要的相似性甚至必然性吗？

而且，奥托曼—土耳其的启示并不限于过去，也涉及当前和未来。在本世纪初，土耳其少壮派军官发动革命，迫使苏丹恢复君主立宪体制，好像带来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然而，当时还隶属于奥托曼帝国的巴尔干诸邦却深恐改革成功，帝国转弱为强，遂急急两度发动猛烈的独立战争，由是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帝国解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过去半个世纪整个中东的动乱，乃至今日巴尔干半岛持续不断的酷烈民族冲突。这对今日的中国，恐怕也应该有不少警惕作用吧？

再者，二次大战之后，在美国的压力和诱导下，已经专政将近三十年之久的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同意举行大选，并且在大选落败后自动和平交出政权，这在政治史上不能不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然而，民主体制却并没有因此确立：由于腐败政党的威胁，在过去半个世纪间土耳其又再经历了足足三次军人政变和修宪，情势才算是慢慢稳定下来，一种新的国民政治共识才逐渐生根。但甚至到了现在，其前途却也还不能算已经完全确定——今年以伊斯兰教义为号召的“真道党”（True Path Party）之在大选中获胜，从而打破六十年来的立国原则，那就是一个十分令人注目的信号。从人口和经济规模来看，土耳其最多只不过相过于广东一省而已，它的政治问题比起中国来，应该简单得多。那么，它这一番崎岖曲折的政治发展，不也多少显示中国今后还有极其复杂困难的路程要克服吗？

在有关现代土耳其的书籍之中，路易士的《现代土耳其的兴起》（Bernard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北京商务已出版了范中廉的中译本）是非常之深刻和有见地的。然而，这基本上是一本史论性质的著作，批判与剖析远多于有系统的史事叙述。因此，不熟悉奥托曼漫长历史的读者对之难免感到困惑。我们这一套丛书所选两本有关土耳其的著作之中，《帝国的剖析》是一本简短清晰的奥托曼帝国前期发展与制度简史，《从瓦解到新生》则是帝国毁灭与土耳其共和国诞生的演变史，两者合起来恰恰可以有系统地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的历史背景，从而弥补上述缺憾。藉著这两本小书，我们深望能够引起国人对这一个长期在摸索中前进的民族产生兴趣与了解，并且在比较与反思中汲取教训。

陈方正

一九九六年六月

前 言

土耳其共和国于 1923 年成立。它经过争取民族独立的艰苦斗争，在历时六个世纪的奥托曼帝国废墟上崛起。现代的土耳其在很多地方继承了奥托曼帝国人民、制度和文化的传统，同时也有很多重大的变革，成为一个新国家。现代土耳其的继往与革新是本书的主题。本书概述奥托曼帝国的兴起、繁荣鼎盛以至没落的历史，并特别详述帝国后期历史与共和国历史的重要部分——西化的过程，另外，帝国与共和国之对外关系，对土耳其的发展，亦至为重要，这些情形则交织穿插在文中。本书对 20 世纪的土耳其有广泛的探讨。

奥托曼帝国覆亡后的半个世纪内，土耳其人取得的成就是独特可贵的：在发展中国家，独裁政府让路给民主政府与竞争的多党政治，就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颇为罕见的，同时亦给共和国造成许多特殊问题。如果土耳其人能在不回复到独裁统治的情况下，坚持不懈地建立雄厚的经济和稳定开明的社会，他们将再次展示自己的杰出才能；过去，在缔造奥托曼帝国的过程中，他们也曾多方面展现过这样的才能。他们有几个世纪的经验可供借鉴，也有新的理想鼓舞他们向前，但前面的道路仍然坎坷崎岖。他们知道这一点，所以经常引用共和国缔造者阿塔图克的话来激励自己：“土耳其人，自豪吧！努力干！要有自信！”

本书的资料，不少为前代学者的心血，于此谨向前贤致意。而数位友好批评家提出的尖锐意见，我的家人和各位编辑的耐心，以及苏

珊·麦杰尔出色的打字工作，亦至为感人，谨此一并致谢。

戴维森

1968年2月于华盛顿

第一章

当代土耳其

每年 11 月 10 日上午九时零五分，土耳其境内一切活动均暂时中断。车辆停止行驶，乘客走出车来，悄然肃立，举国上下默哀五分钟，以纪念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第一任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的忌辰。

阿塔图克于 1938 年辞世。现代土耳其民众，多是在他辞世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只是通过学校教育和民间传说才知晓阿塔图克其人其事的。然而土耳其至今仍受到他深远的影响。他的画像到处可见，虽然土耳其在他死后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但这个国家所遵循的，基本上还是他生前制定的指导方针：建立及捍卫疆域有限的土耳其民族国家；启迪土耳其人的民族意识；摆脱伊斯兰教对国家、法律和教育的控制；不单要物质生活西化，社会制度、人们的思想以及风俗习惯也应西化；迅速发展经济；避免阶级划分，增强团结观念；忠于共和政体；最后，努力建立和睦的外交关系。当然，倡导并制定这一系列方针，并非全是阿塔图克一人的功劳，再

说，若非前人一百年来致力改革而奠定了基础，他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建树。但他毕竟是建立现代土耳其的主要推动力，而上述某些目标，尤其是建立民族国、政教分离和共和政体这三项目标，纯是他个人的创见。综合阿塔图克所制定的各项方针，有助于我们观察今日的土耳其。

土耳其民族国 今日的土耳其民族国，结构坚实，领土基本上限于土耳其人聚居的区域。土耳其的疆域包括欧洲东南的一角，——色雷斯，但它的主体则是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高原，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等咽喉通道的另一边。土耳其的总面积几达 30 万平方英里，略大于得克萨斯州，约等于法国与大不列颠两国面积的总和，远远比不上当年庞大的、异族杂处的奥托曼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托曼帝国进一步分崩离析，现代土耳其即在其废墟中崛起）。土耳其共和国已不再背负古老帝国的包袱。现在的疆土更易于管辖和防御。今日土耳其国土的主体安纳托利亚高原，由树木葱茏的爱琴海岸及沿海的良港，向东延伸，横贯地势崎岖的中部高原，直至东部的山地（其最高点是大阿勒山，西方人士一般称之为阿拉拉特山）。这一带本是塞尔儒克突厥族——奥托曼土耳其人的祖先——定居的地方。当年奥托曼帝国由此地向外扩张，如今此地又成为共和国的心脏地带。从前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在欧洲的海岸，现在它仍是土耳其的第一大城市，拥有近 200 万人口。但共和国的象征，则是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首都安卡拉，它在最近半个世纪里，由一小镇迅速发展成一个近百万人口的大城市。

土耳其是土耳其人的国家。据 1965 年人口普查报告，全国居民约 31391000 人。目前还没有上述总人口的 language 分类资料，但以土耳其语为母语的居民，必定在 90% 以上，因为根据 1960 年人口普查报告，当时已达到这个百分比。至于其余的居民，1960 年有 6% 以上操库尔德语。还有一些为数更少的居民说阿拉伯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拉兹语、“犹太语”、乔治亚语、切尔克斯语、保加利亚语或克罗地亚语。这一小部分人的祖先，有些是被奥托曼土耳其人所征服的；有些则是为了逃避西方基督教国家、沙皇俄国或苏联政权的迫害，而在 16 至 20 世纪中某个时期逃到土耳其栖身的。与其奥托曼祖先相对照，土耳其共和国最大的特征就是民众语言的单一性——尽管还存在着方言和口音方面的某些差异。这个国家的人口，主要由成长中的年轻一代组成。有一半以上的人在 15 岁以下。共和国建立后的头 20 年，很多人担心人口不足。但近年来，人们转而担心人口过多。每年 2.5% 至 3% 的人口增长率已促使政府着手推行一项控制生育的庞大计划。

土耳其民族意识 土耳其人深具民族意识，即土耳其民族感。这并不是说，他们都是中亚细亚突厥族一脉相传的后裔，有纯血统的土耳其人，尽管有些家族取了“厄兹丘尔克”（“纯土耳其人”）这个的姓氏。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通过联姻和皈依伊斯兰教，土耳其人已在很大程度上与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半岛的民族融成一体。今日共和国激发的，不仅是对突厥族早期历史的兴趣，还有对突厥族来临前安纳托利亚各部族历史的兴趣。这段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特洛伊人

和赫梯人。其后迁徙来的民族，包括突厥族人，都无可避免地从特洛伊文化、赫梯文化及其后代那儿吸取到不同的特性。现代土耳其人的土耳其民族意识，是对土耳其文化——特别是语言——一体性的认识，对共同历史的认识，简言之，是对土耳其民族共同性的认识。这种整体意识；是到共和年代才奠立的。这方面的工作尚未完成，有些土耳其人还没有那样的意识。

在奥托曼帝国时期，一个土耳其人可能视自己为回教徒，奥托曼苏丹的臣民，或是某一地区的人，很少会视自己为土耳其人——“土耳其人”一词，是当时受过教育的奥托曼贵人对未受过教育的土著或乡民的蔑称。通用的土耳其语里，掺杂大量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来的词汇，因此作家和政府官员使用的那种书面语，一般乡民是看不懂的。在奥托曼帝国后期，已着手简化语言，到了共和年代，更加速这方面的工作。语言“纯化”运动在 20 世纪 30 年代达到高峰，即使日常通用的一些阿拉伯语的词汇也一律用陌生的土耳其语词汇替代。虽然这个语言“纯化”运动现已缓慢下来，在 60 年代，仍在用土耳其语逐步替换阿拉伯语词汇。政府不时颁布告示，称政府已通过法令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土耳其词语。语言固然是土耳其民族意识最明显的标志，但近代土耳其民族主义绝不止于语言的“纯化”，而是植根于忠于民族国的共同信念。今日受过教育的土耳其人，首先会视自己为土耳其人，然后才会想到自己是回教徒或某地区的人。未受过教育的村民也越来越倾向于这种想法。

摆脱回教的束缚 现代土耳其是个政教分离的国家。

回教对公众生活的束缚已告解除。但官方的非宗教政策并未改变人民的宗教信仰——土耳其 99%的居民都是回教徒。虽然一些受过教育、居于城市的回教徒，和其他国家受过教育、居于城市的基督徒一样，在思想和习惯方面并无明显的宗教色彩，但回教的影响还是很强的。回教的迹象比比皆是：不单有昔日的清真寺，还有新建的清真寺；斋月的白昼禁食；一船船、一车车去麦加圣地朝拜的善男信女。日常生活中人们不时说“如果真主愿意”之类的词句；尽管法律明文禁止一夫多妻制，但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已婚女子还是多于已婚男子；一艘新购置的驱逐舰，桅杆上会高悬着一本《可兰经》。1950年以来，在公开场合举行宗教仪式，遵守一些惯例的现象，益见普遍，而且也更为政府所支持。宗教仍能掀起反动的政治运动。

然而土耳其至今还奉行阿塔图克在 20 年代制定的政教分离方针。过去曾是最庞大的回教帝国，如今则成了世俗的共和国；过去的苏丹声称自己是全体回教徒的“哈里发”（教主）；如今则既无苏丹，也无“哈里发”，只有一位不担任任何宗教职务的总统。过去法律依据的是“谢里亚特”——回教的法律；如今的法律则是根据西欧世俗法典修定的。过去教育主要是宗教教育，为回教学者所把持，并由宗教慈善基金资助；如今教育则已世俗化（尽管小学恢复了宗教课程），而教师本身自小亦受世俗教育，并由政府付给工资。

土耳其的西化 现代土耳其属于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可以说，自从土耳其人离开中国边疆向西迁徙、自从他们舍黄教和佛教而接受西方主要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那天起，就

始终面向西方。也可以说，奥托曼帝国始终是属于西方的，因为它所建立的基地，是拜占庭的核心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半岛，而不是回教最初的大本营阿拉伯和波斯。但自 16 世纪以后，奥托曼帝国和西欧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这道鸿沟并不限于回教同基督教的分歧，但却因两者的分歧而加深。这道鸿沟在技术和工业方面——在工厂、武器以至小玩意、衣着等物质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几乎同样明显的，而且更为重要的分歧，是人们对变革与进步，以及科学、教育、商业的态度。从 18 世纪后期开始，奥托曼帝国的君主和政治家有意识地而且有增无已地努力用不同办法消除这道鸿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奥托曼帝国已相当程度地西化，而在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西化的步伐越发加快了。

如今物质方面的西化，已是一眼可见，尤其是在大城市里。在伊斯坦布尔，西方式的交通挤塞已属常事——但如果你避开埃及商场前凝滞不动的汽车群，在商场后较窄的街中，还是会陷入纯属东方式的马车阵里，动弹不得。电冰箱、收音机、录音机、洗衣机、最新的抗生素品种、形形色色的塑料小玩意等，也越来越普及，其中不少均为当地产品，并非由国外进口。

整个政教分离的进程，也是西化的一部分。公立学校体制也像法律体系那样，一开始就是按西方模式（在这方面主要是按法国模式）规划的。学校不单是西化的标志，也是西化的主要媒介，以 1928 年采纳的欧化新字母传播知识。在知识普及方面，土耳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民众识字率现在已上升近 50%。大学也是采取西方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

前，全国只有一所大学，设在伊斯坦布尔。到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全国已有 7 所大学，包括两所专科技术大学。学习西方语言也日益普遍，二次大战前主要学法语，战后则主要学英语。土耳其的语言，夹杂不少外来语。有一个时期西化似乎“化”过了头，诸如 *fiar*（晚上）、*garshefi*（车站站长）、*bröve*（专利）之类的词，尽是从法语中套用过来的“进口货”。二次大战期间，土耳其作家纳米克·昌其抱怨说：“我们试图把自己从阿拉伯沙漠和色拉子花园中解救出来，却一头栽入巴黎拉丁区的迷宫。”不管怎么说，数以百计的西方词语，如 *futbol*（足球）、*parti*（社会聚会）等，已在大众语言中牢牢生根。时下，西方音乐与土耳其的民间音乐同样流行。先锋派戏剧、绘画、雕塑、诗歌、小说，源源不断出自欧化艺术家的手笔，他们中有些人已臻西化的极点，现正自觉地复兴舞蹈、设计和曲调方面的“民俗”主题。

现代土耳其的西化程度，可以用一组三重的对比尺度来衡量——按地理，东部较之于西部；按人口，城市较之于乡村；按社会地位，男子较之于女子。一般来说，土耳其靠近欧洲的地区，西化程度高于邻接伊朗边境的地区。例如在 1963 年，伊斯坦布尔有 16170 辆私人汽车和 12370 辆计程车；而宾戈尔省只有 1 辆私人汽车和 2 辆计程车。当然上述数字主要显示两地不同的道路和财富状况，但由此我们也可约略看到两地的教育以及观念西化程度的差异。1966 年东部地区两个相邻的省份穆什和埃尔佐鲁姆发生灾难性地震，那里的落后状况始完全暴露。

城乡之间的悬殊差别，也可就物质生活加以鲜明描绘，但

人们对宗教、社会的态度，同样能反映出城乡的差别。1950年马卡尔所著《我们的那座村庄》出版，在城市的有识之士中轰动一时。作者是一所乡村学校的年轻教师，他以现实的笔调，刻画出农村物质的匮乏，同时展示了人们头脑的贫乏——村民的多疑、无知和迷信。土耳其的许多城市居民，和其他各国的、甚至是美国的城市居民一样，对一些贫困、缺乏教育的穷乡僻壤根本一无所知。今日土耳其的科学家、医生、企业家、管理人员、学者、工程师和商人，虽然从数量上说仍不能满足国内的需要，但就水平而论，不管用何种西方尺度来衡量都是属于上乘的；可惜的是，土耳其苦于社会发展不平衡——所有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尤以发展中国家为突出。有成就的人不是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就是去国外寻求更广阔的发展天地，以及更优厚的待遇，不愿在本国的城镇或乡村工作。“人才外流”是个棘手问题。据1965年的统计数字，在国外执业的土耳其医生有二三千名，而无数的土耳其村庄却连一名医生也没有。

至于男女地位的差异，则随着社会等级的下降而越见明显。各项专门职业和商业工作是向妇女敞开大门的，好多妇女在这方面也卓有成就。妇女却不能像男子那样完全按自己的心愿行事，即使在有良好教育的城市妇女中也是如此；至于在外省小城镇中的妇女，仍然受到传统习惯的约束，在公众场合也许还得把脸蒙上。农村妇女在这方面倒能享受多一点的自由。

无论如何，西化纵使并非全面，却已是一股观察得到、持续不断的潮流。西方化始于19世纪中叶，时下已是势不可挡。

它并不是依照某个西方国家的典章制度依样画葫芦，而是糅合西方与土耳其文化，别创一格。

经济发展 随着现代土耳其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出现了各种问题。土耳其 3/4 的人口从事农业，提供粮食和主要出口物品——棉花、烟草、水果。自 1948 年以来，农业生产每年增长 4% 左右，稍稍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60 年代后期，土耳其的农业仍然有待发展。这里有机械化的问题，要用拖拉机替代传统的铁头木犁和嘎吱作响的牛车。拖拉机已经相当普遍，1963 年全国已拥有 50000 台，而在 1948 年仅 1750 台。这里也有妥善使用、维修拖拉机和其他农机的问题。拖拉机已成了身价的象征。拥有拖拉机的农民有时试图拿它来参加赛跑、拔河，或者驾着它进城看电影。发展农业生产还有其他一系列的问题：如何引水灌溉较为干旱的中部高原，如何进行土地改革，使无地农民安心务农，如何阻止肢解小块农田，以便建立在经济上有生存能力的生产单元等。显然，与奥托曼帝国后期相比，一场农业革命正在进行之中，当然也还有许多工作有待于完成。政府中、报纸上展开的争论表明，这些问题已得到普遍重视。

工业化也在迅速提高；农业出口收益越多，能用于机械工业投资的外汇也就越多。时至今日，土耳其才开始出现工业革命的势头。在奥托曼帝国时期，尽管偶尔也作些努力，但大型工业的发展，微乎其微。眼下，土耳其拥有两座大型钢铁厂，分设在卡拉比克和埃雷格利，后者于 1965 年才点火开工。电力也在持续增长；由于幼发拉底河克班拦河大坝工程已于 1966 年奠定基石，电力的大幅度增长已是指日可待。除

了生产纺织品、水泥、玻璃和其他工业品之外，1965年又生产出第一辆国产汽车——阿纳多尔牌汽车（纤维玻璃车身），大部分汽车零件均系当地所产。铁、煤、铬、铜、石油等矿物资源正在开采。一条长300英里，由巴特曼炼油厂通往伊斯肯德伦港口的输油管，已于1967年投产。工业化也有它自身的问题：资金的筹措；工业的设置——所设地区是根据经济合理的原则，而不是出于政治或战略的考虑；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的培养；挣脱官僚主义的控制。

土耳其所发展的经济，是国家资本主义与私人企业的混合体。尽管国家社会主义——在国家指导和控制下发展经济，并由国家提供资金——是30年代所定下的基本准则，如今部分还在起作用，但在具体实践中更注重实效，而不是教条主义式生搬硬套。1963年以后制定的两个五年发展计划，其目标是要达到7%的年增长率。今日去土耳其游访的人，既对此表示怀疑，又会产生谨慎的乐观主义情绪。经济发展问题确实不少，但机会也同样很多。某些实业家认为这个国家正处于经济起飞的起点——资源就蕴藏在那儿，技术在发展，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要求有待于满足。同其他中东国家——那些石油最大储存国除外——相比，土耳其前程似锦。

促进社会团结 现代土耳其是个没有阶级偏见、却有着森严社会等级的社会。这个貌似自相矛盾的论点可以用下列事实来解释：尽管社会各集团之间切实存在着种种分歧，但是土耳其人并不是按阶级来看待自身的——政党也不是按这种方式组建的；共和体制的意识形态避免作这样的区分，因而具有较大的、而且日见增长的社会流动性。从奥托曼帝国

立国初期起，某个适逢其时的个人，也可能凭借战功、教育、宠幸或是机缘，平步青云，登上显赫的高位。今日的试金石则是教育。凡是受过中等教育的人，都能在政府机构、工业或商业部门找到施展身手的机会。直到不久以前，公立中学毕业生一经应征入伍，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军官。公立中学毕业生在整个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但这个数字历年都在增长。文盲家庭的子女上学念书也越来越普遍这么说来，土耳其存在着一个受过教育的特殊阶层。其实总是有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特殊阶层。纵观土耳其的全部历史，这个特殊阶层始终是社会的统治成分和推动因素。最初，它由军官和政府官员组成，到了奥托曼帝国后期，开始把记者、律师、医生也包括进来。土耳其共和国从奥托曼帝国手里接过了这个统治阶层——90%以上的总参谋部军官，80%以上的训练有素的帝国官吏，1918年以后继续在土耳其留任，而没有在帝国瓦解后的其他后继国家供职。共和国五任总统中有四位是以前帝国的将军。这些人都是惯于指挥调度、管理行政、处理公众问题的老手。共和国无须重起炉灶，另搞一套班底。自然，并非所有的军官和官员都是目光锐利、廉洁奉公、一心为民造福的干才。土耳其人也如普天下芸芸众生一样，对官老爷怨声载道，抱怨他们因循守旧，作风拖拉，只会说“不”，净是在规章条文和官方文件的片言只字上小题大作。小官僚常是受人嘲笑的对象，在人们眼里，他们就喜欢拿腔作调，一心只顾谋私利。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坐上办公桌，成大角色。”不过事实证明，最高领导层总的来说还是很有才干的。要是没有这样的领导集团，土耳其历史就无法解释了。过去

二三十年来，这个特权阶层把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特别是律师——还有实业家网罗了进来。

杰出人士多集中在城市。从前面有关伊斯兰教、西化以及经济发展的诸段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土耳其社会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大城市与外省乡镇之间的明显差异。近年来，土耳其也受到迅速都市化浪潮的冲击。据 1955 年人口普查报告，10 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 6 座；1960 年统计有 9 座；到 1965 年，据报告已有 14 座。一些人口规模较小的城市，差不多也以同样的速度在增加。城市数量的增多，主要是由于乡民的不断流入。土耳其各大城市的边缘，布满了占地而居的群落，其成员都是新近从农村流散来的。这些占地而居者与其说表达了对农村贫困的绝望，还不如说表达了一种寻求工作和教育机会的事业心。他们中许多人愿意流落到大城市来，而不愿去离家乡较近的外省城镇，这不仅仅是为了寻求机会，而且还因为小城镇的社会风习更因循守旧，不符合他们的口味。他们的到来迅速壮大了城市贫民——“戴便帽者”——的队伍（与“戴便帽者”相对应的，是比较老于世故、比较富有的“戴礼帽者”）。但是“戴便帽者”并非是普遍意义上的工业无产阶级，其中不少人不久前到西欧国家，特别是西德，干了几年非技术或半技术的工作，积攒了点钱财，然后又回到土耳其来。工会有所发展，时而也发生些小规模罢工，但是要说城市工人中有什么团结观念，或是形成了什么表现团结观念的群众组织，那可是将来的事了。显然，城市还算不上社会单元，而是和往昔一样，无非是住所和社区的集成。城市的基调仍由上流人士所定；对照乡村，差别可谓

十分鲜明。

土耳其总理德米雷尔 1966 年在国会演说中指出：土耳其 35000 个村落，居住着 2000 万乡民，但大部分农村缺少公路、水利系统、学校和保健设施；好多乡村至今仍用不上电。许多乡民备受贫困的煎熬，囿于无知和迷信的高墙之中。许多村民饱尝无地即地主所有制之苦。一批关注社会问题的当代土耳其文学作品，其中多数采取小说或短篇故事的形式，以同情的笔调描述农民的命运、鞭挞地主，有时还赞扬当地罗宾汉式替天行道的绿林好汉。然而，随着公路的兴建、公共汽车的通行以及无线电的使用，每年都有更多的村落与外部世界建立了联系。再清楚不过的是：村民们正在逐渐觉醒，唤起了新的意愿和新的需求。这反映在二次大战以来土耳其的各项政策之中。

土耳其的共和主义 现代土耳其采取的是共和政体和民主的多党政治制度。这一成果来自于一个世纪的演变、几场革命以及一次世界大战末土耳其战败并险遭没顶之灾的惨痛历史教训。1876 年，奥托曼帝国成了第一个接受成文宪法和议会实体的穆斯林国家。而现行宪法是在 1960 年革命之后，于 1961 年制定的。在 1876 年至 1921 年这一时间跨度内，作过许多尝试，也学到了不少东西。1876 年的实验，产生出一个由至高无上的苏丹统治的君主立宪政体。1908 年“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之后，苏丹的权力削弱了；然而只是在阿塔图克的领导下，才宣布民众享有绝对主权。自 1923 年共和国成立以来，对民众享有绝对主权这一点从未有过异议。有二十夺年，由一个政党实施民众主权。第二次大战结束时，多

党政治取代了一党制。经历多次危险，多党政治还是幸存了下来。受到来自极左或极右集团的两方面挑战，土耳其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不但要把占统治地位的杰出人物，而且还要把广大市民、农民和城市工人，融合在秩序井然的多党政治之中。

1950年，民主党通过和平选举，推翻了过去一向是共和人民党一统天下的局面。自从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选举之后，农民发现了自己的政治力量。阿塔丘尔克以前曾说过：“农民是我们的主人。”一些城市杰出之士把这看作是幽默的夸张；但他们现在也只得万般无奈地承认，这话近乎真理。农民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仍持传统的怀疑态度。在他们眼里，所谓政府，无非就是那些收税人和拉壮丁的警官。但是他们也需要政府给他们带来的物质便利——农业资助、公路、学校和保健设施。一个多世纪以来，先是奥托曼帝国，尔后是共和国，逐步扩大了政府的活动范围，不再仅仅局限于征税、司法、治安、保卫疆土等传统职能。现在农村也能点点滴滴地享受到某些其他好处。政客为了诱使农民投他们的票，免不了要作一番许诺。无线电广播很起作用。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一个民众社会正在缔造过程之中，而乡村咖啡室里的收音机也从旁助其一臂之力，因为它使一代文盲能在识字读报之前就骤然跃入全国性生活热潮之中。1963年土耳其登记在册的1816000台收音机，将近有1/4在农村。

土耳其的政治生活有时也会风云骤起——不单是大国民议会中的激烈辩论，还有势不两立的政党、名人在报纸上的相互攻讦。观点上的冲突会导致行动的终止，从而出现停滞

不前的局面。再说，一党统治的传统也有可能死灰复燃。然而，从整个情况来看，土耳其人似乎决意让多党民主奏效。在此期间，军队一直置身于政治之外，但仍作为共和国的捍卫者留守在边界线上。军队在若干紧要关头也出面干预过土耳其的政治。最后一次是在 1960 年，当时它废黜了镇压反对派的民主党政权。军队是否会再次进行干预，这取决于政治领导的质量和共和国政治生活的气氛，固时也取决于政府能否有效地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

土耳其的对外政策 现代土耳其的对外关系是平和的，它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是良好的。奥托曼帝国与其邻国连年战火不断。1922 年土耳其人赢得了争取独立的斗争之后，共和国一直处于和平状态。它的目标是保持绝对的独立和国土的完整，这一目标已经成功地加以实现。在土耳其的六个邻国（苏联、希腊、保加利亚、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中，苏联的威胁最大。二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保持中立，大战结束时，苏联人对土耳其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割让领土并给予他们保卫海峡的特权。过去两百多年来一直承受到这种压力，再加上俄土两国多次交战的这段历史，不能不使土耳其人特别小心提防。所以他们在 1947 年以后一直接受美国的援助，以维持一支相当规模的军队，另外还接受其他的经济援助。土耳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

到 1964 年以前，土美关系一直很密切。打那以后，土耳其政府虽然对美国仍然十分友好，但是开始着手缓和同苏俄的关系，苏俄放弃了箭拔弩张的威胁姿态，而且主动表示愿意提供经援。1966 年土耳其外长说：“我们穿的不是同一颜色

的衣服。”不过，他接着又说，同苏联建立睦邻关系还是有可能的。土耳其另一个邻国希腊，也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土希关系一向不错，可是到了1963年底在塞浦路斯问题上重又爆发尖锐冲突，1967年再次发生冲突，关系遂趋于紧张。塞浦路斯引起了土耳其学生的反美示威，因为在这场争端中美国没有支持土耳其。但土美关系的紧张，还有其更深刻的原因。美国在土耳其的经济和军事存在过于明显，而对任何一个大国的过分依赖势必要招致怨忿。同样，以往的史实有助于解释这种反响：奥托曼旧帝国深受西欧列强经济奴役和治外法权之害，饱尝政治、军事干涉之苦，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土耳其人极其敏感，必须维护主权和独立的完整，绝不能有丝毫损害。

土耳其与其他四个邻国的关系，各有不同。和伊朗的关系一般说来还不错。两国都是军事经济合作同盟中央条约组织的成员国。长达数世纪的土伊边境冲突不复存在。在最近几年，与共产党集团成员保加利亚几度出现过紧张关系，不过两国关系也很容易得到改善。伊拉克和叙利亚给土耳其提出了特别的难题。这两个阿拉伯国家近年来都得到苏俄的支持。土耳其人很清楚，如果俄国人不但从苏俄边境，而且还在邻接伊、叙两国的土耳其南部边境施加压力，那么他们就会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与此同时，安卡拉政府不但谋求同伊叙两国，而且还要想方设法同包括埃及在内的所有阿拉伯国家（过去几年内土埃关系十分冷淡）达成更大程度的谅解。土耳其人承认以色列，而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均不予承认；此外，在塞浦路斯问题上，他们还需要阿拉伯国家穆斯

林兄弟的支持。60年代中期，土耳其派出亲善代表团去若干阿拉伯国家访问。接着又进行其他正式访问。土耳其—阿拉伯国家关系改善所面临的障碍，是阿拉伯国家对过去的历史事实仍耿耿于怀：它们受奥托曼土耳其的统治长达四个世纪之久。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稳定 and 经济发展，将大大有助于土阿双方关系的改善。

在这个充满紧张不安的世界上，土耳其正在奋力前进。由于它在共和国期间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由于通过学术研究，世界各国对土耳其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西方人彻底改变了对土耳其人的陈旧看法，不再把他们看作是“野蛮人”、“破坏者”。而1919年协约国在回敬参加巴黎和会的奥托曼帝国代表团时会说过这样一段话：

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亚洲，或是在非洲，都找不到任何事例，可以说明凡是土耳其曾确立其统治的国家未曾出现过物质繁荣的消退，未曾出现过文化水平的下降……不论在欧洲的基督徒中，还是在叙利亚、阿拉伯和非洲的穆斯林中，土耳其人最拿手的一招，就是征服到哪儿破坏到哪儿；他们从未显示过自己能够和平地发展他们靠战争赢到手的東西。他们的才干决不在这方面。

如果说在那时，这种态度已有失公允，那么到现在，则是令人难以容忍的了。在过去，如同在现在，土耳其人显示了堪与古代罗马人和中世纪北欧人相媲美的组织、建设才能。

他们也像古罗马人和北欧人一样，十分看重而且还将继续珍视勇敢、坚韧、纪律等军人气质。他们在体育方面所崇拜的偶像，看来就是那些为土耳其赢得国际比赛和奥林匹克冠军称号的孔武有力的摔跤运动员。他们往往吝于言辞，初交时神情似乎还略带几分严厉。其实他们也很友好、慷慨，有时机智横溢，谈锋甚健。他们沉着自信，富有求实精神，具有分析因果关系的基本推理能力。作这样的一般性概括，难免有片面武断之嫌，正如在这瞬息万变的大千世界中有各色人等，土耳其人也属多种多样。然而，凡是了解土耳其的人，都会证明这些判断并非言过其实。

土耳其也意识到自己从各种古代文化——从早期突厥族、从伊斯兰教、从奥托曼帝国、从西方——继承到丰富的遗产。他们生活在“旧”与“新”的包围之中，周围有丰碑式的赫梯族雕刻、罗马圆形剧场、拜占庭镶嵌工艺、塞尔儒克族的商队客栈、土耳其民间音乐、奥托曼清真寺、柏油马路以及高压电缆。往昔推动着现在，如同现在推动着将来。

安卡拉乌鲁斯广场座落在一条现代化的林荫大道上，毗邻旧城区。广场附近有古罗马奥古斯都古庙、中世纪拜占庭城堡、15世纪哈基·拜拉姆清真寺、现代化火车站。当民族主义运动决定将政府设在这个地区之后，这儿就建立起了第一批政府办公大楼。一座阿塔图克身跨骏马的雕塑像，俯瞰着整个广场。雕像底座上刻有一幅浮雕，画面上是棵大树，一根粗枝在树干处豁然断开，而大树顶上萌生出一丛生机勃勃的新枝嫩叶：土耳其共和国从奥托曼帝国的躯壳中脱颖而出。新生的土耳其从旧帝国那儿接过了它的子民、土地、宗教以

及许多问题。共和国既是从帝国的失败与崩溃中傲然崛起,也是在帝国的经验和进步中脱颖而出。那个帝国本身有着 600 年的历史。它是由土耳其人缔造的。现代土耳其的历史渊源,可以由奥托曼帝国时期追溯到奥托曼以前的突厥族年代以及伊斯兰教以前的年代。

第二章

从草原到帝国

近年来,土耳其人对自己的民族起源显示了特殊兴趣。过去未必一直是这样。在奥托曼帝国大部分年代里,土耳其人写的或念的历史,尽是有关奥托曼王朝及国家的历史,再不就是伊斯兰宗教史。然而到了 19 世纪末,有些奥托曼知识分子开始对操土耳其语的“族兄”产生较大的兴趣,这些“族兄”散居在从伊朗西北部和高加索经土耳其斯坦(起初受俄国威胁、不久即置于俄国控制之下)、直至中国这样一片横贯中亚西亚的广阔地带。由于受到西欧学术研究成就的推动,有些土耳其学者也开始深入探究土耳其民族的人种及语言历史。

探究民族起源,作为增强现代民族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并非为土耳其人所特有的做法,但是他们开始搞这项研究,却晚于曾受他们统治过的希腊人、斯拉夫人和亚美尼亚人。作这项研究也的确比较困难,因为奥托曼帝国及伊斯兰教这层覆盖物,把土耳其民族的过去完全遮掩住了,甚至同

为穆斯林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也比土耳其人保留着更多的民族意识：意识到自己属于阿拉伯民族或波斯民族。对土耳其人来说，之所以难于保留其土耳其民族意识，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书写、甚至说话的语体文风：他们的语言文学中大量充斥着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搬借来的词汇和表达形式。在探究民族起源的同时，实际上也在探索更简洁、更能真实表现土耳其特色的民族语言。^①

土耳其共和国取代了奥托曼帝国之后，对土耳其民族起源的探索研究仍在继续进行，而且还受到阿塔图克的鼓励，因为他有意借此来增强民族认同意识和团结意识，增强独特感和自豪感。由此，也出现了一些离奇古怪的、毫无根据的理论。^② 土耳其共和国取代了奥托曼帝国之这些理论毕竟还是收到了某些效益：不仅增进了土耳其人对自己种族历史的兴趣，而且平衡了他们对自身历史的认识。今天，受过教育的土耳其人不仅了解奥托曼帝国的历史，了解奥托曼时期以前的伊斯兰历史，而且也了解伊斯兰以前的突厥族历史。

土耳其民族的早期历史，有很大一部分相当含糊。有些含糊之处是靠神奇传说，或是通过加枝添叶地虚构事实而整理成章的。即使年代较近的理论学说也未必可信。例如有些史家说，土耳其族是乌拉尔—阿尔泰语族的一个分支。然而今日的语文学家认为，乌拉尔语族（包括芬兰语、爱沙尼亚语、匈牙利语等）和阿尔泰语族（包括突厥语、蒙古语、满

① 关于语言改革的发端，参见第 84—85 页（原书编码）。

② 关于这些理论，可参见第 135—136 页（原书编码）。

族通古斯语，可能还包括朝鲜语）之间的基因联系，尚未得到科学性的证明。再说，阿尔泰各语种间的关系也还不太清楚。但有一点似乎已清楚无疑，即：突厥族一度属于阿尔泰人种族的一个部分，同属阿尔泰人种的还有蒙古族、满族、保加利亚人，可能还有匈奴族等。历史上突厥族最早出现在贝尔加湖南面、戈壁沙滩以北的今日外蒙古一带。中国人有关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的历史资料，提到过一个由这类草原游牧部族组成的联盟（这类部族中国人称之为匈奴），其中很可能突厥族所占的成份最大。匈奴中的西侧一支，被蒙古人再驱赶往西，于公元5世纪在欧洲出现，被西方人称为 Huns（匈奴人）。

在中华帝国边缘上的这些部落和部落联盟，经过连年混战，于公元前6世纪出现了第一个日后被人称作土耳其人（中国人称之为突厥）的部族。东部的突厥王国以鄂尔浑河为中心（鄂尔浑河是一条向北流入贝尔加湖的小河的支流）。在西伯利亚这一带，已发现了属于公元8世纪30年代的最早的突厥语铭文。或是由于被中国人征服，或是由于内乱，这个王国时起时落，时隐时现。其他一些突厥人向南、向西推进。进入了今日的俄国土耳其斯坦地区，这个昙花一现的国家因坐落在中国通向西方的丝绸之路上颇得地利之便，也曾盛极一时。拜占庭帝国为了抵抗波斯帝国，曾从首都君士坦丁堡派出使者，向这个突厥国进贡，以期得到它的帮助，这足以表明它的强大实力。但是这个突厥国家也像东部突厥国一样，不久就土崩瓦解了。然而这个地区，仍保留了突厥的种族特征。在宗教信仰上，突厥族受到过景教、摩尼教和佛教的影

响，但他们基本上仍是信奉黄教的。

历史上突厥人有过两次决定日后几百年命运的重大遭遇，第一次开始于公元 7 世纪，是同伊斯兰教接触相遇。阿拉伯人在公元 7 世纪征服伊朗，把穆罕默德先知宣讲的信条带到了中亚西亚突厥族住地边缘。随后，一些突厥族人进入伊斯兰教首统治的国土，变成了穆斯林。在公元 9 世纪及以后，突厥族斗士应征给穆斯林统治者的军队当奴隶，随后也就皈依了伊斯兰教。有些人平步青云，担任了重要官职。然而，绝大多数突厥族人仍在咸海以东的中亚西亚过着游牧生活，直到 10 世纪才接受了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在那些正式入教的突厥人中，起了新的纽带的作用。它不单是一种崇拜方式或是狭窄的宗教信条，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从理论上来说，它包含的不仅是人与上帝的关系，还有人与人的全部关系。法律与国家、社会与文化，既建立在伊斯兰教之上，也通过伊斯兰教弥漫开来。突厥人在接受伊斯兰教的同时，也把阿拉伯圣典一并接纳了过来。不过，并非所有的突厥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接受伊斯兰教。有些人 and 伊斯兰教教派逊尼派发生了联系，同伊斯兰神学家保持着良好关系，这些人中最为突出的，是以塞尔儒克为首领的突厥部族。另外也有不少人——一般被称作土库曼人——仍然过着近乎部落式的游牧生活；他们受到商人、神秘主义者以及“信仰武士”所传播的伊斯兰非正统教派的影响，随后也就在伊斯兰国的边境同“加齐”——“信仰武士”——融成了一体。这些人既不排除盛行于伊拉克和伊朗的伊斯兰异端什叶派的影响，也乐意接受一般传道士和神秘主义者的淳

谆规劝。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忘掉传统的民间宗教。伊斯兰教的这两方面因素，都将对日后土耳其的历史发生影响。

到了公元 9 世纪，伊斯兰教首的一统天下已开始分化瓦解。而到了 11 世纪，各部落国间的你争我夺，朝代间的交替更迭，把伊斯兰世界推入混沌一片之中；地位显赫的巴格达教首的所有实权也都被剪削一空。塞尔儒克各部族或是受到邀请，或是凭借武力，纷纷进入今日的伊朗地区。1055 年，塞尔儒克族首领图格鲁尔·贝格控制了巴格达；他支持伊斯兰教首，恢复了他的尊严，不过实权尽落在图格鲁尔及其后嗣手中，他们这时已被授予苏丹的称号。到这时为止，突厥人不但完全接受了伊斯兰教，而且还挽救了逊尼教派，即伊斯兰正宗教派，使其免于堕落，而他们自己也成了古老伊斯兰世界的主要地区（底格里斯—幼住在巴格达的土耳其学者在 1074 年编写的百科词典中复述了穆罕默德先知的一段未载入圣典的话（显然是后人杜撰的）：“真主说，我有一位我称之为土耳其的主人，居住在东方。如果有谁激起我的愤怒，我将把他们交付这位主人处置。”接着马赫默德评论说：这表明土耳其人“优于其他所有民族，因为真主主动给他们取了名字”。且不论这段话是否像马赫默德所指望的那样，说土耳其人与先知及其真主之间真有什么直接关系，它倒确实表明伊斯兰教已成了土耳其人生活的一部分。

第二次决定土耳其人命运的遭遇，是同拜占庭帝国的冲突。塞尔儒克部族首领经常得依靠土库曼部落成员来打仗，而土库曼部落成员则采用“信仰武士”的作战方式在伊斯兰国边境同非伊斯兰信徒交战，他们觉得气候炎热的北索不达米

亚平原比北方更有吸引力。于是，土库曼武士开始侵袭现为东土耳其的那一片拜占庭国土。他们发现拜占庭帝国正处于内部争权夺利、国力江河日下的时期。罗马帝国的骄傲后裔，在公元 10 世纪可谓称雄一时，统治着自亚得里亚海至叙利亚边境、横跨欧亚两洲的繁荣大帝国。但此后帝国政府日益衰落，再加上帝国统治下的东部各族人民心怀不满，这就削弱了对“信仰武士”袭击的抵抗，特别是亚美尼亚地区，它是不久前才割让给拜占庭的。到 11 世纪中叶，土耳其袭击者已渗透到今日土耳其一半以上的地方，至少已渗透到科尼亚（拜占庭时的艾柯尼厄姆）。这些袭击带来了意外收获：塞尔儒克的疆土得以向西北扩张。塞尔儒克国的苏丹原打算长驱直入叙利亚，再向埃及进发，但是为了控制土库曼人，遏止拜占庭军队的挺进，图格鲁尔的继承人阿尔普·阿斯兰苏丹决定挥戈北上。1071 年，他在凡湖附近的曼泽凯尔特战役中，一举击败由罗曼努斯四世戴奥吉尼斯皇帝率领的拜占庭军队。

曼泽凯尔特一役击溃了拜占庭在亚洲的防御力量，为土耳其族进一步向安纳托利亚渗透打通了道路。土库曼族武士又不服塞尔儒克苏丹们的管束，把袭击的范围一直扩展到爱琴海和马尔马拉海沿岸。土耳其人先占领乡村，危及并割断拜占庭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络，从而也瓦解了拜占庭的行政管理。他们常常受到希腊人的欢迎，后者对拜占庭帝国的苛捐杂税和教会控制甚为不满。随着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进入安纳托利亚，该地区的城镇也逐渐纳入土耳其的势力范围。这样向西扩张，结果并未形成一个单一的、有组织的土耳其邦

国，而是在如今已成为土耳其人边沿之地的广阔天地，出现了一群各自为政的游牧部落和信仰武士群体——一群寿命不长、与安纳托利亚原有部族居民混集而成的雏形王国。

在兀然崛起的、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土耳其诸邦国中，一个由塞尔儒克族首领苏里曼领导的王国，在 11 世纪 80 年代曾盛极一时。苏里曼根据同拜占庭皇帝阿历克修斯缔结的协议，以离君士坦丁堡不远的伊兹尼克（尼卡伊）作为自己的首都。这些土耳其小邦国相互争执不休，扰乱了乡村的安宁，不时还侵扰了经安纳托利亚去耶路撒冷的朝圣通道的安全。土库曼部族还在一刻不停地漂流到这一地区来，于是开始了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化过程，而维护伊斯兰信仰的土耳其武士同日趋衰落的基督教拜占庭帝国，也开始形成命运攸关的对峙局面。

土耳其人的源源流入，终于迫使拜占庭采取对抗措置。为了对付这些阿历克修斯大帝心目中的东方“穆斯林蛮子”，他不得不求助于西方的“基督教蛮子”。

于是开始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7 年，十字军骑士征服了伊兹尼克，把它交还给阿历克修斯。其他的一些城市亦复如此；由于土耳其人被挡了回去，拜占庭重新控制了安纳托利亚的 1/3 左右地区。但是土耳其人并没有被赶走，后来的一个塞尔儒克族首领击败了 1147 年的第二次十字军东侵。虽然土耳其人没能收复伊兹尼克，也没能夺回以前占领的西部土地，但他们还是守住了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中部地区，并在这儿建立了一个名为“罗姆苏丹国”的邦国。“罗姆”的原意是“罗马”或“罗马人”；但此时它已带有希腊语或拜占庭

语的涵义，因为这个以君士坦丁堡为基地的东方帝国一直以罗马国自居。同其他土耳其酋长国，尤其是达尼什门德酋长国相比，罗姆苏丹国有过一段稳定时期。它定都于科尼亚。

12 世纪后期以及 13 世纪早期，这个塞尔儒克族罗姆苏丹国逐渐繁荣起来，1230 年左右进入全盛时期。它控制了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使得安纳托利亚一侧的力量保持均势；正是由于这一均势，塞尔儒克国家得以在尼卡伊和特拉布松等拜占庭诸邦国包围中稳步发展（1204 年，第四次十字军东侵的拉丁民族已将拜占庭人逐出君士坦丁堡），而且亚美尼亚也在东方得以复苏。塞尔儒克族过去曾一度遭人轻视，被认为只知破坏，只对打仗感兴趣，而现在人们已公认他们在历史上曾达到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在今日的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仍点缀着塞尔儒克人的零星遗迹：他们修筑的道路、精巧绝伦的石桥，他们建造的商队客栈网、清真寺、经院、防御工事等等。同意大利城邦的频繁贸易，也促使他们进一步繁荣兴旺。著名的神秘诗人埃丁·鲁米也就是在科尼亚，建立起梅弗莱维伊斯兰修道会的（西方一般称之为“旋风式”或“舞蹈式”^①托钵僧）。

虽然土库曼人继续从中亚西亚来到安纳托利亚的塞尔儒克国土，但是在 1100 年前后，第一次渗透浪潮已化为一股涓涓细流。罗姆苏丹国建立之后，一般还能管束住游牧部落，同时也控制并利用他们的“信仰武士”的游击习性。然而到了 13 世纪末期，又出现了土耳其人向安纳托利亚渗透的新热

① 他们在施行宗教仪式中时而急旋，时而腾跳，故得名。——译注

潮。落在罗姆苏丹国头上的一场灾祸，反倒给它提供了机会。蒙古人以往多次袭击，总是绕过安纳托利亚的，可是在 1243 年却在柯塞达格一役中击败了罗姆国塞尔儒克人。尽管塞尔儒克王朝一直维持到 1303 年，但它始终未能恢复元气。蒙古人并不想直接统治安纳托利亚，而只是要它纳贡称臣。他们的兴趣在于伊朗，那儿的一个蒙古王朝已接受了伊斯兰教，受蒙古汗二世^①统治。安纳托利亚是蒙古汗二世帝国的前沿。

说来也怪，蒙古人对土耳其塞尔儒克族罗姆苏丹国的打击，反而导致了安纳托利亚的进一步土耳其化。这里有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土耳其部落从中亚西亚向安纳托利亚的迁徙，出现了新的浪潮，他们或是受到蒙古人的驱赶，或是紧随蒙古人而来。其次，塞尔儒克国由于中央控制能力削弱，力量逐渐向外围溢散。土耳其各小邦国和酋长国不愿再受塞尔儒克的约束，而开始自行其事。在拜占庭边境上的那些小邦国或酋长国，又开始猛烈袭击非伊斯兰信徒。现在这已变得容易了，因为拜占庭帝国在 1261 年收复首都君士坦丁堡以后，主要军事力量转而用于对付西方的拉丁民族。“信仰武士”精神再次显露锋芒。安纳托利亚西部地区重又被土耳其人占领，只留下拜占庭的几座孤城。

这段时期以后，安纳托利亚的外观越发趋于土耳其化了，不仅在刚从拜占庭人手里夺来的地区是这样，整个高原亦复如此。塞尔儒克苏丹国统治下的臣民，人种混杂。城镇里的武士、行政官员和手艺人是土耳其人，草原上的游牧民也是

^① 即元世祖忽必烈。——译注

土耳其人。但贸易经商却往往落到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手里。农民中有一部分是土耳其人，但大部仍为希腊人，也就是说，是基督徒。但是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和东部的许多希腊人，就其希腊化和基督教化的程度来说，想必是很粗浅的——要比爱琴海沿岸的希腊人粗浅得多。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证明安纳托利亚最近一千年以来一直是文明人的住地。现代土耳其人往往根据某种直觉声称赫梯人、佛里几亚人等是他们的祖先，于是人们推测，这些古代民族想必是混杂在古罗马帝国及其东方继承者拜占庭帝国的人口之中了。形形色色的民间信仰都保存下来。拜占庭帝国的正统僧侣统治，在老百姓中，尤其在东方人中，往往很不得人心。有时候人们发现：比起希腊东正教教义来，伊斯兰教更具有吸引力，要是干脆被穆斯林教徒征服，倒能摆脱教士们的苛捐杂税。伊斯兰化和土耳其化，只不过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13 世纪后期和 14 世纪，土耳其人没收财产的措置和税收制度，加速了作为社会制度的希腊教会在一度最富有的地区安纳托利亚的瓦解，皈依伊斯兰教的人似乎骤然增多。日益发展的梅弗莱维修道会，在布道方面自有特殊的号召力。不但普通老百姓，有时甚至希腊教士、僧侣、犹太教士，也纷纷信奉伊斯兰教。基督教—穆斯林交界处的边区民族混杂同居，势必也促成各民族间的联姻通婚。在 14 世纪，甚至拜占庭皇帝也招土耳其王子做女婿。其结果是：伊斯兰教的势力在发展，而基督教的影响在收缩，不过也并没有完全从安纳托利亚地区消失。由于外来土耳其人的迁入，再加上当地居民的归化，土耳其族的人数在不断增加。

有个小酋长国自称是罗姆苏丹国的继承者，它以地处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小城索胡特（就在今日埃斯基塞希尔城的北面）为中心。它决非是最大或是最强盛的酋长国；说来着实令人惊奇，土耳其人统治下的最大国家，历史上最强大的伊斯兰帝国，竟然是由这小小的邦国发展起来的。13世纪90年代，它的统治者名叫奥托曼，这个王朝的称号——土耳其人称之为“奥托曼利”，西方称之为“奥托曼”——即由此而来。据传说，奥托曼人起源于一个部落：一伙骑手从东方来到塞尔儒克族的土地上，在一次关键性的战役中帮助了塞尔儒克人，于是被分封到索胡特周围的边区之地作为报偿。这说法常为人们所接受。日后奥托曼帝国的编年史给奥托曼族编造了一份血统高贵的宗谱，说他们的族史可以从中亚西亚的奥胡兹突厥族追溯至人类的狭口诺亚，不用说，再向上就必然追溯到人类始祖亚当了。

尽管奥托曼族可能起源于原始部族，但奥托曼国的强盛自有其宗教上、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原因，而并非出于部族的“种气”。奥托曼邦国位于拜占庭帝国边区，在所有酋长国中它离君士坦丁堡最近。它把“信仰武士”从土耳其腹地吸引过来，帮它传播宗教信仰，掠地劫财。它在奥托曼在世期间形成了一个“信仰武士”之国。有一处早期碑文称奥托曼为“信仰武士们的苏丹”。有位1400年左右的奥托曼编年史家在撰写王朝大事记时说：“信仰武士是传播真主宗教的工具，是涤净人世间多神论污秽的上帝的仆人；信仰武士是上帝手中的利剑……”奥托曼酋长国也从土耳其腹地汲取别种力量：正统神学家、带有宗教色彩的手工工人或手艺人兄弟会组织、伊

斯兰教托钵僧及异教教士。这些人均有助于加强该酋长国的社会组织。

随着奥托曼酋长国的向外扩展，它在半个世纪后成为跨及欧洲的帝国，不但开拓了疆域基地，而且还创立了一套行政机构。最初的扩张很缓慢。奥托曼的继承人奥尔汉（在位期间 1324？—1362？）在 1326 年拿下了拜占庭重镇布尔萨（布鲁萨），即定都于此。几年后，伊兹尼克（尼卡伊）和伊兹米特（尼科梅迪亚）相继落入奥托曼人手中。他们到达马尔马拉海岸之后，立即跨越海峡进入欧洲。在 1345 年及此后 10 年里，拜占庭皇帝或皇位争夺者，先后三次把奥尔汉的军队召来作为盟友。土耳其人见到了色雷斯，有些甚至见到了君士坦丁堡。他们对看到的一切都很喜欢。1354 年他们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后就留守在那儿，并在加利波利建立起牢固据点。值得注意的是，奥托曼人在这一年才开始向东扩张，对土耳其领土作重大渗透，控制了安卡拉。奥托曼帝国的发展走势，像钟摆那样时而向西，时而往东，但向西发展始终占首位。这一方面是由于地理环境和机遇；另一方面也与这个帝国的起源有关——是靠“信仰武士”打天下的。

在奥尔汉继承人穆拉德一世（在位期间 1362？—1389）统治期间，对巴尔干半岛的征服仍在继续，但此时已是作为国家有组织的军事行动，而非“信仰武士”的任意出击。奥托曼人在一步一步向马里查河和瓦尔达尔河流域进军的过程中，先兼并了保加利亚的领土，随后进袭阿尔巴尼亚，一直打到亚得里亚海岸，然后在 1389 年著名的科索沃一役中击败了塞尔维亚同盟。长期以来作为拜占庭帝国中央核心之地的

巴尔干半岛，此时已为土耳其人所控制。君士坦丁堡几乎已是四面楚歌的一座孤城，而拜占庭皇帝事实上也成了土耳其人的臣仆。罗马教皇曾呼吁再次组织十字军，请求匈牙利出兵抵抗，结果也一无所获。穆拉德采取的又一重大行动，是在 1365 至 1366 年把首都从亚洲迁至欧洲——由布尔萨迁至埃德尔纳（亚得里亚诺波尔）。

历史学家当然想找到解释，为何一个由边疆武士组成的小小酋长国会在一百年里演变成一个横跨两大洲的庞大帝国，它虽然还未拿下君士坦丁堡，但已接管了拜占庭帝国的核心之地。没有哪种解释可以把问题彻底讲清楚，不过，有些原因倒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和奥托曼人抗衡的，是一股涣散不和的力量。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还有拜占庭人，在新的威胁面前，却无法齐心协力一致对敌；而是各打各的算盘，他们分别把奥托曼人召来，往往是为了协助自己压倒对手。至于拉丁西方世界，照理说是可以给予支援的，偏偏自己也在闹矛盾，可谓自顾不暇。英法两国争执不休，正忙着打他们的百年战争，威尼斯和热那亚正在你死我活地相互争雄，罗马教会本身也由于“教皇流放事件”削弱了力量——在这种形势下自然难于组织起一场十字军讨伐。在这些导致奥托曼人成功的外因以外，还得加上一条——黑死病。1347 年黑死病瘟疫在克里米亚爆发，一直蔓延到君士坦丁堡，并且在欧洲的一个大弧形区内继续滞留达 5 年之久。这场瘟疫使希腊人和其他欧洲人大为惊恐，而土耳其人却侥幸躲过了。另外还有一点也不该忘掉：奥托曼人闯入欧洲本属轻而易举的事；而从那儿夺取战利品的前景，不仅对一般奥托曼人，而

且对其他早已有点眼红的信仰武士们，具有特殊吸引力。此外，在某些巴尔干民族看来，奥托曼人的统治较之以前的拜占庭政权，似乎束缚较松。虽说在信仰武士征服巴尔干半岛的早期年代，胁迫基督徒改变信仰也不乏其例，但一般说来，基督徒仍能照常奉行他们的宗教仪式而不受干扰。奥托曼人对那些愿意归顺且缴纳一笔特殊税款的人，往往都取宽容态度。

奥托曼人的成功，也有其内在原因。奥托曼家族确也产生了一些颇具才干的首领，而且当朝临政的年代一般也很长。一些有势力的、能与其一争高低的土耳其酋长国，差不多都远在东部，奥托曼人通过联姻或其他和平手段，也就把他们一些疆土纳入了奥托曼国的势力范围。土耳其的内陆腹地不仅提供了塞尔儒克族的行政管理经验和手艺人的兄弟会组织，而且还造就一批满腹经纶的伊斯兰学者（乌莱玛）。由于这几方面的帮助，奥托曼苏丹建立了一整套完全行之有效的军事和行政机器。其发展过程至今还不太清楚，因为新的研究成果，又把奥托曼帝国体制的形成日期更往前推。不管怎么说，到穆拉德一世王朝时期，奥托曼国已在非正规的志愿骑兵和非正规步兵之外，又增设了有组织的常备军。在已被征服的领土上实施分地封爵的采邑制度，确保骑士领主在必要时能输送出规定数额的骑兵；这种做法也许是借鉴了塞尔儒克人的经验。也许是在穆拉德一世年间，也可能更早，奥托曼帝国建立了一支由训练有素的步兵组成的“新军”——近卫兵团，其成员均为奴隶，或是在战争中俘虏来的，或是用钱买来的，再不就是臣民奉献给苏丹的。塞尔儒克人也同

样供养过这种由奴隶组成的军队。这支近卫兵团最初大概不超过 1000 人，不过，其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壮大。仆从国塞尔维亚和拜占庭，有时也得提供部队人马。然而到那时为止，奥托曼人还没建立起一支名副其实的海军。

在行政方面，奥托曼国到奥尔汉临朝当政时，已经完全摆脱了与蒙古汗王的名义上的君臣关系。奥尔汉采用一系列君权标志：他冲制自己的铸币，在周五祷告中须提及自己的名字，他制定了自己的皇室旗标；还建立了一支军乐队。精力充沛的奥托曼苏丹们（14 世纪 30 年代阿拉伯旅行家伊卜恩·巴土塔，对奥尔汉巡视他境内近百座要塞一举钦佩不已），由一个以大将军为首的行政机构辅佐。奥尔汉王朝初期的辅政大将军，也许是最早被称作“帕夏”的，这是个高级文职或军职称号。安纳托利亚疆土被划成若干省份；欧洲疆土也有一些被划为省区，但好多地方最初只是使它们沦为纳贡成臣的仆从国，而不是完全并入帝国。即使在安纳托利亚，苏丹们统治的毕竟也是个多语种帝国，宗教五花八门，人种四方杂处。他们也像以前的统治者一样，感兴趣的是收税，受取贡金，寻求有效的敛财办法，以及如何征募士兵，让他们俯首听命。形式的一致性无所谓，重要的是实际结果。

人们推测，这种多语种帝国以及旨在增加俘虏的作战方式，也使奥托曼人无法跳出塞尔儒克人的窠臼，非得依赖奴隶出身的行政官员不可。奴隶们出生时是基督徒，青年时期皈依伊斯兰教，接受训练，然后离开土生土长的地区，这样很可能会赤胆忠心地为苏丹效力。不但奴隶，还有农民和游牧部落，出于同样的目的，也被迁移到别的地区去扎根、垦

殖，保卫国家安全。正像鲁梅利亚（欧洲）的部队人马常常要调至安纳托利亚，或者安纳托利亚的军队会调驻欧洲，村落居民点也会作同样的横向调迁。巴尔干半岛各族人民——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在被穆拉德征服以后，也开始掺入土耳其的种族混合体中，特别是掺入奥托曼统治阶层中。改变宗教信仰，不同种族间的联姻通婚，使安纳托利亚地区业已开始的民族融合得以进一步发展完善。

拜占庭国和塞尔儒克政权几乎同时崩溃，巴尔干半岛处于群龙无首、四分五裂的衰竭状态，而安纳托利亚诸邦国间也是你争我夺，争执不休，这种局面对奥托曼人进行扩张是再有利不过的了。穆拉德的继承人巴耶泽德一世（人称“霹雳王”，在位年代 1389—1402），试图同时利用两地的形势双管齐下。在欧洲，他领兵北上，越过多瑙河，矛头直指匈牙利。在 14 世纪 90 年代，他也不时拥兵围困君士坦丁堡。在亚洲，他相继并吞了他领土南边的、爱琴海沿岸的、还有东部远至萨姆松、瑟瓦斯等地的土库曼人酋长国。他这种做法，诱发了两次军事危机，而无论哪一次都完全有可能置奥托曼人于死地。而第二次危机又进而导致了第三次危机。其结果，很可能是奥托曼帝国的覆灭，而所以没有出现这种结果，一部分也是由于运气。

第一次危机来自西方。西欧的法兰克骑士在百年战争的休战期间，备足了补给物资，在 1396 年发动了一次十字军征伐，协同匈牙利人进攻土耳其。基督教大军浩浩荡荡，气势巍然。法兰克骑士从多瑙河到土耳其军事重镇尼科波利斯，一路欢宴狂饮，根本不把土耳其人放在眼里。他们不听匈牙利

人的忠告，就在尼科波利斯贸然向巴耶泽德的土耳其军队及其塞尔维亚盟军发动进攻，结果以这支讨伐军的彻底溃散而告终。这中世纪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十字军东征的失败，进一步确立了奥托曼人对巴尔干半岛的控制。这次东征迫使巴耶泽德停止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不过也只是暂时解救了这座孤城而已。

第二次危机来自穆斯林东方，说来也不无讽刺意味，这次危机较之十字军征伐，反倒给拜占庭人以更大的喘息机会。对奥托曼人的新威胁，源出于铁穆耳（帖木儿）。巴耶泽德在东征吞并各穆斯林酋长国的过程中，既使用了土耳其近卫兵团，同时也投入了希腊和塞尔维亚基督徒军队，铁穆耳对此大为恼怒，因为这有伤他帝国的尊严，或许还有宗教上的原因。遭废黜的酋长们，纷纷求助于这位伟大的征服者，蒙古王朝的继承人（他一手缔造了一个从中亚细亚至叙利亚的伊斯兰帝国）。铁穆耳终于作出了反应。1402年安卡拉一仗，他击败了巴耶泽德的军队，活捉了这位苏丹，后者于次年去世。铁穆耳尽管踏平了安纳托利亚大部分地区，但并不想把安纳托利亚收归己有。他恢复了安纳托利亚东部和中部诸酋长的统治地位，借此来削弱奥托曼人的势力。奥托曼人在安纳托利亚的统治地盘，又回复到半个世纪前的老样子。

巴耶泽德被铁穆耳击败而且身亡，导致了第三次危机——内部的权位之争。为了决定由谁来统治奥托曼帝国的那半壁江山，巴耶泽德的四个儿子相互争斗了整整十年。要是这场兄弟阋墙的内讧发生在尼科波利斯十字军讨伐战或铁穆耳进攻之前，再不，如果十字军讨伐队伍在铁穆耳击败土耳

其人之后才浩浩荡荡而来，那么谁也不知道奥托曼帝国是否能幸存下来。但是，由于铁穆耳无意于直接控制安纳托利亚，接下来他本人也早早去世，再加上基督教西方尽管知道情况，但自身矛盾不和，没能利用奥托曼人的内战趁虚而入，结果这场权位之争没有遭到任何外来干预。1413年，王位争夺者中的唯一幸存者梅赫默德一世终于获胜了。奥托曼帝国又能重振旗鼓，收复失土，不过并没有夺回土耳其最东面那些曾一度为巴耶泽德所兼并掉的地区。接下来的50年里，奥托曼人又再次面向欧洲。奥托曼人现在能把注意力重新投向基督教边界，投向信仰武士曾进行武力扩张的那一方天地，就这点来说，铁穆耳还算帮了他们一个大忙呢！

梅赫默德一世（1413—1421）和穆拉德二世（1421—1451）这两个朝代，代表了奥托曼帝国的巩固时期，在此期间，安纳托利亚或鲁梅利亚地区的战事，可谓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国家并未趋于巩固，也没有呈现一统天下的局面。例如塞尔维亚各附庸国，刚刚取得了独立，很快又得而复失。匈牙利人在他们的英雄约翰·洪亚迪的领导下，不断对越过多瑙河的土耳其人进行骚扰。最后一次十字军讨伐——尼科波利斯讨伐战的一个有气无力的翻版，与其说是由西方拉丁民族，还不如说是由匈牙利人发动的——进袭保加利亚，结果却在1444年惨败于瓦尔纳城下。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尽管日后西方国家和拜占庭再三呼吁，然而十字军运动到此时已告寿终正寝。不过，这半个世纪里所发生的某些事件，却预示了未来事态的发展。例如，开始了同威尼斯人的海上争夺。威尼斯人感到他们进行东地中海和黑海贸易的亚得里亚

海和爱琴海通道，受到了土耳其人的威胁。奥托曼人在巴耶泽德统治年间，曾拥有一支力量微弱、规模很小的海军，他们眼见有必要增强他们的海军力量，可现在还只是刚刚在起步。未来事态发展的另一迹象是近卫兵团的叛乱。就这次叛乱来说，是因苏丹朝廷的派别权力之争而引起的，不过，它预示着今后近卫兵团在拥王倒王方面将扮演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角色。另一个不祥之兆，是安纳托利亚托钵僧所领导的反对正统奥托曼国家组织的叛乱，它预示着宗教、政治方面的不满情绪，一旦受到神秘主义者或什叶教派的鼓动和影响，就有可能不时地在老百姓中爆发出来。

到此时为止，君士坦丁堡总算躲过了土耳其人的控制，有一个时期，它眼看就要被穆拉德二世拿下了。这个城市本身，再加上很有限的外围地区，就是归拜占庭皇帝所领有的全部疆域；他们还得常常向奥托曼苏丹们纳贡称臣。穆拉德二世1422年的围城之战，尽管首次动用了大炮攻打城墙，结果还是没有成功。奥托曼帝国海军无法切断该城的海上补给线。然而，这座一度如此庄严雄伟的都城，如今尽管英勇抵御，毕竟是大势已去，濒临末日了。西班牙朝圣旅行家佩罗·塔富尔曾留给后人一段有关他1437年君士坦丁堡之行的精彩叙述。他对圣索菲亚大教堂、金角湾的奇妙锚地以及蔚为壮观的城墙赞叹不已。他亲眼看到皇帝在浩浩荡荡的队列簇拥下，动身去参加佛罗伦萨宗教事务会议（此行原是试图通过东西方教会的重新联合，争取到拉丁民族的支援，结果却是一无所获）。但是，佩罗·塔富尔发现皇宫已趋破败，城市人口稀少，人们衣着寒碜，尽管城中驻有一些西方国家雇佣兵，但

防御力量不足，极需补充兵员。他说，实际上该城已经在土耳其人的控制之下。接着，他在拉丁民族正义感的冲动之下，又补充了这么一句：但是这些人应该遭到更坏的报应，因为他们是个“腐化堕落、罪孽深重的民族”。^①

佩罗·塔富尔接着又稍稍往西，造访了奥托曼首都埃德尔纳，这使他有机会作一直接的比较。他受到“英俊的、沉着的、谨慎的”穆拉德二世的接待，深为这位苏丹魁伟的骑士体格及其手下侍臣的华丽衣饰所打动。土耳其人的境遇很好。他们对待希腊人很残酷，但他们是

高贵的民族，坚信真理。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生活得像个贵族——在行为举止、食物、体育运动方面，也像在花费方面，都表现出贵族气派……他们愉快爽朗，乐善好施，善于辞令——在这些方面他们堪称尽善至美，所以如果要谈论什么是美德，那么只要说一句“但愿任何人都能像土耳其人那样”，就足以说明问题了。^②

就在佩罗·塔富尔访问埃德尔纳的时候，土耳其大军逼近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但是他们并没有发起攻势，而是继续向前进发。1451年穆拉德二世去世时，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仍然屹立在那儿。尽管它已日见衰败，但是一座四周围绕

① 佩罗·塔富尔：《旅行与历险，1435—1439》。

② 佩罗·塔富尔：《旅行与历险 1435—1439》。

着千年帝国传统光华的都城，势必要诱引土耳其人去攻打占领。再说，它对土耳其人依然是个潜在威胁，说不定拜占庭会搞什么阴谋，说不定西方海军强国会封锁海峡，或是切断土耳其人由安纳托利亚去鲁梅利亚的极为方便的交通线。

梅赫默德二世在 1451 年继承了父亲的苏丹王位之后，就把攻占这座城池定为自己的首要目标。梅赫默德证明自己是精明能干的组织者。不到两年，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包括在鲁梅利希萨尔快速建成了“割喉”城堡——1452 年花了不到五个月的功夫，这座城堡就出现在博斯普鲁斯狭口的欧洲一侧海岸上，与巴耶泽德一世在亚洲一侧所建造的规模较小的堡垒遥遥相对。这两座城堡保护着土耳其人的欧亚通道，进一步充实了较宽阔的达达尼尔海峡的南下通道。同时，鲁梅利希萨尔由于设置了射发大型石弹的臼炮，也能阻止任何人从黑海方面向君士坦丁堡提供援助。这座孤城徒然地想从西方谋求支援，不惜在圣索菲亚教堂举行隆重仪式，促成各分裂派教会的重新联合，结果前来支援的，也只有为数极少的意大利士兵和几艘舰只。

1453 年春，在君士坦丁堡的界墙外面，土耳其大军云集。在匈牙利人奥尔班指挥下铸造的好几门重炮，布置在前沿阵地上，准备炮击城垣。重炮中最大的，能投射出 1200 磅重的石弹，可惜每天只能发射 7 次。一支由小型舰只组成的土耳其舰队，也集结停泊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处。4 月 5 日炮击开始了。炮击持续了五十多天，另外，为配合炮击还向城垣发起一次又一次进攻，但都被守卫者一一击退。土耳其人把一些小船拖上岸，再投放到金角湾里，一些守城者又被调来守卫

港口的护墙。尽管城中一片惊恐，连“教堂里的图画也在冒汗”，但是这座城池仍在抵抗。辅佐梅赫默德的那个保守的辅政大将军，生怕欧洲人会向希腊人提供新的援助，建议停止围攻。但是这位苏丹在其他将军的支持下，决定继续攻城。1453年5月29日凌晨，最后总攻开始了。在一批批非正规部队和步兵进攻之后，近卫兵团挥戈上阵，一举登上了城楼。拜占庭的末代皇帝康斯坦丁十一世帕利奥洛古斯，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默默死去。这座城市任凭土耳其士兵洗劫掠夺，不过其破坏程度，可能还不及1204年拉丁民族十字军讨伐者的烧杀抢掠。随后，梅赫默德苏丹，日后臣民尊称为“征服者梅赫默德”，恢复了治安，开始重建工作。

第二罗马在长达数世纪的抵御之后终于落入穆斯林之手，像这样富有戏剧性的历史事件，在后来欧洲人看来，似乎是标志中世纪终结、西方文艺复兴发端，以及开始探索通向远东的贸易新路线的突变性事件。他们认为，它导致哥伦布等人的划时代的海上航行。这种与史实不符的奇想现在已被破除了，因为文艺复兴以后对新世界的探索在此之前早已开始。诚然，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时，确实有些欧洲人悲叹这是对基督教以及人文主义学识的打击——“荷马的第二次死亡，柏拉图再次被淹没”。西方的另一种反应是恐惧，接下来是否该轮到意大利、波斯尼亚或匈牙利了？于是又有人在谈组织十字军讨伐的事，结果也只是止于空谈。然而，在1453年及以后几年西方的主要反响，似乎出于这样一个共同的观点：希腊人是罪孽深重、腐化堕落的教会分裂者，遭受厄运也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们脱离了真正的罗马教会。有些西方

人士在土耳其战胜希腊人的史实中，见到了古代特洛伊人的报复，因为人们有时认为土耳其人同特洛伊人在血统上可算是一脉相承。所以3年以后，尽管罗马教皇卡利克斯图斯三世在奉告连祷文中，加了“仁慈的主，把我们从土耳其人和彗星的灾难中解救出来吧”这么一句请愿词（1456年出现了哈雷彗星），但对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并没有激起什么反响。

然而，就土耳其人来说，征服君士坦丁堡（他们一般都称作伊斯坦布尔）决不止是攻下一座孤城。它首先是“信仰武士”的盖世奇功，攻下了有千年历史的异教中心。圣索菲亚教堂，里面的圣像全已搬掉，镶嵌图案也全部覆盖掉，成了一座清真寺，但土耳其人仍叫它圣索菲亚。征服者梅赫穆德驾临此城时，也来这儿做过祈祷仪式，先由阿訇背诵一段伊斯兰信经，然后做祈祷。该城的征服提高了土耳其人在古老穆斯林中的威望，他们来自这个世界，现在仍属于这个世界。此外，伊斯坦布尔不仅在实际领土上，而且在具体象征上，把古老的安纳托利亚和新鲁梅利亚联成了一体。这并不是说土耳其直到征服此城之后才一跃而为欧洲强国，土耳其本来就是欧洲强国了，而现在这一事实得到了进一步证实。打那以后，不但组织十字军讨伐、营救希腊人的君士坦丁堡的机会已丧失殆尽，欧洲的这个或那个统治者，这一或那一派别，甚至罗马教皇们，也开始巴结这个城市的奥托曼统治者，让他们在变幻不定的欧洲均势中成为自己的同盟。

更重要的是，土耳其人手里的这座城市，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出色的军港和商港，提供了一个扼守贸易通道交叉口的

据点。梅赫默德苏丹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也证实这个城市在海运和经济方面的重要性。他立即着手重建这个帝国中心，拜占庭临末日时，该城的人口已下降到8万左右。为了充实伊斯坦布尔及其郊区的人口，他从全国各地抽调来手艺人、商人、农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他除了下令修建一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大清真寺外，还下令修建道路、商旅客栈、澡堂以及一座漂亮的市場。在他临朝执政的其余年间（1451—1481），不断地从巴尔干半岛、黑海沿岸以及爱琴海诸岛一些新征服的地区，把一群又一群的当地居民遣送到伊斯坦布尔来安家工作。

伊斯坦布尔的重建不单单着眼于经济，还有帝政方面的考虑。这是新的都城，有了这座都城，奥托曼国就继承了光华显赫的帝国传统，这种帝国的光华，即便在此城最黑暗的年代里也在熠熠生辉，它不能不影响到都城的新主人。梅赫默德此时又在他的头衔上加上两个新的称号：“罗姆凯塞利”（“罗马”或“拜占庭皇帝”）和“两片陆地（鲁梅利亚和安纳托利亚）、两座大海（黑海和爱琴海）的统治者”。既然土耳其人自塞尔儒克早期年代起就同希腊人保持接触，尔后又 在欧洲同希腊人打了一个世纪的交道，所以把1453年看成是他们兀然接受拜占庭传统和习俗的年代标志，那未免太傻了。至于其中究竟从拜占庭文化中直接借鉴或继承了多少东西，今后仍有争议；拜占庭对土耳其人的某些影响，肯定在此以前就通过阿拉伯人渗透了过来。然而，拜占庭的帝国传统无疑是同这气势威然的都城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统治的威仪，再经主要文化中心的光华一烘托，越发显得壮丽威严了。梅赫

默德二世不只是个好战的赳赳武夫，还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据记载，他精通波斯文学和阿拉伯文学，能讲塞尔维亚语，也许还能讲意大利语；至于说他还懂希腊语，那就不足为信了。他开始把有学问的学者网罗到宫廷里来，其中最受宠爱的是位希腊哲学家。伊斯坦布尔将恢复成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对土耳其人来说，伊斯坦布尔的征服，象征着他们已完成了由边远草原到帝国的这一历史变迁。

第三章

奥托曼帝国的黄金时代 (1453—1566)

也许在奥托曼土耳其人拿下伊斯坦布尔之前的一个世纪里，他们中间就流传着关于“红苹果”的神话。“红苹果”是谁都渴望到手却又远不可及的神物，是异教徒世界的某种奇异力量的象征，一旦把它拿到手，就能最终统治全世界。“红苹果”的直接焦点，是杰斯廷尼安一世骑马塑像执在手中的一个熠熠闪光的镀金金属球，塑像就矗立在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前面。1453年以后，神话中的那个焦点又移到西面去了。“红苹果”总是在一些尚未征服的基督徒国度里。土耳其人常常把它和罗马，兴许和圣彼得大教堂华光闪闪的圆顶联系在一起。有时也会把它和布达、维也纳等基督徒城市联系在一起，总之，它在离奥托曼帝国边界不太远的地方，频频向他们招呼示意哩。

在伊斯坦布尔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后的一个世纪里，帝国一直在继续向西扩张，有时在这儿或那儿暂时被阻挡住了，但

随后又获得了新的势头。与此相配合的还有它在东部的扩张。土耳其人军事上的胜利，大大扩展了帝国的疆界，从布达到巴斯拉，由阿尔及尔至亚美尼亚，从亚速海至亚丁湾，全是土耳其人的天下。武力征伐的成果，更借助于一套军事和政治机构而得以巩固，这套随着帝国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机构，在 16 世纪之前颇行之有效。随着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胜利，似乎渐渐出现了相当稳定而繁荣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不过这一点我们还不能说得十分肯定。至于这一时期奥托曼人在文化上取得的独一无二的成就，那可是毋庸置疑的。军事上的胜利，政治机构的形成，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繁荣，文化的高度发展，所有这些总合在一起，就给 16 世纪打上了“奥托曼帝国黄金时代”的标记。在以后帝国江河日下的年代里，一些未来的改革家们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总是不胜依恋。既然昔日繁华盛世已一去而不复返，依恋怀旧之情就只会对亟需的改革起阻碍作用。某些曾取得卓著成效的军事、政治体制，某些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观念，到时候反会成为沉重的包袱——这些在当时自然无法预见到的。大片领土的获得，也同样是这种情况。

征服者梅赫默德拿下伊斯坦布尔并着手重建之后，立即把注意的重点放在如何作进一步的武力征服上。虽然他吞并了安纳托利亚中南部卡拉曼尼亚的突厥族酋长国，但是他的武力征服大部分还是在基督徒国土上进行的。梅赫默德在黑海地区也作了部分扩张——瓦拉几尔成了他的仆从国，特拉布松的希腊族邦国被征服了，克里米亚鞑靼可汗国，连同热那亚贸易中心、有悠久历史的著名奴隶市场卡法，也一并沦

为他的附庸。黑海差不多快要变成土耳其人的而不是基督徒的内陆湖了，尽管有一段时期仍容许意大利货物托运人在这儿从事贸易。梅赫穆德进行扩张的主要地盘是在巴尔干半岛：一方面，将一些早已成为附庸国的地区再次征服，置于他的直接统治之下。另一方面，则是对新的地区进行武力征服。

梅赫穆德的成功，不可避免地将他抛入欧洲的政治旋涡之中，特别因为他现在是同气势不凡的海洋帝国威尼斯匹面对阵，而威尼斯自身就卷在欧洲的权力之争中。威尼斯在意大利半岛上的对手，在拼命鼓励奥托曼人；反过来，威尼斯也竭力想从肆意扩张的奥托曼人的天然敌人那儿谋求到支持：如统治伊朗西部地区的土库曼首领乌宗·哈桑、卡拉曼尼亚地区的酋长们、阿尔巴尼亚的英雄斯坎德贝格等。在梅赫穆德的大部分统治年代，同威尼斯的海战一直在时打时停，结果是土耳其人占领了威尼斯在爱琴海的一些岛屿，而且在亚得里亚海沿岸一路袭击，几乎打到了威尼斯的大门口。还有另一个结果，奥托曼帝国的海军总算逐步建立了起来。撰写梅赫穆德传记的当代作家克里托沃洛斯说，梅赫穆德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结论，海上力量是成功的关键，于是他下令建造多艘设有三层桨座的大型战船。马汉船长在几个世纪前所得出的这条教训，日后对梅赫穆德的继承者们也发生着作用。梅赫穆德没能把两个关键性的战略要地抓在自己手里：多瑙河上的重镇贝尔格莱德，还有海岛要塞罗得岛，而圣约翰骑士团正是以罗得岛为基地，对穆斯林海岸以及穆斯林海运频频发动攻击的。意大利半岛上的基地奥特朗托，土耳其人只占据了一年就放弃了；征伐意大利的计划显然被取消了。

在梅赫默德继承人巴耶泽德二世统治期间（1481—1512）所进行的这种领土扩张，也同样是在牺牲威尼斯的情况下取得的。莫里厄半岛南部边缘的大部分威尼斯海港，尽落入奥托曼人之手。威尼斯这个海上强国，此时已是日过中天（其原因之一是，葡萄牙人环绕非洲的航行，开辟了一条通往远东的全海航线，沉重打击了中间商贸易），面对着遍及黑海、爱琴海及东地中海的奥托曼人，更是显得黯然失色。奥托曼海军在建立过程中，也收编海盗的船只——基督徒也罢，穆斯林海盗也罢，一概兼容并蓄——他们1501年向西侵袭的范围，“直远至巴利阿里群岛，其收获之一是，从西班牙水手那儿俘获了一份早年哥伦布使用的航海图。到巴耶泽德王朝结束时，奥托曼人就其版图来说，不仅在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的核心之地取代了拜占庭帝国，而且还在克里特岛及塞浦路斯以外的地区取代了威尼斯海上帝国。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是威尼斯在拜占庭国没落时期夺到手的。

在奥托曼帝国忙于同威尼斯交手的时候，东方又出现了新的威胁，迫使它不得不把领土扩张的势头从欧洲转移开去。在国王伊斯梅尔统治下重新崛起的伊朗强国，不仅威胁着奥托曼帝国的东部边疆，而且在帝国境内连连制造骚乱。伊斯梅尔奉什叶派教义为伊斯兰国教，在宗教上公然同属于逊尼教派的奥托曼苏丹分庭抗礼。这样，他就能影响安纳托利亚地区内各非正统教派，使他们进一步倒向什叶教派。托钵僧、泛神论神秘主义者沙赫库利在那儿发动了一场大规模叛乱，很快便被巴耶泽德弹压下去。但是在土耳其人称之为“红脑瓜”（因伊斯梅尔的追随者均头戴红帽而得名）的异端教徒中

间，仍潜伏着反叛的危险。巴耶泽德的继承人、被其臣民称作“冷酷者”的塞利姆（在位年代 1512—1520）准备对伊斯梅尔发动一场征战。据记载，他首先将安纳托利亚的四万名“红脑瓜”教徒斩尽杀绝，随后在 1514 年，率近卫兵团攻入伊朗在查尔迪兰击败伊斯梅尔军队之后，一举占领塔布里兹。塞利姆很可能还想在这场逊尼派逞兵耀武的征伐中乘胜向东推进。但是他麾下的近卫兵团显然反对这种做法，因为近卫兵团成员多属欧洲籍士兵，不愿远离故土。

于是塞利姆不再作征服伊朗的打算，而是挥戈向南，近袭埃及的马姆卢克王朝。埃及马姆卢克王朝也统治着叙利亚，它除了本来就同土耳其人闹边境纠纷，而且此时还准备出兵帮助伊斯梅尔。1516 年，马姆卢克族苏丹及其麾下骑兵在叙利亚境内被击垮；1517 年，他的继承人和马姆卢克族残余部队又在开罗战败。奥托曼人的节节胜利，主要得归功于他们的新式武器；他们拥有大炮和火枪，由西班牙逃出来的犹太难民为他们制造火药，而意大利雇佣兵则为他们提供炮兵技术。于是叙利亚和埃及沦于奥托曼人的统治之下，历时 400 年之久。

这一方天地属于古老的伊斯兰世界，位于陶鲁斯山脉之南，而几个世纪来，陶鲁斯山脉一直是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世界，即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的分水岭。现在拿下这片土地，就中断了，实际上是脱离了奥托曼人的征服传统——在此以前，征服的范围一直限于拜占庭在公元 7 世纪面临阿拉伯人进攻时所领有的那片疆土。塞利姆扩张南下，与阿拉伯文化又有了新的接触，除了原有的波斯和阿拉伯影响之外，

土耳其人现在又接受到新的影响。此外，这次扩张使大马士革和开罗这两座具有历史意义的穆斯林都城，以及麦加、麦迪纳和耶路撒冷这三座伊斯兰圣地，全都归顺于伊斯坦布尔。经常听到这种说法：“幽灵”哈里发（教首）一直寄身于马姆卢克王室统治下的开罗，现在落到了奥托曼人手里，于是他便把自己的头衔正式转交给了塞利姆。这纯属无稽之谈，不过，奥托曼人与传统的伊斯兰世界的联系，确实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伊斯坦布尔的苏丹们成了古老伊斯兰世界的主要力量，成了各圣地的保护人；现在他们使用“虔诚信徒的首领”这个封号（最早采用此衔称的可能是梅赫默德二世），理由更充分，而且得到更多的穆斯林教徒的赞同。所以，奥托曼土耳其人在抵达多瑙河一百多年之后，又终于来到了尼罗河，而且正向幼发拉底流域进军，把古老的伊斯兰旧世界同信仰武士征服的新世界联成了一体。

漫长的苏里曼王朝（1520—1566）也同样自始至终弥漫着东征西伐的硝烟。苏里曼首先想要做的是搬掉领土扩张中的两道障碍。贝尔格莱德，这座在匈牙利人支援下曾长期抵挡住土耳其人的骄傲之城，终于在1521年被土耳其人所占领。罗得岛——该岛上桀骜不驯的骑士曾不断骚扰土耳其、埃及之间的海上通道——也于翌年遭到围攻并沦于敌手。现在苏里曼已无后顾之忧，而通向多瑙河上游的道路又豁然敞开着，于是他发动一系列征战，攻入匈牙利平原，继而推进到哈布斯堡王室统治的奥地利国土上。促使苏里曼不断向前挺进的动机，不仅是为了满足近卫兵团四下征战劫掠以觅取“红苹果”的欲望，也不仅是由于同匈牙利人素有摩擦，而且

还出于欧洲政治的需要。法国皇帝法朗西斯一世陛下，在帕维亚为哈普斯堡王室神圣罗马皇帝查理王世陛下所击败，于是敦促穆斯林苏丹出兵对付哈普斯堡王室。1526年，苏里曼大军在莫哈奇击溃了匈牙利骑士精锐部队，暂时占领了布达。3年后，苏里曼再次率领部队进入匈牙利，这次是应匈牙利王位候选人的请求，帮助他对付哈普斯堡王室觊觎匈牙利王位的竞争对手。苏里曼再次拿下布达之后，即拥兵围攻维也纳。但是由于缺少重炮，再加上受到补给线过长、秋雨连绵等因素的掣肘，他未能击垮城内的顽强抵抗，因而也就从土耳其西进的这一最远点撤离回去。然而，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仍藩属于奥托曼帝国，而哈普斯堡王室为了继续领有匈牙利西北部那份疆土，每年也得向这位苏丹纳贡。大部分匈牙利平原起初由一位享有自治权的统治者管辖，不过得向苏丹纳贡称臣，随后再经过几次征战，便被直接并入奥托曼帝国的版图。

奥托曼同哈普斯堡王室之间的交锋，并不限于多瑙河流域，双方从陆地打到了海上，海战遍及地中海海域。在整个苏里曼王朝期间，战局时好时坏，不过总的来说，土耳其海军将领，如可能有希腊血统的巴巴罗沙元帅，还是成功地遏制住由哈普斯堡王室发起、并有威尼斯参加的神圣同盟。结果，奥托曼土耳其人的控制范围，由北非海岸一直延向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他们最明显的失败是马耳他，这个岛屿成功地顶住了土耳其的进犯。土耳其人的西进，可算顺带帮了基督教宗教改革的忙，却引起了中欧诸国的“恐土耳其症”。然而这对法皇法朗西斯一世毫无威慑作用，只要符合他的意

图，他就始终是土耳其人的盟友。他在 1536 年和土耳其人缔结了商业合作友好条约，这份条约直到 20 世纪还在生效。

同哈普斯堡王室的战争，还产生了别的作用——重新挑起了奥托曼同伊朗之间的敌对情绪，因为哈普斯堡王室竭力敦促波斯人进攻苏里曼，以抵销法土合作的影响。同伊朗经过两场交锋，苏里曼在库尔德斯坦地区又赢得新的胜利，虽说他也和父亲塞利姆一样，没能长期占领塔布里兹。然而他倒是把伊拉克从波斯人手里夺了过来，并入了帝国版图。这一来，他把古老的伊斯兰世界又一伟大都城巴格达置于帝国的控制之下，虽说此时的巴格达破落不堪，昔日的风姿已荡然无存。他还推进至波斯湾。由于受到这一胜利的激励，他试图粉碎葡萄牙人对波斯湾和印度洋贸易的扼制，这样他的帝国就能在东方贸易中恢复中间商的主导地位。早先，埃及的马姆卢克王室也试图驱走西方侵略者，结果没有成功。现在，一支奥托曼舰队已从波斯湾驶抵印度，但是又被葡萄牙人赶回波斯湾来。对葡萄牙人的其他军事行动也均告失败。不过，土耳其人占领了亚丁湾和红海南端的也门，于是红海也像黑海那样，成了奥托曼帝国的内陆湖。

1566 年，苏里曼再次陈兵多瑙河时，死于途中；奥托曼土耳其人可以有时间回顾一下自占领第二罗马以来一个世纪东征西伐的辉煌战果。他们在原为希腊人拥有的那一方天地之外，又添加上阿拉伯人的世界。甚至这也还不是帝国疆域扩张的外侧界限；进入 17 世纪之后，别国的土地仍纷纷落入他们之手。但是土耳其人毕竟遇到了两重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无法拿下维也纳。1529 年第一次进攻遭到失败，兴许是运

气不佳，但此后 35 年里絮莱曼却再也组织不起第二次进攻，这就不是走不走运的问题了。西方的武器，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变得相对强大了。另外，土耳其人也无法把葡萄牙人从印度洋上撵走。尽管他们靠木桨划动的战船封锁住地中海，似乎也得逞于一时，但他们毕竟无法与西欧的大西洋航海家抗争——他们环绕非洲来了个冀侧包抄。尽管地中海贸易没有立时土崩瓦解，但是蓬勃发展的大洋航线贸易，他们连一杯羹也分享不到。由于奥托曼人的帝国此时自然是欧洲强国之一，兴许可算 16 世纪中叶欧洲最强盛的国家，他们当然不能领会到这些不祥之兆。但是，欧洲比起对手土耳其来，经济和技术都发展得较快；而奥托曼帝国由于幅员辽阔，兼跨三洲大陆，再加上海岸线又特别长，无论在外御或是内治方面，都会遇到异乎寻常的难题。

然而此时此刻，一切似乎都安然顺当。经历了包括苏里曼在内的最初十世苏丹王朝的治理，奥托曼人精心搞出了一套政府机构，既可以让他们兼并新征服的领土，又能把它们相当牢固地粘合在一起，既可有效地管理治安、税收，又能维持住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对新夺来的国土，起初一般采取这样的兼并办法：仍由当地的统治者掌权，任他是穆斯林也罢，基督徒也罢，但得处于一种藩属地位，每年须向苏丹缴纳一定数量的贡金，并提供规定数量的兵员。有一些日后被受之为“特许区”的边远地区，如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等多瑙河邦国，一直保持着这种地位。但下一步，往往就是将已征服的领土直接并入版图，通过军事采邑制来确立奥托曼人的统治。

从理论上来说，全部土地的终极所有权是属于苏丹的。他可以把大片田产划归己有，由手下的官员管理，每年向他交赋纳税。他也可以把财产所有权让渡给私人或慈善基金机构。但是在奥托曼向外扩张期间，大部分可耕土地都是分配给骑兵的，他们也就成了采邑承受人。采邑的岁入由承受人征收，这实际也就是他的薪俸。农民缴纳的农产品什一税，是他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不过他也还享有其他权益。他应尽的义务是，根据采邑的规模和价值，提供一定数量的戎装士兵。这种办法，以前塞尔儒克族和拜占庭国也都采用过。到奥托曼人手里也多系承袭沿用，并未作重大改革。虽说随着采邑制的确立，当地的王朝统治也就废除了，但是当地的贵族和军事首领，甚至安纳托利亚地区和叙利亚境内的部落首领，也都被授予采邑，从而收编进奥托曼统治阶级。早期年代，有好多采邑承受人是基督徒——到16世纪这种做法就很少了——而其中大部分人后来似乎都成了穆斯林。任命大权仍然操在苏丹手里，他可以把采邑授予原承受人的儿子——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但不容许存在封建贵族的世袭权利。

为了计算财政税和分封采邑，苏丹们要对每个省区细加考察。他们的代理人则将村落人口、土地、庄稼、牲口——登记入册。尽管现在所保存的登记册，最早的日期是1431年，其实在14世纪就采用了。当巴耶泽德一世使用这种登记册时，有些保守分子就加以反对，不自觉地重复了盎格鲁萨克

逊年代史编者对《末日判决书》^①的一句评语：要是把每头公牛和每头母牛登记入册的经过情况都讲出来，“实在有失体面”。这些簿册在当时是政府实施控制的有效工具，在今日则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

采邑分属各个省区。省区是帝国的军事和行政基本单位。省督是苏丹派驻各省的首席长官，战时指挥骑兵打仗，平时则负责社会治安，贯彻行政决议，执行法律。在帝国早期，全国共设两名总督，一名主管安纳托利亚各省，一名主管鲁梅利亚地区。随着奥托曼疆域的扩展，全国任命了更多的总督。

到了15世纪后期，由于新式火器的出现，用兵打仗的特点也有所改变。骑兵的作用已不是那么重要。要组织、训练步兵和炮兵，苏丹们就不能再依靠采邑制度，而得由中央机构来干，这一来就需要现金，用采邑提供兵员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于是，16世纪的政府体制就开始反映这种变化。有些早期采取岁入形式的封地，后来（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就转化为缴纳税金的农庄——提供现金税收的行政单元。匈牙利和叙利亚刚并入帝国时，采用的就是岁入制，到了1607年，叙利亚就改用纳税制。埃及被奥托曼征服后，就采用以纳税农庄为基础的制度，每年向伊斯坦布尔输送资金，以维持帝国的常备部队。

当然，自奥托曼帝国早期年代起，就一直设有步兵部队——非正规军、少许正规军、仆从国部队以及近卫兵步兵精

^① Domesday Book，指1086年英王威廉一世颁布的全国土地、财产、牲畜、农民的调查清册。——译注

锐部队。随着帝国的扩大和作战方式的改变，有组织的正规步兵部队也就越来越多，而且也为他们规定了新的职能。近卫兵团日益扩大。在梅赫默德二世年代，近卫兵团人数仅12000人左右；而到了苏里曼王朝时，人数估计高达40000人。近卫兵团的成员是奴隶武士，是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直接隶属于苏丹。起初，士兵队伍里满是战俘或出钱买来的奴隶。日后逐渐形成一套从基督徒臣民的男孩中募集兵丁的制度。这种做法很可能开始于穆拉德一世王朝，不过其起源由来似乎还不太清楚，到了穆拉德二世王朝年间，名为“德米舍梅”（征募）的征兵制似乎已趋于制度化了。每隔5年左右，就从基督徒家庭征募来一批十几岁或年纪更小的男孩，经过筛选、测试，再在各种学校中接受训练，然后就编入近卫兵团。新兵中的一些尖子，被选送去接受高一级的宫廷或行政训练，而大多数则是进近卫兵团或其他常备部队。尽管经常有人写文章说，征兵制的实施仅限于巴尔干半岛的基督徒——新兵主体确实是巴尔干的希腊人、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但是现在已经清楚地知道，至少从15世纪中叶起，征兵制也同样适用于安纳托利亚地区。对近卫步兵的要求是不得结婚娶妻，不过到苏里曼王朝期间，这条规定已逐渐失效。他们组成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作战部队，常使奥托曼的敌人丧魂落魄。在战斗中，他们往往用作后备军，不到关键时刻不轻易上阵。然而，他们也成了一支国内的政治力量。早在15世纪中叶，就平息过一场近卫步兵的叛乱，从梅赫默德二世开始，每一位苏丹登基时照例要分发一批“近卫步兵饷银”，以确保兵团的忠诚。

从募集的新兵里，奥托曼苏丹们也选取了一些青年，让他们在各类宫廷学校内接受训练。其中的精华就在帝国宫廷中担任侍从官，在所谓的“内廷服役”中继续接受教育。塞尔儒克人和其他东方王朝都曾使用过奴隶出身的行政官员，而奥托曼苏丹早就开始沿用这种做法。奴隶们经过训练之后，在宫廷内担任要职，有时还分配去当税吏、省督，或担任其他重要行政职务。然而在征服伊斯坦布尔之前，包括辅政大将军在内的最高职务，一般是由穆斯林，而且还是出身于名门望族的穆斯林担任。后来，新兵中涌现的新的杰出人物，使旧有的杰出人物黯然失色，而此后的二百多年里，不但省督、高级军事指挥官，而且还有辅政大将军，几乎无一例外地是由新兵出身的人担任的。他们都是梅赫默德二世在新都伊斯坦布尔设立的宫廷学校里培养出来的。这类学校所设置的课程，要比传统的穆斯林学校多，学生要学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波斯语；要研读古兰经；要吸收一些历史、数学和音乐的知识，要精通骑马术，会使用各种武器；要经受严格的体育训练；要学一门工艺或手艺，还要学会各种礼节。这样的毕业生——从理论上来说，经过14年的教育培养，不但是健全的穆斯林、苏丹的赤胆忠心的仆人，而且还是学者—运动员—绅士三者兼集一身的英才——已具备一切条件，足以胜任苏丹王室的内廷官员或是帝国的行政官员了。

这种选才制度，有时当然会博得一些欧洲人的好评，在他们的王国里，贵族出身乃是担任高官要职的关键。在苏里曼王朝期间，奥皇查理五世派驻伊斯坦布尔的大使曾这样写道：

在土耳其人当中，丝毫不看重出身；对某个人的尊重程度，是按他在公务中所担任的职务来衡定的。苏丹在作出任命时，并不注重财富和等级这一类假象……他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考虑取舍的……人们在部门中得到升迁，靠的是功绩。这种制度保证了各种职务只委派给能力相称的人。在土耳其，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祖宗家系，还有自己的命运前程，掌握在自己手里，至于是成是毁，那就全看他自己了。

经征兵制度训练过的奴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奴隶；他们可以拥有财产，也有个人权利，但是作为奴隶，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则听凭苏丹一个人任意处置。不可避免地，有些被征募到新兵行列里的基督徒青少年，试图逃跑，他们的家庭也竭力反对被征募，有时甚至发展到公然对抗的程度，但是对那些接受宫廷训练的年轻人来说，大好机会、锦绣前程就展现在他们面前，而奥托曼帝国的社会精华，正是通过他们才不断被注入新鲜血液的。

帝国疆域的扩大，使中央政府机构变得相当庞杂。大量日常事务是由录事，即记事官来办理的，这些记事官在总体上构成了一个我们不妨称之为“笔吏”的集团。他们包括各种各样搞笔头记录的书记员，其中最重要的是财务书记官，受首席财务书记官领导。在帝国早期年代，首席财务书记官是最有声望的政府官员之一。奥托曼帝国可算是个征税的组织

机构。政府的职能，除打仗外，就推收税的事最重要了；当然，要给军队提供资金，也少不了税收。非穆斯林缴纳的人头税、关税、帝国田产的收益、矿山收益、附属国的贡金以及其他各项财政收入，都得一一记录在册，而且得随时入册。不时，还要巧立些新名目，征收新的税款，这一来，就得辟设个新的办公署，或者新添个记事官，负责登录各项收入来源，于是官僚机构就膨胀了起来。大部分记事官似乎都是穆斯林出身，好多还属于乌莱玛阶级——乌莱玛成员都是些受过穆斯林神学和法律训练的，学问渊博的“有识之士”。官僚机构的另一个主要部门，涉及一般行政管理，特别是涉及书信往来和帝国法令的事务。这个部门也同样在日趋扩大。

按照奥托曼人的看法，权力离不开军队，军队离不开税收，税收离不开社会秩序和生活安定，而社会秩序则离不开执法。于是，除了保护帝国安全的士兵和负责税务的行政官员，法官就组成了政府体制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每个省区及其下属行政区，都有各自的卡迪（民事法官），由苏丹直接任命，不受省督的管辖。他们不但引用苏丹制度的法令，还援用传统的伊斯兰宗教法。法官是乌莱玛的成员，是伊斯兰政治中起决定作用的成分。在奥托曼帝国内，政府授权他们组成一个僧侣统治集团，他们在政府中的地位，比以前任何穆斯林国家的法官都要高。伊斯兰宗教法渗透到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乌莱玛阶级也包括学校教师（学校往往附属于清真寺）、阿訇和法典诠释官。居于帝国黄金时代政府最高层的是法官长。起初只有一个法官长，但是在帝国疆土大幅度扩张之后，全国设有两名法官长：鲁梅利亚地区一名，安纳

托利亚地区一名。

苏丹王凌驾于整个军事和行政统治集团之上，是奥托曼帝政制度中权势最显赫的人物。自梅赫默德二世王朝起，苏丹专制独裁的程度，已达到当时环境及通讯条件所容许的最大极限。尽管自奥托曼至苏里曼这头 10 位苏丹，在人品和领导素质方面具有很大差异，但他们个个都很能干，有些则有雄才大略，十分出众。在他们还是王子的时候，他们照例都在省区机构任职，取得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有时还要积累一些军事方面的经验。王位固然是父子相传，但不一定非得由太子继承。有时候兄弟们为继承王位不惜同室操戈，血溅宫廷，其中最富有戏剧性的，要算巴耶泽德一世败于铁穆耳之后王子间发生的那场 10 年王位之争了。某个王子继承了王位，如果他还有兄弟活着，那这位兄弟就有可能因觊觎王位而闹分裂，危及帝国的一统天下。巴耶泽德二世的兄弟热姆就曾构成过这种威胁，而且双倍的严重，因为他逃到了国外，而他对继承王位的要求，很有可能被奥托曼国的欧洲敌人用作结盟发动“十字军征战”的口实。为了使临朝执政的苏丹免受这种挑战，弑兄戮弟就逐渐成为惯例。新苏丹一即位登基，就用丝质弓弦将活着的兄弟一一勒毙；为这种残酷做法辩解的理由是：社稷不安要比丧失几条人命更糟。头 10 位苏丹的王朝比较稳定，统治年代也比较长，平均在位 27 年，这也许可以作为例证。虽说某个王子能登上王位，也得归功于朝廷命官和近卫兵团的协助配合，但这个王子往往是诸兄弟中最能干的一个。直到苏里曼王朝为止，苏丹一般都是亲自领兵挂帅的。

到梅赫默德二世王朝为止，苏丹都亲自主持御前帝政会议。打那以后到苏里曼王朝期间，苏丹则是“垂帘听政”——在屏风后听国务会议审议国事。在16世纪，国务会议每周有4次例会：上午是公开会议，听取请愿和控告；午饭后即转入内部会议。这个会议的成员构成，历代以来未出现多大变更。会议由苏丹的化身、首席执行官辅政大将军主持，几位“圆顶将军”（所以冠之以“圆顶”，是因为国务会议是在托普卡皮宫的圆顶会议室召开的）、两位法官长、两位首席财务书记官，以及类似当今国务大臣的枢密官，组成国务会议的核心，另外还有一些官员列席会议，有时也参与议事。国务会议还设有秘书处，统管帝国中央行政机构下属各办公署。

属于所谓“奥托曼时代统治集团”的，不仅有这些中央机构的命官重臣，还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军人、新兵出身的官员、笔吏以及上面提到的“乌莱玛”。奥托曼人称这个统治集团为“阿斯喀里”阶级，字面意思是“军事长官”阶级，尽管其中也有文职官员。这个阶级并非是排外的封闭集团。通过学校教育、杰出的服务或是经过征兵制的训练，一些人也能步步升高，进入这个集团，但趋势越来越明显，特权阶层的后代总是得天独厚，往往近水楼台先得月。那些领有“将军”军衔或是拥有“帕夏”头衔的文武官员，居于这个统治集团的最高层（“将军”、“帕夏”这两个用词，最初是和高级军事指挥官或省督相连在一起的）。“帕夏”中也分各种等级，由他们旗标下面所挂马尾巴的多寡来表示。只有苏丹一人，旗标下面可挂6条马尾巴。辅政大将军和其他“将军”挂3条马尾巴，总督挂两条，省督挂一条。“埃芬迪”（efendi）是

加在笔吏和乌莱玛成员头上的官衔。这个统治集团的所有成员，用通俗的话来说，是为信仰和国家服务的，是奥托曼国的识途老马——精通奥托曼的文字语言和习俗，熟谙上层社会的规矩和礼节。这个“军事长官”阶级是无须纳税的。

帝国内的其他人，穆斯林也罢，基督徒也罢，犹太人也罢，一概都得纳税。这些人截然不同与统治者，是属于“雷阿雅”——被统治者。被统治并不意味着被压迫。一般人认为，到16世纪为止，凡是确立了奥托曼人统治的地方，各个民族从整体上看，日子过得比以前好——生活更安定，执法较公平，没有太多的苛捐杂税。生活条件，包括纳税和其他义务，因地制宜。因为奥托曼人对以前各地区的当地习俗和社会惯例，并不一概排斥，而是采取兼容并蓄的做法。事实上，帝国是个集各种权利、义务、习俗、人种之大成的混合体，特别是各族人口——16世纪帝国人口也许有5000万。每个人在他那一方生活天地里都被认作各得其所，他们也就应该各守其位。各个团体之间具有经济、社会、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差异，而最重要的无疑是宗教方面的差异，而其他方面的许多差异都可包括在这一差异之内。

帝国内的主要宗教团体，除穆斯林外，还有希腊正教、亚美尼亚格里高里教派和犹太教。虽说信奉希腊正教的多属巴尔干半岛的农民，亚美尼亚格里高里教派教徒多为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农民，而犹太人大多为城市居民，但是各种宗教团体或教派团体并非按地理位置划区划块分布的，相反，在整个帝国内所有宗教或教派团体都是相互混杂在一起的。从一方面来说，宗教或教派团体的这种四方杂处模式，在奥

托曼人来到之前就或多或少存在着；从另一方面说，这也是由于帝国的东征西伐、信仰的改变以及移民流入而造成的。另外，出于边境防卫、地方治安、使游牧部落定居下来，或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考虑，政府有意采取了将各类居民团体迁徙至新地区定居的做法，也进一步促成了不同宗教或教派团体的混杂相处。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都在相互交往。这种各色人等四方杂处的情状，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英国旅行家的仆人曾这么写道：“在土耳其所有的城市里，每周有三种安息日：土耳其人逢周五休息，犹太人逢周六休息，而基督徒则在主日休息。”讲到他在巴尔干半岛一家商旅客栈所见所闻时，又说：“你在这儿会同时遇到土耳其人、犹太人和基督徒，也会同时遇到正人君子和小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曾作为俘虏在阿尔及尔呆过一段时间，他发现这座城市同样人种混杂。他说：城里有阿拉伯人、柏柏人、犹太人和土耳其人——土耳其籍的土耳其人往往是最出色的官员。尽管表面上他们往来密切，混杂相处，但在实际生活中还是遵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一准则的。造成这种宗教隔离的根由，不但在于各教派的信徒总倾向于聚居在各自的村落或各自的城市住区内，而且还在于苏丹们采取了“分教而治”的做法，使各教派在政治上趋于制度化了。

征服者梅赫默德正式使少数派宗教团体成为政治团体。在拿下伊斯坦布尔之后，他任命希腊正教的一位头面人物为帝国内希腊正教徒的大主教和文职首领。同样，他也分别任命亚美尼亚教派教主和伊斯坦布尔的犹太教大教士为各自“教区”的首领。授权于教区首领，再通过他们传递给下属全

体教士，这种权力不仅仅限于教堂管理、膜拜仪式、教育和慈善事业等一般性事务的处理，而扩大到对教友们世俗地位的监督管理。其中还包括司法权和征税权；而犯罪案件照例是由苏丹手下的法官审理的。因此，“分教而治”的教区制度，也就成了政府手里的一个工具。

苏丹承认教区享有自治权，也反映了伊斯兰教对归顺穆斯林统治的“圣经信徒”的传统宽容态度。然而宽容并非意味着平等。在改变信仰的问题上，不平等表现得最为明显。基督徒和犹太人可以自由地成为穆斯林，但是对穆斯林来说，背教就意味着死亡。非穆斯林休想在政府中担任要职，除非他已皈依了伊斯兰教。非穆斯林还受到某些限制——例如，基督教堂不得使用大钟。但是16世纪奥托曼帝国境内非穆斯林的命运，往往要比西欧少数派宗教团体的命运略胜一筹；在西欧，基督徒迫害犹太人，天主教徒压迫新教徒，而新教徒只要有可能也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明证之一：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有大批犹太人流入奥托曼国，随身也带来了他们的财政、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知识。这些不仅对帝国的经济发展有利，而且对苏丹们的行政管理和军事也不无益处。似乎也有相当数量的德意志、奥地利和匈牙利农民移入奥托曼帝国，他们兴许是出于经济上而非政治上的动机。非穆斯林被排斥在兵役征召令之外，但得缴纳一笔专门的人头税。尽管这涉及到法律上的不平等，但非穆斯林似乎很乐意接受这样的安排。

按经济和社会地位来考察，16世纪奥托曼社会包括这样三部分传统群体：游牧民、农民和市民。山区的或是沙漠地

区的部落牧民，数量很大，生活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和阿拉伯地区。他们一如既往地袭击居民点，给征税和维持社会治安制造难题。有关这一时期的奥托曼文件披露，政府又恼又怒，有时试图通过报复性袭击、抓人质、给部落首领封官，或是按旅行路线沿途设置新村落等办法，来遏制这些部落。作为帝国经济支柱的农民，在土地上干活，这些土地往往并非为他们所有，而是属于采邑或纳税农庄的一部分。一般来说，村民生活贫困，房屋简陋，他们的耕作方法很原始，落后于西欧。他们的母牛往往只有喂养得很好的西方奶牛一半大。然而，帝国在农业上尚能做到自给自足，还有粮食可供出口。土耳其官员和警备部队都集中在城镇里，所以城市和乡村（特别是在巴尔干半岛地区）提供了一幅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鲜明对比图。不过，城镇里也住有工匠和手艺人，其中好多是非穆斯林，另外还有商人，他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非穆斯林。工匠和手艺人都加入行会，行会则对其成员和产品实行监督，有些地方行会势力很大，足以有效地控制当地的政府。行会不但具有经济、互助的性质，而且还带有宗教、礼典的色彩，每个行会都有自己的保护神或守护圣徒。有些行会由穆斯林组成，有些由基督徒组成，也有些是两者兼而有之。

对外贸易得到苏丹们的鼓励。梅赫默德二世在拿下伊斯坦布尔以后，恢复了过去拜占庭年代给威尼斯提供贸易优惠的做法，同时也鼓励其他意大利城邦国同奥托曼国开展贸易。在15世纪末期，黑海不对西方基督徒商人开放，但是作为奥托曼国臣民的希腊人，则继续在那一带经商。土耳其人在传

统上多为士兵、行政官员或农民，一般不从事商业，他们把这个行业留给阿拉伯人、非穆斯林少数民族或西方人去干。虽说早先穆斯林在远东贸易中所起的中间商作用，受到了葡萄牙人的打击，但是到 16 世纪末期，通过像叙利亚阿勒颇这样一些贸易中心，通过红海，这种古老的贸易得以保存下来，而且有了新的活力。转口贸易以及同帝国本身的贸易，给了西欧人做生意的机会，而法国人更是捷足先登，他们同奥托曼人的政治、军事合作，为 1536 年友好合作条约的签定创造了前提。这份通商条约——这类条约日后被称之为“丧权辱国的条约”——记录了法国人在奥托曼帝国领土上所享受的各项特权：可以在奥托曼港口自由进行贸易，受法兰西法律和领事、而不是受穆斯林法官的管辖，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向奥托曼国纳税。日后其他西方国家也获得了类似的特权，强大的奥托曼帝国为了鼓励贸易，也任意给予这类特权，而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双方互惠的。如同对“教区”的处置，法律因人而异，而不是随领土而定。这种理论当时在西方已遭摒弃，但是在东方仍能为人所接受，于是欧洲人取得了治外法权，日后给土耳其人带来很大痛苦。

随着贸易和“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欧洲各国的大使也相继派驻伊斯坦布尔。法兰西第一任大使于 1535 年赴任；英国第一任大使在 1583 年抵达，不过路费并非由大英帝国承担，而是由地中海莱文特贸易公司支付。奥托曼王朝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在外交关系上表现得十分清楚：可以接受外国派驻的大使，但土耳其人不向国外派遣任何常驻性质的大使——只派遣执行特殊使命的公使。按照奥托曼人

的观点，外国人实际上是以请愿者的身份前来的。奥托曼人往往把欧洲的（有时还有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当作人质看待，有时待他们很坏。和平条约仿佛是苏丹恩赐给恳求者的，而不是经过双方平等协商而制订出来的。苏丹勉强把法国国王看作是和他地位相当的君主。苏里曼曾以这样的口气下书给法皇法兰西斯一世：

“朕乃苏丹之苏丹，君主中之君主，四海方圆内诸君主王冠的分配者，上帝在地球上的投影；联系管辖着白海（地中海）、黑海、鲁梅利亚、安纳托利亚、卡拉曼尼亚、罗姆国……大马士革、阿勒颇、开罗、麦加、麦迪纳、耶路撒冷、阿拉伯全部疆土、也门、以及崇高祖辈及赫赫先人（愿上帝光照吾先人墓地）借武力征服以及由朕本人以燃烧之剑、胜利之锋所征服的许多其他国家的苏丹和君主；朕，苏丹苏里曼汗，苏丹塞利姆汗之子、苏丹巴耶泽德汗之后；汝系法兰西斯、法兰西国国君，汝曾投书……”

苏丹只在自己的都城签署条约——其他人可上门来嘛。

然而，对欧洲的轻慢，并不妨碍苏丹们偶尔利用一下欧洲人在外交和商业方面的专门知识。威尼斯大公的私生子卢伊季·格里蒂，就曾为苏里曼身边很有影响的幕僚。在苏里曼王朝末期及其子当政期间，一些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来的颇有名望的犹太人，特别是“伟大的犹太人”（西方人如此称

呼的) 约瑟夫·纳西, 在制订奥托曼国策方面也出过力。但是穆斯林君主决不允许异教徒跟他平起平坐, 当然就这点来说, 也不允许任何穆斯林跟他平起平坐。

不仅土耳其的法律和政府, 还有土耳其的教育生活, 都是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穆斯林学校为奥托曼社会造就人才: 笔吏、新兵出身的官员、内科医生以及其他方面的人才。欧洲难民、叛节分子、或者非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圣职及世俗杰出人物, 当然不在此列。大部受过教育的人都是乌莱玛的成员, 如法官、经典诠释官、阿訇和教师等。乌莱玛集团的首领是伊斯坦布尔的首席经典诠释官, 即伊斯兰教长。在整个16世纪, 伊斯兰教长的地位越来越高, 最后甚至超过了法官长, 仅次于辅政大将军。乌莱玛虽常被人称作“僧侣团体”, 但实际上它并非是授命履行圣职, 充当人与上帝之间媒介的教士团体; 乌莱玛的主要标志是“学识”, 是符合正统逊尼教派传统的知识, 是符合帝国伊斯兰国教的学问。他们在帝国经院内学习这种知识, 继而又在那儿进行传授。经院不但传授不可分割的神学和法律, 同时也传授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

乌莱玛的成员往往也担任慈善基金组织的主管人员, 这类机构为数极多, 它们出钱资助学校、医院、清真寺、公共喷泉、济贫院、施粥站, 甚至还出钱修造道路和桥梁。因而, 现代国家在提供公众福利方面所承担的许多职能, 也就由这类慈善机构包办了, 反正他们的后台是包括苏丹、将军在内的各类富豪。另外还有一些所谓的“慈善”基金组织, 其设立的主要用意, 在于确保产业的收益在“施主”死后能继续

归其家族或后嗣享用，避免政府根据继承法将其财产没收或分散。用这种方式拨留的大宗财产，游离于国家的正常税制之外，既不受国家的控制，也不属于不动产的正常处置范围，日后就引起了许多重大社会问题。

除了以乌莱玛为代表的官方伊斯兰教派，还有另一种更受民众欢迎的、早在边区草原年代就在突厥族牧民中间盛行的伊斯兰教异端。这种非官方的伊斯兰教派，融合了什叶派教徒、神秘主义者、民间宗教信徒，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吸收了基督徒，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托钵僧修道会。比较重要的修道会拥有数以千计的会员。有些整天在寺院内潜心修行，而更多的是一些来自民间的俗人修道士，他们来寺院参加宗教仪式，觉得这些宗教仪式能使他们同神祇融为一体，或者说，能使他们同神祇产生更多的情感交流，而拘泥于形式、礼仪刻板的正统伊斯兰教就不可能让他们有这种感觉。有些修道会接近正统，有些更带异端的色彩。前者以梅莱维弗修道会为代表，后者以贝克塔什修道会为代表。贝克塔什修道会可能始建于15世纪初叶，传播范围很广，尤其在鲁梅利亚；它由于同近卫兵团关系密切，影响更大。贝克塔什修道会在抵制波斯文体的强大影响、保存土耳其大众语言这方面，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在普通民众中间，民间诗歌和民间故事当然仍保持其固有的地位，但是在16世纪以及以后年代里，更能打动奥托曼人的文化样式，则是些从内容到形式都较为复杂并具有博采众长特点的文学艺术作品——由都市杰出之士所创造，亦为都市杰出之士所占有。首屈一指的都市文化中心，当然是伊

斯坦布尔。吸引在它周围的，有按波斯诗歌模式谱写美丽诗篇的诗人，有歌颂奥托曼王朝成就的历史学家，有用鲜明色彩和图画装饰文稿的艺术家，还有在各大经院传授学问的乌莱玛。伊斯坦布尔的房屋都是木质结构，似乎有意向人暗示，建造任何持久性的建筑物，未免有渎神之嫌：以一己血肉凡胎，岂能奢求长生不朽？不过城中的主要公共建筑物，如市场、商旅客栈、澡堂、学校，尤其是清真寺，倒全是用石块砌成的。奥托曼的建筑师们都以圣索菲亚大教堂圆盖屋顶为楷模，并从它那儿汲取灵感；但是他们中的佼佼者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他们同样采用圆盖屋顶结构，但建筑物却具有更加开阔的巨大空间，可以容纳为数众多的礼拜者的长长队列。开塞里城新兵出身的建筑大师锡南，一生中建造了三百多座各种类型的、散布在自布达至巴格达各个城镇村落的建筑物。伊斯坦布尔城中两座毗邻的清真寺集中体现了他的天才。谢赫·扎达清真寺是他刚当建筑师后不久建造的，所占面积不很大，但与周围的建筑群和谐协调地融为一体：一座大花园，其中点缀着几座外观精巧、令人赏心悦目的小型陵墓。20年后建造的苏里曼清真寺，则是锡南的不朽杰作之一，结构轻盈精致，造型开阔典雅，四周同样散落着一座座经院和陵墓。

就某些领域来说，奥托曼文化在17世纪和18世纪有更高的成就，但是16世纪的奥托曼文化也颇有一些可以引为骄傲的地方，如：制图学、书法、织锦、木刻、石刻、皮革制品、饰有几何图案或花卉蔬菜图案的彩色瓷砖。在苏里曼王朝年间，伊斯坦布尔砖瓦厂生产的彩砖饰瓦，单单带郁金香

图案的就有将近 300 个不同品种。甚至表现艺术——尽管被正统伊斯兰教视为近乎渎神的雕虫小技——也在小范围内蓬勃兴起，出现了一些令人赏心悦目的袖珍画。其中有几幅描绘苏里曼大军远征波斯时行经的边区一带城镇风貌的彩色袖珍画，不失为表现艺术中的珍品。

16 世纪本是比较有生气的年代，而咖啡的传入又平添了几分活力。咖啡先出现在阿拉伯诸省，到该世纪中叶传至伊斯坦布尔。一位在 16 世纪末叶偶然见到这玩意儿的英国旅行家，曾作过这么一段描绘：“这是某种人们皆称之为‘咖啡’的液体，由类似芥末的籽粒冲制而成，有醒脑提神的作用。”虽然乌莱玛反对咖啡，认为咖啡室乃是“流氓和不敬神的歹徒们的聚会场所”，但是他们毕竟无法制止咖啡的流行推广。甚至乌莱玛成员自己最后也沾上了这一嗜好。不久，新世界的烟草也通过英国人的媒介，侵袭到帝国来了。

关于杰斯廷尼安大帝统治下的拜占庭帝国，曾有过这么一种说法：圣索菲亚教堂属于上帝，皇宫属于帝王，而希波德罗姆竞技场——体育娱乐场所，偶尔也有人在那儿闹事——则属于老百姓。而一千年以后，同在这座都城，奥托曼人在苏里曼统治下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西方人称苏里曼为“显赫者”，而他的臣民则尊他为“立法者”，因为他也像杰斯廷尼安一世那样以立法著称于世。）苏里曼在伊斯坦布尔海峡为自己建造了托普卡皮皇宫，身居此宫，举目环顾，真王显示帝国气势的大好风光——欧亚两洲、博斯普鲁斯海峡、金角湾、马尔马拉海——尽收眼底。他就在这座皇宫里统治着帝国，由军官侍从、文官臣仆从旁鼎力协助，周围还聚集着

数以百计的艺术家。清真寺和经院属于上帝，同属统治集团成员的乌莱玛学者在那儿悉心侍奉上帝，传授正统的伊斯兰教义。老百姓则拥有托钵僧修道会、行会和咖啡室。他们还有“卡拉格兹”（“黑眼睛”）——皮影戏剧场，这个多语种帝国的各色人等——手艺人、“绅士”、外省人士、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在舞台戏幕上纷纷粉墨登场。这些都是被统治者，各自代表着在生活中所处的命定地位。在“黑眼睛”剧场，人们不但能看到某些令人感到舒坦、自在的神秘主义折光色彩，而且还可以听到对社会秩序的挖苦妙论。

虽说苏里曼治下的奥托曼帝国及社会内部矛盾四伏、困难重重，但毕竟不像后来那么明显。社会秩序还未涣散瓦解。若要说真有什么“黄金时代”，其时是也；日后回顾起来，更显得金光灿灿。处于渗淡昏暗年月的许多奥托曼人，还真巴望帝国能重抖往日之雄风，再现昔时之荣华。

第四章

信仰与国家的衰败（1566—1792）

苏里曼的儿子及继承人塞利姆苏丹二世（1560—1574），酗酒成性，根本不像个伊斯兰教徒，国人都称他为“醉苏丹塞利姆”，而西方人则干脆叫他“酒鬼塞利姆”。他从不领兵打仗。他和“立法者”苏里曼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苏里曼到了71岁的高龄，还逼着自己披挂上阵，而他也就在那最后一次征战中溘然辞世；于是人们就常把1566这一年划为奥托曼帝国没落的开端。定个年代日期很方便，史实却没那么简单。如果以大片领土的丧失作为国家没落的一个标志，那么1699年的卡洛维兹条约就为帝国没落提供了一个更为合理的起点。如果以内政腐败而不是领土丧失作为标志的话，那么，没落的起始日期似乎可以再往前推，那就落在苏里曼自己临朝当政的年代里了。这样划分史期只有凭借后见之明的眼力才能办得到。而有后见之明的，也不仅仅是现代史学家，大约从1600年起，那些撰文评时论事的奥托曼官员们，就已发现了苏里曼统治时期朝政的许多混乱现象。譬如科奇贝伊

就曾在 1630 年左右撰文具体评述苏里曼王朝军事和行政方面的种种弊端。对这类评论家来说，打乱传统秩序就意味着衰败没落。他们希望通过恢复那种曾造就黄金时代的传统秩序，立即能制止住衰败的势头。

衰败的势头偶尔也被止住过，但毕竟是一阵子的事。奥托曼帝国江河日下，在三百多年里一直在走下坡路。而且衰败的迹象十分明显。可是，对于这种极其漫长而缓慢、时而暂时中断、且又具有相对性质的衰败过程，其复杂原因我们该作何解释呢？比起其他一些伊斯兰国家——伊朗、莫卧儿印度、摩洛哥——奥托曼可谓是个强盛的、历史悠久的、光荣显赫的国家。只是相对它自身的黄金时代，相对其欧洲基督教邻国的阔步前进，我们才说它在不断衰败。到现在，我们对其衰败过程仍不甚了了，其前因后果，特别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交叉影响，本来就不易于区别。与其要解释衰败的原因，还不如描述一下具体衰败过程更方便些。而最简单的描述方法，就是先点明帝国内部发生了哪些事件，然后再说明那一系列导致衰败明显外露的军事失利和领土丧失。内部和外部这两方面，在许多问题上又是相互关联的，所以，要为这种人为的叙述方法找点开脱的理由（除贪图方便之外），那就只能借助于这样一个事实：内部腐败往往先于领土的收缩。但是，有必要先提一下欧洲的某些发展情况。

在某种程度上，帝国外部的欧洲自 16 世纪至 18 世纪所发生的一切，也就构成了帝国衰落的全部真实历史。好些没让奥托曼人分享到好处的重大发展，使西方居于相对优势的地位。如今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正急于迎头赶上，而它目前所

面临的许多问题，最后也还得归结到那些发展上。其中一个方面的发展前面已经着重提到过：商业发展使得大西洋沿岸国家富裕起来，却损害了奥托曼人的利益。还有，西方发达国家改进了农业耕作方法。这些国家的技术，也像它们的工业一样，在突飞猛进，在这两方面的发展中，科学试验和以后蒙运动为顶峰的理性主义观念都助以一臂之力。所有这些事物，1800年以前没有一样曾在东方发生过，充其量，也只是在那儿唤起了一些微弱的反响而已。西方的另一发展，对奥托曼国的命运产生了最重大的影响：一些相当强盛的中央集权君主国，即官僚统治的帝国，不但出现在大西洋沿岸，而且也出现在土耳其边境上。这类国家能够把技术力量和经济力量全部集中起来，从而能在同奥托曼人交锋中经常获胜。而在奥托曼国这一方，离心倾向不久就明显地表现出来，没有任何一个以西方为模式的、事业兴隆并富有创业精神的土耳其资产阶级，挺身而出帮助统治者。当时国内一些腰缠万贯的资产者，要么是非伊斯兰教徒、商人或银行家——他们根本不可能被接受为盟友——要末就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官僚。

无论是同西方相比，还是同他们自己的过去相比，奥托曼人似乎已经丧失兼并和扩张的双重能力——领土方面和文化方面的兼并、扩张能力。单单陈述这一事实，无异也就提出了问题：何以见得？回答起来很复杂，而且能否讲清楚，也不敢完全肯定。

解释之一是：包括军队在内的帝国政府机器的失灵。毛病首先出在最上层。1566年至1789年间，继苏里曼之后共有过17位苏丹，除少数几个外，大多能力很差，有些甚至可以

说相当无能，智力上还有缺陷。他们每个人在位期平均为 13 年，还不到最初 10 位苏丹平均执政期的一半。统治者才能衰退的主要原因，必须从继承原则的更改这一做法中寻找。梅赫默德三世于 1595 年一下子杀死了 19 个兄弟，这以后继承原则就出现了意外的变化。1603 年他去世时，家族中的直系男性亲属只剩下他的两个少不更事的儿子。如果杀死其中一个，就有可能影响传宗接代。所以艾赫默德一世饶了他弟弟穆斯塔法的性命。穆斯塔法被关在后宫女眷居住的特殊住所内。从此，对同胞手足的处置，用软禁代替了杀害。1617 年穆斯塔法接替了哥哥的王位，此后王位就不一定再是父子相传，有时就改由王室中最年长的男子来继承。摆脱了所谓“格子”或“笼子”式禁闭生活的新苏丹，即位后全无料理朝政的经验。过去禁锢在深宫后院，过的是闲极无聊的生活，体格和精神往往都很虚弱。生活在“笼子”里的时候，他们允许娶妻纳妾，但是这些妻妾不是动了绝育手术，就是同意孩子一呱呱坠地就将他们弄死，因此，没有哪个苏丹在登基之前膝下有子的，也就是说，即位后生的儿子在父王去世时还未成年。这些苏丹也不再把朝政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他们难得领兵打仗。他们仿效苏里曼，除了在一些庆典场合之外，不再出席国务会议，于是料理政务的主要责任就落到辅政大将军肩上。辅政大将军的府邸逐渐成了召开国务会议的场所。到 17 世纪中期，苏丹赐予辅政大将军一处正式官邸，那里也兼作办公之用，于是辅政大将军的官邸就成了实际上的政府中心。那地方被称作“帕夏之门”，后来也被叫做“巴比艾里”——“高贵之门”，按欧洲人的说法，是“Sublime

Parte”。日后，Parte 一词就逐渐成了奥托曼政府的雅称。

虽然这些苏丹放弃了对日常政务的控制，但是让谁当辅政大将军，还得由他们来指派，皇宫仍能发挥巨大的影响。这就为宫内各派系勾心斗角、在政府部门安插亲信开了方便之门。塞利姆在位时，他的宠妻苏丹王后（罗克瑟拉娜）劝他将后宫从旧皇宫搬到政府中心所在地托普卡皮宫去，这一来，就更便于后宫嫔妃们大显神通了。辅政大将军的任命和撤职，都由王后亲自裁定。后宫女眷中，苏丹母后及王储生母的权势最盛，17 世纪这个帝国前后大约有 30 年的时间，实际上掌握在女人手里。

苏丹的软弱无能以及宫廷内部的勾心斗角，不但滋长了任人唯亲的风气，而且还助长了行贿受贿、卖官鬻爵的做法。“上梁不正下梁歪”，塞利姆去世 40 年后，一个在伊斯坦布尔的英国人这么写道。此人也许听到过土耳其人的这句俗语：“腐鱼发臭从头起。”没过几年，这句俗语就被土耳其诗人马韦伊西写进了他生动有力的教诲诗篇里了。这位诗人对统治集团内部的腐化行为给予猛烈的抨击。从前奥托曼行政管理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任人唯才，如今则很鲜见了。对省一级官员的任命，当然也免不了要受到这股腐化风气的影响。出钱买官位，意味着当了官之后总得设法把花的钱捞回来，还得为将来积攒点资本，于是，从行贿谋官到借税收榨取额外钱财的这一循环就加剧了。再加上官位频频更迭易手，情况就越发糟糕。乌莱玛也受到影响，一些训练不当的不学无术之辈出钱买下官位还另雇替身。既然正义可以买进卖出，法官哪能不贪赃枉法！满朝文武百官，凭德才争来的，或是靠行

贿谋得的，其中显然也不乏廉洁之士。在某些危机时期，一些有才干的辅政大将军也竭力想根除腐化之风，其中最杰出的要算 17 世纪末叶出身于柯普鲁吕望族的几位辅政大将军。然而，江河日下的败落趋势都是再明显不过的。在其他一些国家，譬如说英国伊丽莎白王朝，上层官员中贪污腐化的现象也很普遍，但是在奥托曼帝制中，造成的效果更具灾难性。

显然，征兵制和皇宫学校的产物，基督青年新兵，不仅受到世风日下的影响——在金钱和恩宠面前战功荣誉已不起作用——而且还受到一股竞争势力的排挤。竞争来自臃肿庞大的官僚队伍，到 17 世纪末期，这些官僚似乎已经成功地打破了政府要职皆由奴隶出身的行政官员所把持的一统局面，到了 18 世纪，甚至有更多的“埃芬迪”（笔吏和乌莱玛成员）当上了“帕夏”，统治着奴隶新兵军事集团曾一度占绝对优势的一些省区。后来，皇宫学校仍继续存在，但征兵制却被废除了，至于废除的具体日期则不太清楚。有证据表明，有些地区到 18 世纪还在征募兵员，而不是像一般人假想的那样，征兵制在 17 世纪就已告结束。

培养基督少年新兵这一做法的废除，与近卫兵团的日趋腐败有着直接的联系，而近卫兵团的腐败，也正是奥托曼国没落的最明显、也是最令人吃惊的迹象之一。关于近卫步兵必须独身不娶的这条规定，早已失去约束作用，后来则干脆废除掉了。塞利姆二世王朝期间，已允许近卫步兵的子弟应征入伍。这些子弟不是奴隶，而是穆斯林自由民，由于有例在先，其他穆斯林自由民当然也如法炮制，尽管近卫步兵们力图让自己的子弟独占这块地盘。到 17 世纪中期，近卫兵团

人数多至 20 万，这以后，兵团人数虽一度大量裁减，可紧接着又重新回升。随着兵员数量的增长，军队战斗力在不断减弱。有些近卫步兵不执勤，不出征，要他们去打仗，他们就开小差，到时候只是凭手里的军人证件领饷。这些领饷证也变成了可供买卖的一般商品，外人可以出钱买下来，然后按季度凭证领饷，就像凭息票领钱一样。有许多“近卫兵”，实际上是持有领饷证的手艺人。这种双重身份的出现既瓦解了军队——士兵和手艺人本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类人——也破坏了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涣散，反过来又进一步削弱了那段时期近卫兵团的力量。

军队的腐败不仅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扰乱了社会秩序，而且也损害了奥托曼的经济和政府体制。在帝国的某些偏僻区域，卫戍部队成了当地的实际统治者。他们也往往是靠糟蹋国家、鱼肉人民在过日子，他们不能再从战争中夺取到战利品，就在国内肆意掠夺。1717 年蒙塔古夫人曾这么写道：“每天当我们经过那些贫困的村庄，看到他们目空一切的蛮横行径，我几乎情不自禁要掉眼泪。”大量的近卫步兵集中在伊斯坦布尔，为了支付他们的薪金和经常性的生活开支，国库承受着重大压力。军队开始扮演起左右君王废立的角色，而 17 世纪初叶的一些年头，中央政府实际上控制在他们手中。奥托曼二世（1618—1622）虽说年仅十几岁，但已显示自己属于少数具有魄力的苏丹之列，军队怀疑——实际上也让他们猜中了——他企图约束军队，不让他们过分飞扬跋扈，于是将他废黜，随后又将他处死。到了 1630 年，科奇贝伊公开抗议军人的政治权力。到这时，奥托曼军队与其说是对外国

军队的威胁，还不如说是对本国政府及人民的威胁。

随着枪炮武器的改进，奥托曼武装力量显然需要设置更多的常备步兵部队，但是腐败、已不习惯打仗的近卫兵团，显然很难满足这种要求。此外，随着船舶制造和海洋技术的发展，也需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来控制帝国漫长的海岸线，但现有的海军已不堪整顿。长期不打海战也导致海军的蜕化，奥托曼人未能及时把单层甲板划桨船改换成大型挂帆战船，再说，他们也从来没有真正掌握好这种帆船的使用方法。要全面勾勒出军事方面的衰微情况，也得在这儿提一下采邑骑士的命运。骑兵已不再是军队中决定胜负的力量。16世纪以后，政府加紧把已无领主的采邑变为国家土地，为供养常备军提供财源。但这种努力往往徒劳无效。以前的采邑，有些以纳税农场的形式租了出去，但他们缴纳的税金常常比预期的要少。有些采邑则一劳永逸地改为纳税农场。这样的一种安排，无异是让原来的采邑领主几乎毫不费力地获得了产业的继承权。一些赐封给骑士的“犒赏性采邑”，现在作为“买鞋钱”赠给了得宠的女眷或是其他人，结果，军队所需要的军费就这样白白流失了。另外还有一些采邑，通过非法手段差不多变成了私有财产。至于一些维持原状的采邑，当征召令下达时，骑手们往往置若罔闻，根本不去应征报到。早期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评论家认为，应该兴利除弊，恢复旧制度的纯洁性，可这显然不是所需要的解决方法。

采邑制度的混乱，实际上正是16世纪末叶以来遍及整个帝国的经济社会变革的一种反映。一个由当地显贵（阿扬）和峡谷地区地主（戴雷贝伊）组成的阶级，通过这样或那样的

手段，取得了对以前采邑的控制；他们的势力在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部分地区不断发展壮大。他们对当地的政治和经济有很大影响，有时候还私设军队。他们中有一些人还建立封建割据的“小朝廷”，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以获得“将军”、“帕夏”的封号。当地政府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不时也敛聚钱财，但比起任期短的省督或纳税农场包税人来，他们巧取豪夺的搜括程度还算轻的，因为他们的长远利益毕竟还是同本地区的繁荣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软弱的中央政府无力控制这种变化。采邑制虽说在名义上一直延续至 19 世纪，但实际上此时已土崩瓦解。地方政府设法摆脱中央的控制——在一些偏远的阿拉伯地区更是如此：贝都英游牧部落酋长、野心勃勃的奥托曼总督、黎巴嫩山区的王公贵族、埃及马姆卢克王室后裔、以及巴巴里的省督，都能轻而易举地向苏丹的权威挑战。帝国的财政，以至帝国的整个经济，都蒙受重大损失。

伴随这些变化而来的，还有其他一些经济上的变动，其中有些至今仍令人费解。一个专以征伐袭击、在边界之外掠取战利品为能事的国家，经过连年不断的战争，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换来的却是接二连三的失败，再也得不到什么战利品，现在开始遭殃受罪了，这本不是难以理解的事。为了供养更多的常备部队，供养一大批开支浩大的官僚，国家极需现金，这也不是神秘的事；由于官员行贿、盗用公款以及苏丹们挥金如土——有些还得供养一批爱享受、会花钱的嫔妃，国家财政困难日益加剧，这也不足为奇。但是，16 世纪中叶似乎就已开始，后来更变本加厉的通货膨胀现象，则提

出了较难解答的史学难题。粮食之类的某些日用品价格，在整个 18 世纪明显地大幅度上涨。这也许是城市市场发展的竞争性需求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是美洲新开采的白银源源流入市场的一种反映，白银的流入在 16 世纪后期就引起整个地中海地区物价的上涨。这些影响超过了商品的物价指数。奥托曼的铸币以白银为基础，而当时由于用新的白银换取黄金比较合算，奥托曼国库里的白银就开始大量流失了。政府不知如何对付通货膨胀，有几次则采取了使货币贬值的办法，到头来，则更是加速了通货膨胀的螺旋形上升速度。靠固定薪俸过日子的将士和官僚们，则由于生活开支增加而大受其苦；这也是造成近卫步兵暴戾乖张、搞副业捞取外快以及官场中索贿受贿成风的一个原因。

奥托曼帝国的经济在其他方面也遭受损失。整个 16 世纪期间奥托曼帝国一直是欧洲贸易的中间商，靠转售东方丝绸和调味品而获利，但是 16 世纪以后，利润就逐渐减少了。延续多年的一系列土耳其—波斯战争，妨碍了商队的安全。于是英、法、荷等国都宁可把希望寄托于远绕非洲的海路运输线。到 17 世纪时，东印度公司已能把印度的货物经好望角运至伦敦，然后再出口到伊斯坦布尔和伊兹米尔，即使这样，商品的最后出售价格也比莱文特公司设法直接从印度运来的物品低廉。至于奥托曼与欧洲之间的商品交换，得利的到头来也还是欧洲这一方。由于欧洲的产品本身价廉物美，再加上新签订的范围一再扩大的不平等条约，也为这些商品的进口提供了便利（欧洲列强现在不仅坚持履行这些条约，而且还开始滥用条约中所规定的各项特权），奥托曼贸易中的入超现

象日趋严重。另外，许多非穆斯林臣民又从欧洲外交官那儿搞到保护证书，可以享有免税的好处，由此而造成的局面，到头来倒霉的还是土耳其人。与此同时，奥托曼帝国工业生产停滞不前，这既是由于外界竞争，也是因为对行会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的缘故。

奥托曼帝国的农业生产也受到损害，这里有多种原因——骑士—农民关系的瓦解，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生产出来的东西，到头来被纳税农庄包税人拿走了事；改良耕作方法和在边远地区建立新农场的尝试遭到失败（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和俄国人在这方面取得了成效）。事实上，就村落发展而言，情况恰是背道而驰：当代史学家在描述这方面情况时一致指出，农村人口日益减少，村庄荒无人烟，农民不胜苛捐杂税的重负而被迫离开土地。16世纪黑死病以及其他疾病开始在帝国境内蔓延，这也可能是导致农村人口减少的一个原因，虽说这些疾病对城市的危害比对农村更为严重。也有迹象表明当时的人口出生率在下降，入境移民不断减少。随着劳动生产率的降低，政府的岁入也在减少，至少没有增加。安纳托利亚部分地区多次发生通常称之为“热拉利反叛”的农民运动或农民起义，以示他们对经济秩序的不满。巴尔干半岛的农民以及由巴尔干移居他乡的农民也纷纷起事。后一类农民起事，也反映了基督教徒对穆斯林地主的不满。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农民起义，在他们对奥托曼上层统治的忿恨情绪之中，也夹杂着伊斯兰异端教派的色彩。有时波斯人就在奥托曼边境地区对伊斯兰异端教徒提供保护。一位密切注视这些起义的英国观察家，在1605年就对奥托曼的衰亡作出了这样的预

言：“既然土耳其人发现他们可以通过反叛挣脱奥托曼人长时期来一直紧套在他们身上的奴役性枷锁，那么，奥托曼帝国内将会（而且很快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

除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困难，另外还有一些至今仍更难以正确判断的问题。有一点到现在仍必须作为问题提出来：奥托曼人的道德风气是否也在走下坡路呢？形形色色的外国观察家，与其说被奥托曼人吓坏了，还不如说他们对奥托曼人更抱有蔑视的态度，他们强调的是奥托曼人邪恶的一面，而不是他们的美德，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看到了奥托曼人的品德在堕落。酗酒、鸡奸、卖淫以及咖啡室社交场所，为他们提供了例证。奥托曼人的自我批评也与上述某些看法一致，但他们批评的矛头更急切地指向上层社会的腐败、贿赂和对奢侈生活的追求。且不忙对整个帝国范围内是否存在道德水平下降这个问题作出回答，而这种堕落现象在伊斯坦布尔（也许是拜占庭帝国腐败年代的遗风）以及其他一些主要城市，尤其是在统治集团内部，确实存在。很可能，这是传统制度和传统价值崩溃的一种反映，也是耽于“世俗利欲享乐”的一种反映，而近代史学家总是把这种“世俗利欲享乐”和18世纪紧紧联系在一起。

就某些方面来说，奥托曼帝国自16世纪末期至18世纪末期的衰败，似乎和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末年的类似趋势相当。类似的情况也扩大到文化知识领域。奥托曼帝国的文化也同样经历了一个衰败过程，但并非在此时就已开始了。文化上的黄金时代超越了苏里曼王朝时期，尔后还有过一个“白银”时代。例如，锡南的最伟大的杰作——坐落在埃德尔

纳的塞利姆二世清真寺，只是在 1575 年才建成的。伊斯坦布尔的艾赫默德一世“蓝色清真寺”则是 17 世纪时的作品，而一些建于 18 世纪巴洛克时期的清真寺仍然具有魅力。人们公认，受波斯影响的古典诗歌派是在苏里曼王朝以后的一个世纪内达到顶峰的。显示了独特匠心和艺术才华的微型绘画，一直延续至 18 世纪初，这个时期的一些优秀杰作，不仅以其逼真的神态以及生动的色彩，再现了当时的统治者，而且也描绘了普通老百姓——商人、手艺人和表演艺人。

然而，乌莱玛集团确实显示出学识水平在下降，而且带来不幸的后果。许多身居高位的乌莱玛成员一心追求物质利益，而对学问不感兴趣。经院开设的课程更加狭窄，乌莱玛成员中能接受新思想的，也愈益少见。除个别人之外，他们的学识水平都不及以前。皇宫学校的毕业生往往比乌莱玛受到更好的教育。帝国中有文化的穆斯林，大多是由经院培养出来的，而平庸的教育实是文明进步的一大阻碍。乌莱玛的首要职责，当然是高举神圣的伊斯兰教法规，维持社会秩序；所谓社会秩序，对他们来说，无非就是传统秩序，而维持好传统秩序，也就是主持了正义。不学无术、孤陋寡闻的乌莱玛成员在履行其职责时，必然是等因奉此，按老规矩办事。在伊斯兰世界里改革创新向来遭人侧目，被认为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然而，改革创新已是刻不容缓。

有人提出个这么一种理论，说塞利姆一世和苏里曼镇压了帝国境内的什叶派异端，平息了他们的叛乱，从长远来看，这是很不幸的，因为这意味着，正统伊斯兰教无须经受见之于咒骂和对话的挑战就能稳坐第一把交椅；而在西方，咒骂

与对话司空见惯，天主教和新教，谁也吃不掉谁。所以逊尼正统教派尽可不用动脑筋，将新思想拒之于门外，而它思想僵化之后，对异教西方文化知识的进步不是无动于衷，就是嗤之以鼻。用这种理论来解释奥托曼人智力发展的停滞不前，其可取程度究竟如何，尚有待于证明。可以肯定地说，异端托钵僧修道会在帝国境内仍然有影响。

如果把奥托曼人在学识上固步自封，排除异己的普遍现象完全归咎于乌莱玛，那也有失公允，尽管乌莱玛的所作所为大大助长了这种风气。这是一种顽固的偏见，认为忠实信徒的世界必然优于法兰克的异教世界。这种偏见在奥托曼人昔日的成就之中找到了依据，也就成了压在未来改革家颈脖上的精神石磨。一旦腐化之风根除之后，这同一套办法为何不能再次奏效呢？何必到法兰克人那儿去搬借救兵，充其量也只是搞来些技术、发明罢了。因而这一时期西方在突飞猛进，而奥托曼人的头脑却相对处于停滞状态。这种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落后状态，恰恰是明理识事的观念中危害性最大的一面。奥托曼帝国地处欧洲，也属于欧洲，因而对欧洲就非得认真对付不可。帝国中自有一些善于接受新思想的有识之士，乌莱玛成员中也不乏这样的人物。但他们毕竟是些例外，要他们在普遍的世俗观念面前力挽狂澜又谈何容易：那些政府的、省区的、近卫兵团的、乌莱玛的形形色色集团，全部抱有这种陈腐观念，而当时停滞不前的局面又似乎最能满足这些集团的个人私利。

以上罗列的奥托曼帝国种种弱点，勾划了一幅几乎无法缓解的暗淡画面。但我们必须时时记住这一点，整个衰败过

程是缓慢的——长达 250 年之久，有时这种颓势被制止住了；偶尔由于改革与进步而又有所缓解。这可以在自 1566—1792 年间奥托曼帝国所经历的战事和领土的变化中得到部分证明。这个历史时期既是以失败、也是以胜利揭开帷幕的。在塞利姆二世及其有魄力的辅政大将军索科卢·梅赫迈德帕夏施政期间，一次进袭曾突入莫斯科公国境内，却未能取得修筑顿河—伏尔加河运河所必须的胜利。修筑苏伊士运河的计划，也因也门发生叛乱而不得不作罢。尔后在 1571 年，奥托曼人围攻威尼斯人控制的塞浦路斯，他们的舰队在莱潘多附近的旧式战舰大规模决战中，被基督教国家的联合舰队打得一败涂地。然而就在西方忙于庆祝胜利而未能乘胜追击的情况下，奥托曼人一举拿下并占领塞浦路斯（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甚至还从威尼斯那儿索取到一笔赔款。据说梅赫迈德曾对威尼斯人这么说：你们失掉的是一条胳膊，再也长不出来了，而我们奥托曼人只是被剃掉了胡须，日后长出来时更加坚硬。实际上，舰队在不到一年的时期内又重新建立了起来。

此后，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作战格局。到 17 世纪末叶为止，奥托曼人始终是在一个呈大圆弧状的帝国边界线上迎战敌手——威尼斯、奥地利、波兰、俄国、伊朗——其中有些对手有时还采取联合行动。现在，由于欧洲的海上力量把奥托曼人赶出印度洋并在地中海西岸得手，他们显然已处于四面包围之中。然而包围圈的周界线离伊斯坦布尔还远着呢。再说，一上来奥托曼人干得还不坏。17 世纪伊始，1606 年的兹西特瓦·托罗克条约结束了对奥地利的战事，从领土来说，条约对土耳其人有利。但这是个新的象征：在京城伊斯坦布尔

之外缔结的第一份条约，它是协商后产生的和解契约，而不是苏丹陛下恩施给基督徒受惠者的和平赠礼；是外交协商的结果——奥托曼人破天荒第一次派出全权特使，而哈普斯堡君主也首次被当作苏丹的平等对手来对待。

伊朗一线重开战事，战斗在边境地区打过来，推过去，好似一场东方的洛瑟林吉尔拉锯战。伊朗从未构成过持久的威胁。土波之战除了含带宗教的成份，主要意义就在于相互无谓地消耗实力，让人回想起 1000 年以前拜占庭人同波斯人如何相互削弱对方的实力，直到后来阿拉伯人大举进攻时方始罢手。

17 世纪的真正威胁来自西方和北方。这种威胁时断时续，且刚刚在冒头，而奥托曼人此时的武力扩张已达到了极点：经过连年交手，1664 年把克里特岛从威尼斯手里夺了过来；1676 年又从波兰那儿攫取到波多利尔和部分乌克兰。此后就出现了转折点。其重要标志是：1681 年俄国人的胜利，把刚赢到手的大部分乌克兰领土夺了过去。1682 年，与长久对手奥地利开始了一场漫长的战争，后来波兰、威尼斯和俄国陆续加入了进来。翌年，奥托曼大军也像在 1529 年那样直逼维也纳的城门，但这一次不是受挫于气候，而是败于基督徒士兵之手。在大军开始缓缓后撤、途经匈牙和平原时，又一连吃了几次败仗，在此期间，俄国的彼得大帝在另一线采取行动，占领了亚速。到 1699 年签订卡洛维兹条约时，奥托曼人把波多利尔让与波兰，把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割给了奥地利，把莫雷厄丢给了威尼斯。在这些丧失的领土中，只有最后那一份属于暂时性的，其余的两片领土则永远地丢失

了，这成了奥托曼帝国疆域开始不断收缩的一个标志——从帝国内部的急剧衰败到外部领土的收缩，其间相隔了一个多世纪。

1699年的失败清楚地表明，奥托曼人此时得在自己的边境上同两个主要对手较量，奥、俄两国内部都日趋稳固，而奥托曼帝国内部在此期间却日见腐败。奥地利人是更危险的直接对手，因为他们就在多瑙河畔。俄国人此时仍远在黑海的北面，与奥托曼本土之间还隔着个纳贡称臣的克里米亚鞑靼可汗国。两方面的冲突都将决定土耳其人的命运，但与俄国一方的冲突却变得越来越重要。18世纪期间，土、奥之间的两场战争，结果只是把共同边界线固定在多瑙河和萨瓦河上，而贝尔格莱德仍在奥托曼人手里。奥地利在1878年占领波斯尼亚之前，没有再从奥托曼人那儿多得到些什么。奥地利卷入了欧洲的其他战争，以后又有内部的少数民族问题，这就挫钝了它的进攻锐气。而18世纪俄土冲突的范围，则远远超过了前段时期黑海北面鞑靼国或高加索地区的边境冲突。俄国在这个世纪内发动的三次战争，以凯瑟琳大帝的胜利而告终；俄国人的胜利进一步通过1774年的屈丘克·卡伊纳雅条约而确定了下来。虽然普鲁士强行瓜分波兰，分散了凯瑟琳的注意力，使土耳其免遭更惨重的失败，但是俄土战争以及卡伊纳雅条约，为日后的俄土关系定下了基调。

战争期间，凯瑟琳的方针之一是支持奥托曼领土上的基督教正教，试图鼓动希腊人起来造反。俄国的一支波罗的海舰队虽没能拿下莫里厄，却在爱琴海消灭了奥托曼的一支舰队。卡伊纳雅条约规定，俄国现在有权在伊斯坦布尔设立“奉行

希腊宗教仪典的公共教堂”；有权代表希腊正教向奥托曼提出抗议；而奥托曼政府这一方则保证“持久地保护基督教及其教堂”。于是，日后俄国人就可据此大肆张扬地宣称自己是以奥托曼境内希腊正教大教区合法保护者的身份行事的。在领土方面，俄国人虽从大部分占领的土地上撤走了，却把黑海北岸的某些战略据点留在自己手里。克里米亚鞑靼可汗国宣布独立，奥托曼政府被迫给予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特殊待遇。在商业方面，俄国人得到了在黑海地区，在海峡沿岸以至在苏丹帝国境内各地经商以及建立领事馆的权利。在外交方面，俄国现在可在伊斯坦布尔派设一名常驻公使。

由此看来，卡伊纳雅条约不单是奥托曼人帐篷下的骆驼鼻子，而是脑袋、前足、驼峰全都挤进帐篷里了。俄国人胃口越来越大，想把伊斯坦布尔——俄国人称它为“沙皇格勒”，即“沙皇的京城”，所有斯拉夫人也这么称呼它——以及连接地中海和黑海的海峡都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凯瑟琳花了10年时间，制定了一项与奥地利、威尼斯瓜分土耳其欧洲疆土的计划：她要把今日罗马尼亚的那片领土留给她自己，同时还要留给她孙子（她给他起名康斯坦丁以纪念1453年拜占庭帝国的末代皇帝）一个以“沙皇格勒”为中心的小型拜占庭帝国。虽说她没能实现这份雄伟计划，但她在1783年干脆并吞了克里米亚鞑靼可汗国。本世纪的第四次俄土战争，则是迫使土耳其政府在1792年对这块领土的兼并，对俄国统治进一步向西扩展至德涅斯特河这一局面表示认可。

俄国人的这些胜利引出了一系列的后果。以前一直禁止悬挂基督教旗的船只通行的黑海，现在已不再是土耳其的内

陆湖。俄国人在那儿设置了海军基地和要塞；他们的商人可以在穆斯林的港口自由经商。（正好也在这时候，原先吉达以北海面禁止基督徒船只通行的红海，也不再是土耳其的内陆湖，英国货船已在苏伊士停泊。）奥托曼境内的希腊人获得悬挂俄国旗子经商贸易的权利；由于享有这份特权，一些希腊货物托运人开始发财致富，并且扩大他们的合同签订范围，这对希腊民族复兴起了刺激作用，50年后，他们最终起来反抗奥托曼人了。至于奥托曼人自己，则从这些失败中得到了这样一个特殊教训：他们不再属于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列。自从1683年第二次从维也纳撤兵之后，欧洲对奥托曼人的恐惧心理日见淡薄。16世纪的欧洲“恐土耳其症”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一股18世纪的“土耳其热”，出现了不少土耳其凉亭和装饰板面的仿制品。欧洲也能从土耳其风味中找到乐趣；1782年的维也纳人可以在莫扎特歌剧《（土耳其）后宫诱拐》的首映式上开怀大笑。然而，奥托曼帝国虽然在衰败，但至少在1739年以前仍然是个强盛大国。而且还是法兰西君主刻意结交的一股维持欧洲均势的基本力量。屈丘克·卡伊纳雅条约确凿地表明，奥托曼人已丧失了大国的地位。1792年的雅西条约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对奥托曼人来说，还有更明显的教训：为了恢复他们的地位，他们必须实施改革，至少实施军事方面的改革。既然西方，现在也包括俄国在内，在武器方面占有优势，那么为了对付西方，奥托曼人就得借鉴西方的经验。18世纪初叶，西方化的进程已在小范围内悄悄开始。到这个世纪的末期，改革更是势在必行了。

第五章

西化的开端（1789—1878）

土耳其的西化过程，如今仍在继续。它所曾引起的争论至今也尚未平息。土耳其人一直在反省自问，西化是否已基本实现，抑或时至今日始终是在做表面文章。如果真属后一种情况，那么这场历史进程究竟在哪儿出了毛病？会不会这概念本身压根儿就是错的？是否真能把异域文化的基本要素移植到穆斯林社会里来？能否兼容并蓄地综合成一个有生存力的活体？是否能在不全盘变革观念、习俗的情况下把西方的体制和技术借鉴过来？这类问题有好多在 19 世纪已提了出来，而且西化进程从一开始就会带着这些问题。

塞利姆苏丹三世王朝（1789—1807）往往被看作西化进程的开端。但是有些土耳其历史学家把日期还要往前推，认为西化趋势发端于 18 世纪初叶。这里也像划定奥托曼国衰败的起点年代那样，选定个分界点的做法，难免要触犯历史延续性这一真理。奥托曼人从未和西方完全断绝过往来，其联系还不仅仅限于战争、外交和商业这些方面的正式接触。他

们曾模仿西方军事和海军方面的某些先进措施，而且在地理学和医学等的自然科学领域借鉴过西方经验。但是他们的吸收能力在 15 世纪以后逐渐减退；智力和文化的转换更新也微乎其微。说来也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到 18 世纪，奥托曼人同西方的距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而同时却又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接近西方。从一方面来说，在技术上、智力上、心理上存在着一条鸿沟，其间的差距具体表现在西方科学、经济在进步，理性观念在发展，而东方却相对停滞不前。而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外交上、商业上，相互又“过从甚密”，这就表现在西方国家可以陈兵于奥托曼帝国边境，表现在欧洲人不但借助于海运、财富，而且还借助于通商条约，在帝国境内施加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影响。

在第二次从维也纳撤兵并签定了卡洛维兹条约之后，显然改革已是势在必行，而上述相互矛盾的两方面情况也豁然清晰地暴露在眼前了。在此以前，奥托曼改革家们所考虑的，主要是随着黄金时代体制机构的日趋腐朽而暴露出来的帝国内部的弱点，因而他们的建议也只是着眼于过去，竭力想使那些体制机构回复到原来的状态。而早期改革者的改革活动，基本上也是着眼于恢复过去的秩序，例如穆拉德苏丹四世（1623—1640）和辅政大将军柯普鲁吕（1656—1661），他们的宗旨是根除腐化之风，而他们的武器就是行刑官手里的大刀和没收非法所得的财产。但是在卡洛维兹条约（1699 年）和帕萨洛维兹条约（1718 年）证实了西方军事优势之后，改革建议这才开始有了转机，有可能把目光转向西方。就在 1718 那一年，赞成这种改革趋势的伊卜拉辛帕夏开始上台，当了

多年的辅政大将军（1718—1730）。同年，有一份指出有必要迎头赶上西方军事发展的奏本，呈递给艾赫默德三世苏丹。所以，把 1718 年看作西方化的起始年代大概还算适当的。

18 世纪的改革尝试，很快就明显表现出三个特点。其一：西方文化的灵感源泉主要来自法国，做法上也多以法国为楷模；法兰西既是西方文明的集中体现，也是奥托曼人的传统盟友。其二：改革的重点，当然是致力于改进军事训练、技术、组织和武器装备。最后一点：改革显然会引起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甚至不惜诉诸暴力，而在公众眼里，这种反对倒也情有可原，这些改革本来就源出异端。

这些特点在 18 世纪初叶就充分显示了出来。18 世纪初叶一般称之为“郁金香时代”，属于相对和平的年代，人们热衷于种植郁金香。奥托曼上流人士开始对法国生活五光十色的表层事物发生兴趣，偶尔也对基础方面的一些事物感兴趣。切莱比 1720 年作为使臣派往巴黎，受命对法国的技术进行考察，看看有什么可供奥托曼借鉴之用，他用近乎赞许的好奇而惊讶的口吻，汇报了法国科研机构、机器，甚至剧院的情况。他儿子也曾随同前往，他设法帮助匈牙利籍的改宗者米泰费里卡在奥托曼帝国创办了第一家印刷所，出版土耳其文书籍，在此以前，虽然非穆斯林少数民族中有印刷机，但是政府禁止印制土耳其语或阿拉伯语的印刷品。经伊斯兰教长裁决，米泰费里卡获准仅出版非宗教性质的书籍。他出版了 17 部书，主要是科学和军事方面的著作。其中还有他自己撰写的一篇文章，文章强调必须了解欧洲，获取更有效的军事手段；文章还特别提到彼得大帝的事例：他在西方专家的

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海军。1730年伊斯坦布尔发生了一场暴乱，艾赫默德苏丹三世丢掉了王位，而辅政大将军伊卜拉辛帕夏则断送了性命；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上流社会所风行的“法兰克人”生活方式的一种抗议。不过印刷所倒暂时幸存了下来。而且，法国冒险家邦纳沃尔伯爵还被聘为改组炮兵团的军事顾问，此人归顺了土耳其人，成了“阿赫迈德帕夏”。1734年建立了一所军事工程学校，不过由于近卫兵团的压力，学校并没有存在多久。

到18世纪中叶，尽管另一名辅政大将军拉吉勃帕夏（1757—1763）也还愿意考虑作些革新，例如他甚至不顾穆斯林法的禁令，允许一位外国医生作尸体解剖，但是，前一阶段的温和的“启蒙运动”（暂且借用一下这个名称）已近乎销声匿迹。18世纪40年代，印刷所关门歇业，军事改革也失去了势头，部分原因也在于1739至1768年间长期天下太平——天下一太平，军事发展就成了泡影，就像早先海上长期休战期间根本想不到要发展海军的情况一样。

于是在1774年出乖露丑，败给了俄国。这一事实确凿无疑地证实了西方武器的优势。18世纪初叶着手进行的那套兴邦强兵改革，现在又继续搞下去了。就在俄土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又聘用了一名出生在匈牙利的法国顾问托特男爵，来训练炮兵和工兵部队。意味深长的是，倒没要求他也像邦纳沃尔那样皈依穆斯林。新的军事学校建立了起来；印刷所又恢复了生产，承印更多的有关法国军事或技术方面的译著；更多的西方人士，尤其是法国人，络绎不绝地来到伊斯坦布尔，有的属于官方交往，有的出于其他原因。辅政大将军哈密德

(1782—1785) 对西方人士，对西方化改革，均持友好态度。但是对源源不断来自异邦的人士和观念，再加上又有迹象表明法国正企图控制东地中海，保守派大起恐慌，于是把他赶下台，结束了他的性命，还在他尸体上插了个标明他身份的牌子——“教规和国家的死敌”。

然而，保守派根本拿不出更好的振兴帝国的方案，1787 年同俄奥两国重新开战，结果又遭到新的失败，所以塞利姆三世在 1789 年即位时，面临的还是这两个老问题：西方的优势和国内的保守势力。塞利姆就其本能来说，也属于改革派，他并不讨厌某些西方模式。在他还是王储的时候，就同路易十六有过书信往来，希望法国人能帮他们抵御俄国。他登基后不久即在西方国家首都设立第一批大使级常驻机构，此举有三重用意：进行外交协商，汇报西方发展近况，在法国训练土耳其年轻官员。拿破仑战争使巴黎同伊斯坦布尔时而结盟为友，时而反目为敌，法国在伊斯坦布尔的影响也随之起伏不定，但总的说，法国始终保持着较大的影响。

塞利姆登基后两年，要求手下的一批幕僚呈递有关亟需改革的奏章。有些奏章也触及到税收、铸币及采邑等问题，但他们主要关心的，还是如何能尽快地加强军队的实力。有些幕僚除了建议按原有形式改组近卫兵团之外，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有些幕僚认为必须另起炉灶，建立全新的军事组织。尽管对幕僚们来说，西方模式可以接受，然而就他们的主张来看，没有一个能超越外观西化或技术西化的范畴；谁也没考虑到教育、工业、农业这类基本方面的改革。因而塞利姆三世王朝时期的西化，主要还是限于军事领域，也只是该世

纪初叶温和开端的延续，而没有什么新的突破。各个军兵种都改组重建，有些用新的方法加以训练，并配置精良的武器。对军事技术学校和翻译，给予较多的关注；土耳其人中懂法语者，为数很少，现在则有所增加，1793年及以后两年，陆续给巴黎送去名单，指定要派来一些什么样的军事和技术顾问。

塞利姆在振兴军事力量方面的主要尝试，是缔建一支新的军团——“新秩序军团”。近卫兵团在对俄战争中表现很差，事实证明，让他们使用新武器，采用新战术，如同缘木求鱼——因此决定训练一支新军，到时候可以替代他们。“新秩序军团”的筹建，实际上在1791年，当辅政大将军尤苏夫帕夏还在前线督阵时就已开始。翌年与俄国缔结和约之后，塞利姆谨慎行事，为了进行这宗新的冒险，先设法争取到包括伊斯兰教长在内的一些乌莱玛头面人物的同意。一个步兵团在远离京城的郊外进行训练，以免与近卫兵团发生摩擦，也避免触犯民众的守旧情绪。士兵们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穿红色马裤，背着来福枪，由法国教官或者其他一些已经欧化的土耳其教官带领着进行欧式操练。在塞利姆眼里，这支新军颇有长进。他给新军配置了一些炮兵，又在第二个步兵团里增加了一些骑兵，随后还在各省设置新军部队，并实施征兵制，这样，到1807年的时候，经过训练的新兵人数已接近25000名。兵团的经费主要靠没收或挪用采邑岁入的办法来提供。

尽管偶尔有些小麻烦，但新军兵团似乎搞得很有成效，小股的新军部队也在小规模交火中初露锋芒。但是新军兵团从未和其他部队合成一体，也从未经受过真正的考验。这也

许得完全归之于塞利姆本人缺少魄力。1805年巴尔干半岛某些显贵举兵反对把征兵范围扩大到他们的管辖地区，而就在他们攻打埃德尔纳时，塞利姆屈服了。他没下令抵抗，而是把新军兵团调开，并任命近卫兵团的首领为辅政大将军。1807年保守派在伊斯坦布尔举事，反对“法兰克式”革新，结果塞利姆非但没动用新军弹压，反而把新军解散了。即便如此，他还是被废黜了。一年以后他离开人世，是被他的继承人穆斯塔法四世杀害的，当时驻扎在保加利亚多瑙河的省区军队正向京城挺进，以图恢复塞利姆的王位。接下来又轮到穆斯塔法四世被杀身亡，勤王之师遂拥立马赫默德二世（1808—1839）为苏丹王。他们的政治首领重又实施某些改革。但是近卫兵团再次起事，杀死了几个改革者，把政府的控制大权交还给保守派。马赫默德二世自己总算免于死，整个奥托曼王室只剩下他这一根香烟。

应该指出，塞利姆三世除了苦心经营他的新军兵团以外，还有其他一些事够他烦心的。拿破仑于1798年入侵埃及，再次证实了西方的优势，同时也表明奥托曼帝国的南疆也像北域一样脆弱。这次入侵事件除了使人怀疑伊斯坦布尔的法国顾问是否真正毫无私心，还给俄国提供了同奥托曼人结盟的机会。作为盟友，俄国赢得了在地中海驻扎海军、设置基地的权利，另外还取得让其舰只通过海峡的权利——日后俄国一直希望恢复这样一种极其有利的局面。在法军撤离埃及，法土两国重新确立了友好关系之后，拿破仑竭力敦促土耳其人在1806年同俄国开仗，可是等他1807年跟沙皇缔结了和约，又把土耳其人给甩了。塞利姆可能并未完全意识到，他自己

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听凭法国皇帝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摆布的。伊斯坦布尔及海峡地区该落入谁的势力范围，在这个问题上沙皇是丝毫没有商量余地的。亚历山大把伊斯坦布尔称作“进入朕之家门的钥匙。”从这里也能说明，土耳其的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事件、而并非由内部事件所决定的。

在塞利姆亡故、马赫默德二世被迫接受保守派控制之后的一年半里，形势似乎同样糟糕：和俄国在打仗，同法国的友谊完了，新军失败了，随着许多改革者死于非命，改革热情大为减退。西方化的改革成果所剩无几。奥托曼帝国的一些杰出之士学会了法语，这不再限于仅仅了解些军事知识，而是开辟了其他的途径。有些人还接受了法兰克文化的世俗主义和表层事物，不过很少有人被法国革命的炽热理想所打动。实际上，深受法国革命影响的，是帝国境内的希腊人而不是土耳其人。不过有心人也可以吸取到这样的教训：只有把保守派反对势力的后盾近卫兵团剪除掉，改革，特别是效法西方的改革，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马赫默德二世很快领悟到了这点，可他不敢在时机尚未成熟之时贸然下手。他还得对付俄国人，那一仗一直打到1812年，最后还算运气，缔结和约只使他丢失了比塞拉比亚一个省。保守派和近卫兵团控制着他的京城。就算在伊斯坦布尔外面，马赫默德一开始也行使不了多少大权。关于他的帝国，据说拉马丁曾发表过评论，说它是“各类无政府状态的大联盟”。所以，马赫默德的第一奋斗目标，是维护中央对地方各省的控制。或是用武力，或是设狡计，他削平了大多

数省督的权力，任命了一批比较听话的省督。

然而，要想控制下述六个地区——阿拉伯、埃及、塞尔维亚、希腊、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阿尔及尔，马赫默德不能不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马赫默德及其帝国的统一，面临着四种不同的挑战，其中只有一种曾一度成功地加以平息，这就是来自瓦哈比运动的挑战。瓦哈比运动是提倡严守古兰经教义的伊斯兰宗教改革运动，它在 18 世纪随着沙特政治势力的崛起而在阿拉伯境内传播开来，到 1806 年已控制了麦加和麦迪纳。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瓦哈比派教徒是被埃及总督的部队击退的，而这位总督自己则代表了另一类型的、更具威胁性的挑战，虽属于伊斯兰世界却又带西化的色彩。阿里是个自打天下的埃及强人。拿破仑征占后的混乱状态正好给了他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一举消灭了因循守旧的竞争对手集团，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治，他既是统治者，又是改革家，还充当大商人。他麾下的那支具有西方风格的军队，经过最初几番周折之后，迅速发展壮大；他在其他方面的一些改革，也取得了相对的——有时只是暂时的——成功。阿里反复申明他是个忠诚的总督，但既掩饰不了他的野心，也掩盖不住他日益增长着的、足以直接威胁马赫默德苏丹的实力。

日后最终导致奥托曼帝国毁灭的另两种挑战，并非来自东方，而是来自西方：民族主义及列强的进攻。民族主义病毒先是传染给希腊人，然后传染给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1827 年英、法、俄三国海军舰队驰援纳瓦里诺的希腊反叛者，1828 至 1829 年俄国人长驱直入几乎打到了伊斯坦布尔，这时希腊获得了自治权，不久列强又让希腊脱离奥托曼国而独

立。1829年的亚得里亚纳波尔（埃德尔纳）条约，除了把土耳其东部以及多瑙河口具有战略意义的疆土割让给俄国之外，还确认了塞尔维亚由其大公治理的自治地位，允许俄国的影响渗入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种影响又进一步刺激了罗马尼亚各邦国的民族意识和独立愿望。阿尔及尔则在1830年遭到法国入侵，并被它夺了过去。

就在马赫默德的帝国遭到如此沉重打击之时，阿里于1831年趁机直接发动进攻，从叙利亚横越安纳托利亚高原，一路推进到屈塔亚，直接威胁着布尔萨和伊斯坦布尔。马赫默德在四面告急、八方求援的情况下，最终接受了俄国的援助提议。俄国军队这回以盟友身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也就是在“沙皇格勒”的正北面登陆上岸，而且就作为保护者待在那儿，后来阿里接受了一份折衷议和方案，由他控制整个叙利亚以及阿达纳地区。俄国人还是赖着不走。直到1833年马赫默德同意签订斯凯莱什条约，俄土正式结成防御同盟，保证在所有影响“安宁与安全”的事务上苏丹都得征询俄国的意见，俄国人这才撤走。这是俄国政策的新动向，但是和原来的进攻、瓜分方针同样具有威胁性。现在奥托曼帝国已保藏在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万一这个“病夫”——那年沙皇尼古拉就是这么称呼它的——死了，俄国将是它的主要继承人。斯凯莱什条约所拟定的方针，始终很合俄国人的心意，即使到了苏联时期亦复如此。然而，当时却引起英国人的干预，而在19世纪以后年代里，往往正是英国人的抗衡，才使土耳其免于投入俄国人的怀抱。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说斯凯莱什条约将使俄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成为“苏丹

内阁首席大臣”。他不仅着手反击俄国的外交攻势，而且鼓励奥托曼帝国通过改革振兴自强。

马赫默德二世与其说需要鼓励，还不如说更需要机会和资源，民族主义反叛、列强的进攻以及梅赫迈德的争雄，都着重突出了改革的必要性，可并没有给他实施改革的机会，反而逐渐耗尽了人力、物力资源。再说还得时刻对付以近卫兵团为后盾的保守势力的反对。不管怎么说，马赫默德在 1826 年，趁平息希腊叛乱的战事似乎暂时取得进展之际，总算迈出了第一步，他毅然决定以一支新军替代近卫兵团。近卫兵团不去同俄国交手，却在叛乱闹事，甚至在京城焚房劫掠，而且公然要挟，增发额外津贴才愿出兵对付希腊人。马赫默德一方面表示，他无意消灭近卫兵团，而只是把它化整为零，编入一支现代化的部队之中，一方面小心翼翼地包括乌莱玛在内的主要官员那儿，争取到合作的保证。然而，就在军官穿上合身的西式新制服开始训练之时，伊斯坦布尔的近卫兵团哗变了。勤王部队和志愿兵于 1826 年 6 月 15 日进行反击，结果有数千名近卫步兵遭到屠戮。马赫默德当即宣布废除近卫兵团，组建一支新军——“穆罕默德胜利之师”。省区的近卫兵团也被解散，他们的贝克塔什托钵僧盟友遭到镇压。近卫兵团的散兵游勇仍然存在，在某些城市里甚至纠集成小股部队，但是经过这次“吉祥事件”（土耳其人对这场大屠杀的看法），近卫兵团作为一支反对西方化改革的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已不复存在，马赫默德还趁这次机会消灭了最后一批采邑骑兵部队；一些残存的采邑不久也全部予以废除。必须保留的骑兵部队改发饷银，由国家供养。

马赫默德的新军是在一位新司令官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司令官的官衔叫“塞拉斯喀”，身兼总司令和陆军大臣双重职责。由欧洲教官帮助训练新军，用欧洲人编写的兵器教材作为教本。19世纪30年代，聘用了由莫尔特克率领的普鲁士军官团，来改进奥托曼国的防御工事，帮助训练部队，从而开始同德国军事顾问建立起不断得以更新的挂勾关系，海军也同样进行整顿，这方面主要依靠美国船舶制造专家（他们在伊斯坦布尔制造了几艘最上乘的挂帆快速战舰）和英国海军顾问。马赫默德新建了几所技术学校，随之也带来了其他方面的西方影响，起初也仅限于科技和语言方面。在医学院里（其主要宗旨是培养军医）大部分课程均用法语讲授。军事学院内也传授法语。各类学校都派送一些毕业生去欧洲进行深造。因而军队内新型军官的人数在逐年增加，在以后几十年里，这些军官自己也就成了西方化改革的推动力量。

除了建立新的武装部队，马赫默德在19世纪30年代还致力于开创一套新的官僚体制。在这方面也同样以摧毁旧体制为先导，或破旧与立新同时并举。原来的宫廷职务，有好多已成了拿干薪的挂名差事，现在一概加以废除。大小官员一般都有了新的职衔，他们的职权现在得由苏丹授予，而不靠传统惯例而得。马赫默德开始将原有的行政机构改换成西方样式的政府各部；除了塞拉斯喀外，不久还设置了外交大臣、内务大臣、财政大臣等官职。大臣国务会议有意仿效欧洲国家内阁的格局，辅政大将军也不再是旧式的、苏丹绝对意志的代理人，而是内阁首席大臣。辅政大将军的官衔一度还废除过，改用“首相”（巴什维基尔）的衔称。虽说衔称的

改换是暂时的，但职务性质的变更却固定了下来。马赫默德作出巨大努力——往往徒劳而无效——杜绝贪污，付给所有官员以适当的固定薪俸；可以预料，官员们能领薪俸，当然很高兴，可要他们拒绝其他“馈赠”，就很不乐意了。他废除没收私产的做法，给予官员们更大的保障。他规定了统一的官服，让官员们穿起欧洲西裤、黑皮靴、礼服大衣，他还废除了穆斯林头巾，规定他们一律戴圆筒形无边毡帽。他创办了一份官方报纸，起先用法文发行，后来改出土耳其文版，每个官员都须订阅，官员的任命和政府制定的规章都在这报纸上发表。这份《大事概览》代表了土耳其新闻事业的开端。

新官员的教育，也是马赫默德十分关注的问题。在教育领域实施改革，一般来说特别困难，因为这里是乌莱玛的世袭领地。普通小学用死记硬背的办法教阿拉伯文古兰经，另外也涉猎念书写字之类的文化学习。高一级的学校——经院，教的几乎全部都是宗教方面的课程。这两类学校都培养不出新式的官员。但是不论动哪一类学校，都会引起无休止的争论。知识渊博的学者，大多是靠自学成才的。大部分官员都是从十几岁起就在政府机构中当职员，然后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以后许多年内，情况仍然如此。但是梅赫默德在他统治年代的末期，倒真的创办了培养官员的“高等”学校，那儿设有法语和其他世俗学科。他最后还关闭了皇宫学校，它是在募兵制废除之后保留下来的。

马赫默德王朝期间，除了进专门培养军官、军医或文职人员的各类学校，还可以通过另外两个渠道学到法语和西方学问。其中之一是外交机构。塞利姆三世在欧洲设立的常驻

大使机构，在他死后纷纷取消了；马赫默德二世重新建立这些使馆机构，这样，有机会一边在国外供职、一边学习进修的土耳其青年，数量也就增多了。另一条渠道是政府新设的翻译局。该局的设立，是为了处理日益增多的外交信函，培养土耳其外语人才。一百多年以来，奥托曼政府的译员一直由希腊人充任。希腊人反叛后，就不能再起用他们了。因为土耳其人很少有懂西方语言的，希腊叛乱后所任命的主要翻译官，起初均由皈依穆斯林的非土耳其人担任。随着翻译局的建立，有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学会了法语。正如欧洲的军事压力推动了欧洲军事学校的创办一样，欧洲的外交压力推动了翻译局的设立。

翻译局和外交机构成了造就人才的苗圃，19世纪奥托曼帝国的好多重要政治家都是从那儿培养出来的。这些人代表了官僚集团内部新形成的精华——一批英才荟萃的法国通；他们对土耳其起着难以估计的重要作用，直到最近这100年也同样如此。他们往往是行动派，即改革派。官僚集团内新出现的这种分化，和军队内军官团的分裂现象遥相对应，把受过西方式教育、略懂某种欧洲语言的人物，同由行伍出身或靠个人奋斗起家的人物截然区分开了。整个社会因而也比以前更为松散。统治集团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传统壁垒，依然泾渭分明，只是如今无知无识的乡民同那些以西方为楷模的洋派上流人士之间的鸿沟，要比他们同旧式官僚之间的鸿沟更深。

尽管马赫默德的许多改革措置只取得部分成功，尽管西化多在表面做文章，没把力量集中在民众教育、经济生产率

这些根本性的领域，但他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就其结果而言，毕竟影响十分深远。各种以西化为目标的起步，以后都会继续走下去。况且，他已摧毁了各种旧势力，建立起一支新力量。近卫兵团这股势力完了。地方小朝廷的势力大大削弱了。贝кта什修道会的势力至少已被遏制住。马赫默德还收缩了乌莱玛的权限，设置了一个政府监察机构，专门管理以前一直由乌莱玛控制的慈善基金机构的大宗岁入，这样也就削弱了乌莱玛的势力。所有这些势力，过去都限制了苏丹的权力，当然有时还压倒了他的权力。马赫默德王朝以后，中央政府的权力大大加强了。权力属于皇宫和“崇高之门”（政府）。马赫默德二世在他的王朝快结束时，已是大权在握，就像他的祖先牢牢控制他们一手提拔起来的奴隶行政官员那样，他也牢牢控制着他亲手缔造的新的官僚集团。然而这批新官僚中，没一个出身于奴隶；有些官员觉得苏丹已成了独裁君主，不仅威胁着他们自身的安全，而且还威胁到国家的安泰。当马赫默德二世于 1839 年驾崩时，“崇高之门”——官僚集团的核心——开始压倒了皇宫的势力。

官僚集团也比较容易确立他们的最高权力，因为马赫默德的继承人阿布杜尔美志德苏丹（1839—1861）登基时才 16 岁，成年后性格也很温和，为人厚道而公正。在接下来的 15 年内，政府中左右局势的人物是雷什德帕夏。1839 年他是外交大臣，曾在巴黎和伦敦当过大使，精通法语，熟悉欧洲政治。他不仅倾向于约束苏丹的权力，而且也赞成西方化改革，实际上他是改革派的首领。他的观点，他的急于求成，招致了保守派官员们的强烈反对。在他执掌外交部或是担任辅政

大将军期间，好几次被保守派撵下台来。但在 1839 年，由于一场危机，总算赢得官员们的一致支持，发布了一项不同凡响的改革公告。埃及的阿里重开战火，再次威胁到帝国的一统江山，奥托曼人需要欧洲的支持。一份改革公告说不定能帮助获得这种支持，因为它表明帝国能取得进步，也值得挽救。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839 年 11 月 3 日发布了居尔哈内“帝国敕令”。

敕令的内容新旧参半。它把帝国的衰微归咎于没遵守古兰经戒律和帝国法令，但是它指出补救的办法在于制定“新法令”，“彻底改变”原有的习俗。敕令提到这样几个方面的具体内容：通过平等执法确保生活、荣誉和财产的安全；实施更有条理的税制代替纳税农庄，实行公平而固定的征兵制。敕令还进一步指出，这些改革措施对所有臣民，不论他们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一律适用。马赫默德二世生前曾任命过一个负责立法的最高政务会，现在就责成他拟定各项改革措施的具体细节，并制定西方式的议会议事程序。虽说居尔哈内敕令提到的各项许诺在马赫默德二世王朝时期就有了初步设想，但是这份形式极其庄严的公告，标志了为时 40 年的、土耳其历史上称之为“坦泽马特”——改组或整顿——时期的开始。

纵观土耳其的全部历史，也许除了最近的曼德列斯 10 年当政时期而外，再没有任何别的历史时期比“坦泽马特”时期更招人物议的了。其领导人当时就受到土耳其青年知识分子的严厉批评。这一期间进行的各项改革也受到近代土耳其历史学家的严厉指责，或被认为是浅薄而过于仓促的西化，或

认为还不够雷厉风行。也有史学家把“坦泽马特”时期誉为“播种时节”，新的观念和机构得以萌动发芽，没有这个历史时期，以后帝国时期以及共和时期的改革家们都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功。所有这些看法都有道理。但基本的事实是：帝国如果要继续立足于现代世界，除实行西化改革外别无抉择，西化切不可来势过猛，因为它会把整个社会震垮；因而改革进程必须谨慎，一步一步地去完成。即便如此，老的思想、行动与习惯也还会受到震动。当然，有些事情也可以搞得更好些。但是要不是“坦泽马特”加快了西化的进程（此进程早已开始，但始终慢慢吞吞，且时停时续，这次势头直接来自马赫默德二世王朝，由雷什德及其追随者给以有力的推动），根本不可能有现代的土耳其。

在“坦泽马特”时期，左右局势的是官僚们，特别是那些“法国通”。在1871年以前，他们的权势比苏丹还大。政敌甚至称他们为独裁者。这一指控未免失之偏颇，不过他们也确实组成了一个寡头政治集团，也像以前的任何统治集团那样醉心于权力和高官厚禄。他们中的杰出之士，如雷什德的追随者阿里帕夏和富阿德帕夏，倒也不失为具有真才实学的政治家。他们的首要目标是拯救奥托曼帝国。为此，他们就了解欧洲，要能够同列强周旋，因为帝国现在是靠了欧洲的宽容才得以存在的。1839至1840年，当阿里在法国的支持下威胁中央政府时，是欧洲其他四强的联合行动才把他赶回埃及的；它们还同意了斯凯莱什条约中所给予俄国的特殊地位。1853至1856年间，奥托曼政府由于卷入了法俄两国为提高威望而进行的一场政治—宗教较量（俄国自封为正教的

保护者，而法国自称是天主教的保护者），身不由己地同俄国打了一场克里米亚战争。靠了英国、法国和皮埃蒙特军队的支持，它总算打胜了这一仗，这是自 1739 年以来同俄国交手的第一次胜利——如果可以称之为胜利的话。从技术上说，奥托曼帝国在 1856 年巴黎和会上算是恢复了大国的地位，被列强接纳进了“欧洲音乐会”——列强还进一步保证“照看”奥托曼帝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尽管欧洲列强在巴黎和约中轻松地作出不再干预内政的承诺，但是在“坦泽马特”时期，它们却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频繁地干预奥托曼的内政事务。他们强行要求进行各种改革、特别是在基督徒少数民族权利这个问题上，他们坚持通商条约中所给予他们的各种特权；他们在政治家中拉一派打一派。欧洲各国驻伊斯坦布尔的大使以及省城中的一些领事，往往给政府施加很大的影响。奥托曼的政治家们不得不寻方设法，至少要博得多数列强的欢心，在必要时利用它们的支持，而只要有可能，还得挫一挫他们在帝国境内的锐气。既然俄国人对奥托曼改革的看法，一般总是赞成给基督徒自治权，而这也就预示帝国最终的解体，所以政治家们比较倚重其他强国，特别是比较借重法国的意见。虽然有些政治家颇为英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所吸引，但由于本能和文化背景，他们一般总倾向于采取法国的模式。

改革的某些主要特点，在马赫默德二世王朝时期已明显可见，而到了“坦泽马特”时期就愈发鲜明了；这些特点无不反映出西方的启示作用。最有意义的一个特点，也许要算国家职能范围的扩大。国家不再是一台只管执法、收税和组

织军队的行政机器；现在它还得过问教育、公共设施、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事务，而经济发展向来不在它的职权范围之内。此外，尽管军事方面的改革仍给予关注，但在马赫默德二世王朝之后，已不再是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法律、行政、外交以及教育方面：西化改革似乎也同样重要。第三个特点，随着来自西方的各种新形式不断附加到伊斯兰社区和非伊斯兰教区头上，改革的世俗性质变得日益明显。于是，伊斯兰教机构和西化机构同时并存，在教育 and 法律尤为如此，这种双重体制有时被人看作是足以致命的二元论，不过，我们也该把这看作是历史逐渐发展演变这一困难进程本身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

西化改革的第四个特点，是政府倾向于把臣民当作单个人，而不再当作某一地位经传统认可的团体的成员看待。这个方面的西化进程，也反映了在争取实现世俗平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帝国敕令”郑重宣布奥托曼全体臣民，不分教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政治家们希望能创立一种“奥托曼主义”，既足以抵销少数民族中主张独立的民族主义倾向，同时又能促使全体臣民进一步效忠于仁慈的帝国政府，尽力维护帝国江山的完整。这项“奥托曼主义”的官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困难重重，首先是遭到穆斯林的反对，他们认为它所倡导的乃是真正信徒与非信徒臣民之间的违反常情的平等。还有另一层更大的障碍，这就是基督教区仍然作为独立的法律实体存在着，而它们的权利往往受到列强的支持，而其成员最终还是更倾心于主张独立的民族主义。

另一份庄严的改革法令，1856年《絮梅云改革令》，也同

样包含了上述全部特点；在这一法令的制定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不仅有阿里帕夏和富阿德帕夏，另外还有三位驻欧大使。这份公告不同于 1839 年的法令，只字未提《古兰经》，而是较多地谈到个人间的平等——然而各独立教区的权利也给予明确的肯定。公告也强调了世俗物质的进步和繁荣，表示要建立银行，改善公共建筑和交通设施，改进商业和农业，帝国将充分发挥“知识、技术和欧洲都城”的作用。

实际上，克里米亚战争本身就已经大大增强了欧洲在帝国内的影响。士兵、特许权持有人和乱民纷纷从西方涌来。欧洲的生活风俗——服饰、刀叉、座椅——在沿海地区的城市传播开来。更重要的是，电报技术在 1855 年传到了伊斯坦布尔，及时拍发了第一份电文，向巴黎和伦敦报告俄国要塞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消息。不久，电报网遍及全国各地，不仅促进了与西方的联系，而且也便于中央政府及时检查省区官员的所作所为，地方上的问题也能同样及时地向京城汇报。随着持有特许权的外国商人承建了几条铁路短线，铁路时代开始了；由于地势崎岖不平，建筑成本较高，铁路的发展要比电报缓慢。克里米亚战争也向奥托曼政府传授了西化的又一神秘花招——通过发行债券取得外国借款。20 年里，外债数额直线上升，随之而来的则是财政破产。

完全可以理解，1839 至 1871 年间“坦泽马特”（“改组”或“整顿”）所取得的成就很不平衡。经济发展极其缓慢。农业生产如果有所增长，那也是微乎其微的。（埃及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出售棉花，获得了大量利润，这纯属例外。）吸引欧洲有技术的农民开拓殖民地的种种努力，均告失败。农民

身上的捐税负担未见有丝毫减轻。纳税农庄制两次宣布废除，而事实上却是废而不除，因为直接征税制，既没有增加岁入，也没有减少横征暴敛的弊端。1858年的一项新法令试图调整土地使用权，效果适得其反，所有权的合法凭证往往落到大地主的手里，实际的农田耕种者依然两手空空。公路和桥梁建筑发展程度，各省之间的差异很大。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工业，只是建立了一些小型制造业工厂。与此同时，由于通商条约把奥托曼的保护关税限制在8%之内，欧洲货物的进口在不断增加，这不能不损害到国内民间工艺的发展。

教育方面的成就要显著得多，虽说改革的劲头也是冷一阵热一阵的。在1846和1869这两个年头里，奥托曼新派官员两度组成委员会，起草有关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制的全面发展规划。然而创办新学校的实际进展却很缓慢。有些设想显然与现实脱节，例如在中等教育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却试图创办一所伊斯坦布尔大学。不管怎么说，倒是开办了几所质量较好的中等学校；出色的加拉塔萨雷公立中学在法国人的影响下，用法语给不同教派的孩子上课。另外还开设了女子学校、贫民学校和师范学校；1859年又新建了一所文职人员进修学校，入学的官员在那儿学习公共事务和国际事务。这所文官学校实际上就是今日安卡拉政治学院的前身。“坦泽马特”在教育方面的成果是：造就了一批比较新派的官员——受到较为良好教育的杰出人物；开创了公立学校的体制；教育中的世俗化倾向日渐明显。尽管《古兰经》学校和经院依然存在，但政府创办的学校正式脱离了乌莱玛的控制，由一个世俗的教育部门管辖。经院和政府高等学校所造就的

人才之间的教育沟壑，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现在两者之间的距离拉得更开了，因为经院的学生往往是从穷乡僻壤挖来的学生，而新式学校的学生是比较新派的城市青年。

“坦泽马特”期间法律方面的发展，在好些方面和教育的发展情况相似。由卡迪（民事法官）主持的传统法庭继续采用宗教法典，而各类新设置的国家法院，在需要的场合也沿用宗教法典，但是另外也以西方，特别是法国的法典为蓝本，将一些有关法律条文修订成法典，先是制定了商业法，随后又制定了刑法。有关义务和契约的宗教戒律仍保留了下来，但是由一个专门委员会按西方的原则将它们编集成法典。这个专门委员会的领导人热夫代特帕夏，是个受过良好教育、思想开明的乌莱玛成员。约束个人世俗身份——有关结婚、离婚和继承权等世俗事务——的宗教戒条，完整地保留下来，未予触动，因为这是最为敏感的领域。结果是，两种法典同时并存，而西式新法典的影响在逐渐增长。同时也存在两类法庭：受伊斯兰教长监督的宗教法庭和国家法院，后者由热夫代特编制成一套等级分明的司法体制，而他本人也被任命为世俗司法部门的领导人。这种双重体制引起了某种程度的混乱，其中有些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总的来说，西化和世俗化的倾向还是相当明显的。事实证明，对所有不同信仰的奥托曼臣民按一种法律公平执法的这种努力，并没仅仅停留在理论上，而是以极其古怪的形式见诸实际。鉴于穆斯林的是非观念根深蒂固，当时并没有、也不可能走出这一步，即：采用西方的民事法典，尽管阿里帕夏一时兴致所致，似乎也有过想搬借拿破仑法典的念头。

“坦泽马特”时期，不仅上层官僚集团，而且行政管理的具体做法也在进一步西化。标志之一是，权力逐渐分散：在各级政府中，司法职能与行政职能分离了开来；同时，部分立法职能也由苏丹委派给了各种钦定的立法班子（这些立法班子皆由马赫默德二世时的最高政务会演化而来）。另一标志是省级政府体制的改变。经过几度变化，最后于19世纪60年代推出了一套以法国行政结构为模式的行政新体制：省政府及下属各级部门。省长拥有很大的权限，由中央政府任命，同时还相应设立了参政会和省议会，其用意是要让民众有参政议事的机会。有些省长——最突出的要推那位先在保加利亚地区、尔后在巴格达供职的米德哈特帕夏——成功地使这一新体制发挥了作用。其他的人则并非如此。从这里可以看出，官员个人的素质和见识同体制一样重要，甚至可能更为重要。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像土耳其这样试图尽快实现西方化的国家来说，如何造就足够数量的称职、廉洁奉公的公仆始终是个大问题。不管怎么说，省政府体制一直延续到共和时期。

“坦泽马特”时期引进的代议制原则，也为政府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体现在省参政会、省议会以及各级法院等机构中的代议制原则，是建筑在穆斯林及非穆斯林共享权利的非直接选举制度上的。甚至以法国为模式的帝国政务会也进一步扩大（它的法律起草班子在1868年重新调整了一下），容纳了各种宗教信仰的代表，来自京城和外省的代表。他们都是指派的，而非选举产生。但是，多年在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推行某种形式代议制的试验，就为后人倡导宪法、实行议会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依据。

在“坦泽马特”时期，奥托曼帝国未丧失一寸疆土，反倒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而得到了一些领土，但是这段改革时期却没能把帝国的各个断层凝聚成一个牢固的整体。相反，帝国在某些环节上越发变得松散。埃及在阿里家族的世袭统治下取得了特殊的地位。1860年黎巴嫩地区一连发生几起屠杀事件，招致法国的干预，结果只得允许黎巴嫩建立自治政府。对也门地区的控制，日见困难；突尼斯虽表示矢志效忠于苏丹，也只是为了摆脱法国控制的威胁。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在列强的支持下，取得完全的自治权。在希腊人、保加利亚人、甚至在被土耳其人称为“忠诚教区”的亚美尼亚人中间，分离主义倾向日益明显，而且势头更迅猛了。奥托曼主义这一概念，尽管在平等对待全体臣民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从未被人们普遍接受。在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时代，奥托曼主义这一目标也许是不现实的，然而奥托曼领导人却不得不勉为其难。要是没有列强的干预，说不定会取得成功；但是帝国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没多久，1875年由于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斯拉夫臣民的反叛，出现了危机，最后导致列强干预。这证明奥托曼主义根本行不通。这场危机也使民众对阿布杜尔阿齐兹苏丹（1861—1876）政府的不满情绪达到了爆发点，这位苏丹在坦泽马特时期的主要政治家阿里帕夏去世之后，越来越变得反复无常，越来越不得人心。

批评政府的人此时有了可供发表意见的新渠道——报纸。独立经营的报业在60年代初出现之后，发展迅速。这是克里米亚战后年代蓬勃兴起的土耳其文学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西化牢固生根的一个领域。诗歌、戏剧、小说以至

报刊文章的西方形式，开始引起奥托曼上流人士的兴趣。西方文学作品的译本问世之后，很快就出现了一批受这种形式影响的、颇有见地的土耳其文学作品。有些作家深信，较之奥托曼官方崇尚的和谐却失之浮华的典雅之风，简洁更为可取；他们尽量用土耳其语替代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缩短文句，简化拼写，使自己的文章更易为读者了解。有些大胆的作家甚至建议取消阿拉伯字，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它们不适于用来表示土耳其语音；他们主张改用拉丁字母。在题材方面，特别是在一些介绍所谓“实用知识”的文章中，西方化的影响也明显可见，例如出现了一些论述儿童养育、政治经济学以及交通运输的文章。西方化的影响也见之于探究民族、政府与进步等问题的思想模式上。书籍出版量有所增加，但表述意见的主要工具则是好似出土新芽的报章杂志。

在这些领域，尤其是在新闻领域中一马当先的，是一批自称为“新奥托曼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所有的人差不多都在 40 岁以下，曾受雇于政府，许多还在翻译局干过差事。他们都懂点法语；大多出身于奥托曼上流人士家庭。他们的共同点除了爱好文学以外，就是都不喜欢官僚集团的上层人物，特别是阿里帕夏。他们称他为暴君，在 1865 至 1867 年期间曾密谋把他赶下台。他们鼓吹“立宪政府”。他们由于在报纸上发表攻击文章并密谋起事，遭到官方的弹压，于是新奥托曼党人的为首人物逃到了巴黎。他们在伦敦、日内瓦等一些西方国家的避风港内，继续出版报纸，再通过外国人办的邮局把报纸偷偷运回伊斯坦布尔；根据通商条约条款，邮政仍控制在列强手里。他们出版的最有影响的报纸《自由

报》，攻击阿里政府，原因是：没有制止住西方的干预，给予帝国某些省区越来越多的自治权，同意给基督徒某些特权；无视传统的伊斯兰教法规和文化，推行世俗化的改革。

新奥托曼党人决不是一些墨守成规的守旧派，他们反复强调经济发展、科学知识及现代教育的必要性。不过他们往往回过头去，从他们所谓的“伊斯兰的民主传统”中寻找论据，认为这才是立宪的依据。在他们看来，立宪制度就是某种能对政府权力起限制作用的代表大会。新奥托曼党人往往各人有各人的见解，特别是在政治问题上，所以这个团体本身不久就涣散分化了。他们中最有影响、最受人尊重的人物是凯末尔。他的政治主张倒是始终如一的：主张成立代表全体奥托曼臣民的、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主张立法与行政两权分立。他说，主权属于人民；而所有这些，都能在伊斯兰教的大框架内付诸实现。他在流放回国后写道：“我们唯一真正的宪法是伊斯兰法典。”而且再次重申：“奥托曼国是建立在宗教原则之上的，如果违背了这些原则，国家的政治生存将处于危险之中。”

新奥托曼党人对土耳其思想和文学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代共和国时期，现代共和国视他们为精神上的先驱。他们最大的思想影响，是促进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情绪。虽说他们中有些人对土耳其的过去，对中亚细亚突厥族祖先发生兴趣，热切地希望维护奥托曼领土的完整，但他们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他们反复向人们灌输的是：对国家的自豪感，对先辈创建的伊斯兰奥托曼帝国的忠诚不渝，以及捍卫国家、平息叛乱的热切愿望。他们在“瓦坦”（家园）

一词中倾注了深厚的感情内容，这个词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一直用作“祖国”的同义语。相当于法语中的 *patrie* 一词。凯末尔的一个剧本即以“瓦坦”为题，1873 年在伊斯坦布尔公演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热情的人群涌向街头连连示威，最后，胆战心惊的政府赶紧下令禁止该剧上演。这种奥托曼爱国主义包含了未来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种子。它也表明了土耳其人正开始经历西方早已完成的变迁：对某个社区或统治王朝象征物的赤胆忠心，正为对神圣国土及子民主权的忠诚不渝所代替。然而，这种变迁直到土耳其共和国稳固建立之后才得以最后完成，而有些土耳其人至今还没达到这种思想境界。

阿里帕夏死后，新奥托曼党人发现，政府越来越为阿布杜尔阿齐兹苏丹所摆布操纵，他频频更换官员，而政府每况愈下。由于经济贫困萧条，俄国人在帝国境内的势力不断加强，再加上政府拒绝支付国债的利息，国内的忿懣情绪日益强烈。当 1875 年政府没采取有力行动平息波斯尼亚叛乱，当俄国为支持巴尔干半岛的叛乱而对政府施加泛斯拉夫主义压力时，不满情绪终于达到了顶点。以米德哈特帕夏为首的一小批官员，在新军兵团和海军军官的支持下，就像当年的近卫兵团那样采取了行动——1876 年 5 月 30 日的一场不流血政变，废黜了阿布杜尔阿齐兹。

而继他以后上台的、思想比较开明的穆拉德五世，却因神经失常也于三个月后被废黜。他的兄弟阿布杜尔哈密德二世即位。

1876 年夏，一部宪法在酝酿讨论之中。阿布杜尔哈密德

也同意公布一部宪法。该年秋季，面对泛斯拉夫主义和欧洲列强的干预，群情激昂，出现了一股爱国主义热潮和伊斯兰教的狂热情绪；这种气氛进一步催化了有关宪法的讨论。11月末，在米德哈特帕夏主持下的一个由乌莱玛成员和文官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提出了一部宪法草案。接下来，在国务会议上大臣们又争执不休，争执的主要问题是苏丹究竟该拥有多少特权。等草案最后文本呈递给阿布杜尔哈米德之后，他又压着迟迟不表态，最后总算批准了，不过宪法又加上了这么一句：凡属危及国家安全的人物，苏丹皆有权将其放逐。1876年12月19日，米德哈特被任命为辅政大将军，4天以后，奥托曼历史上第一部正式成文的宪法公之于众，庆典是在“崇高之门”前面的、刚被大雨冲刷过的广场上举行的。

这部宪法从头至尾显露出西方的影响。它对内阁、由苏丹任命的上议院、由选举产生的众议院、独立的司法机构以及人权法案等，都作了明文规定。立宪主义者把希望寄予由选举产生的众议院，虽说内阁并非像米德哈特最初提议的那样对议会负责，而是对苏丹负责。实际上，苏丹拥有批准立法、任命各部大臣、召集和解散议会等各项大权——事实上，他的最终控制权本来就无可置疑的。这种形式的政府不妨可称之为“有限制的独裁政府”。开明的比利时宪法提供了某些启示，很可能更带君主主义色彩的普鲁士宪法，也起到同样的启发作用。苏丹被宣布为“哈里发”，他本人也被宣布为神圣不可侵犯。虽说有些奥托曼统治者也使用过哈里发的衔称，甚至还正式载入18世纪以后所签订的一些条约里，但是没有谁像阿布杜尔阿齐兹在他当朝的最后几年里那样大量使用这

个头衔。不多久，阿布杜尔哈密德就试图给它增添新的光泽。

1876 年宪法再次强调了奥托曼全体臣民的平等地位——在公民自由方面，在所有法律权利方面，在担任政府公职方面，以及在当选议会议员方面，均一视同仁。伊斯兰教被定为国教，但除了这点，除了苏丹的哈里发称号之外，再不提关于区分教区的事儿了。政治家们全力以赴，免使帝国在危机时期出现分裂局面，而这部宪法显然也是其中的一项措置。这在第一项条款里就明显反映出来。这款条文规定：帝国——包括像罗马尼亚这样的特许区在内——是一个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分割的整体。其实，米德哈特及其追随者希望用这部宪法作为对付列强的有力武器，列强的代表此时也正在伊斯坦布尔开会，就叛乱烽火四起的巴尔干各省区提出了他们的改革方案。米德哈特也像 1839 年的雷什德帕夏那样，有意要向列强表明：帝国完全有能力自行改革，有能力处理自身的问题。许多欧洲外交家自然会认为这个文件缺乏诚意，也许只是个诡计。其实并非如此。但是列强总是按自己的假想行事，硬要奥托曼政府采纳一项它不愿接受的改革方案。

其结果是，1877 年 4 月俄国从巴尔干和高加索两翼发动一场进攻，还自称是以欧洲的名义在行事。俄国人在 19 世纪前 3 次俄土战争中所引用的那种思想意识旗号，始终是打上宗教色彩的——保护他们的东正教兄弟。1877 年的战争则具有种族的、泛斯拉夫主义的色彩。土耳其军队在出色的普莱夫纳防御战中坚持了六个月，阻挡了俄国人的进攻；可在 1878 年初，俄国人越过埃德尔纳，一路推进至伊斯坦布尔郊区，强迫土耳其人接受了一份泛斯拉夫性质的和约。圣·斯

蒂方诺条约迫使土耳其人承认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得内哥罗的完全独立。条约划定了一个拥有大片疆土的自治的保加利亚。至于俄国人自己，则拿到了比萨拉比亚以及土耳其东部的卡尔斯和阿尔达汉等战略地区。奥托曼帝国的两翼，特别是巴尔干半岛这一翼，遭到了重创。土耳其人的损失影响到英国以及奥地利的利益；英奥两国生怕俄国的影响会迅速向地中海地区渗透，因而希望支持奥托曼人，以阻止俄国的扩张。尽管普莱夫纳防御战最终失败了，但是这一仗的英勇气势又赢得了英国人对土耳其人的钦佩；土耳其人不愧为俄国熊的强劲对手。英国在其他列强的支持下，以强硬的立场劝诱沙皇同意在柏林召开国际性会议，核定已签订的和约。会议于1878年6月召开。圣·斯蒂方诺条约的大部分条款都被确定下来，只是大保加利亚被砍削掉一部分领土，变小了；塞尔维亚和门得内哥罗已有所收缩；而奥地利则被允许占领并管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根据一项强加于苏丹的单独协议，英国也获得管理塞浦路斯并利用它作为基地的权利，作为回报，它许诺帮助土耳其抵御俄国。因此，土耳其人的命运是由外部决定的，这在近代史上已属屡见不鲜的现象了。土耳其是个大输家，不过手头毕竟还保住了一些血本。

在此期间，宪法的事并未置诸脑后。根据一项临时选举法，利用省政府议会作为选举机构，由此推选出众议院议员。众议院在伊斯坦布尔先后召开了两次会议，一次是从1877年3月至6月，另一次从该年12月至1878年2月。没取得什么立法成果，主要是由于阿布杜尔哈密德和大臣们在法案提出或批准时，一味拖延扯皮。但是议院本身总的来说表现不错。

有些议员净作无谓的争论，或是爱发议论放空炮。可大多数议员不仅抓住问题的要害，而且发言切中时弊，显示出独立的见解和远大的目光。穆斯林议员和基督徒议员之间虽有分歧，但以大局为重，还是在谋求帝国的福祉方面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第二次会议适逢俄军突破防线，向埃德尔纳和京城伊斯坦布尔步步紧逼，议员在会上慷慨陈词，直言不讳地指责政府的无能、腐败、指挥战事不当。这一下可惊醒了苏丹。

尽管阿布杜尔哈密德当时为了登上王位答应制定一部宪法，然而就已有的史料来看，他对立宪一事从未给予任何积极的支持，也许他真正中意的是宪法草案的最后文本，因为它赋予苏丹各种大权。不管怎么说，是他削弱了原始的宪法草案，而且在1877年2月，他还赶在议会召开之前抢先放逐了辅政大将军米德哈特帕夏，后者很可能希望利用立宪政体，实现他关于政权机构的原始设想，即：内阁对议院而不是对苏丹负责。现在事实证明，议会不愿受任何约束，受怎么做就怎么做，阿布杜尔哈密德意识到议会会给自己的统治带来多大的麻烦，而且议会还有可能成为公众不满情绪的聚焦点。最后，艾赫迈德埃芬迪——一名由伊斯坦布尔选入议会的著名成衣匠——在一次为讨论如何收拾战争残局而在皇宫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发表了一篇大胆的宣言，苏丹终于再也承受不住了。这位成衣匠对苏丹说：“你此刻来征询我们的意见，为时已晚。议会对目前这样的一种无能为力的局面，拒绝承担任何责任……议会所作出的各项决议，没有一条是得到贯彻的。让我再重复一遍：对造成目前困难重重的局势，议会拒绝承担任何责任。”苏丹当然不习惯于成衣匠用这种口气对

自己说话。次日，阿布杜尔哈米德宣布议会休会。议会一休就休了 30 年。苏丹如此行事的简单事实，恰恰充分说明了议会的潜在战斗力。宪法也被搁置了起来，但它始终是日后改革家们回顾瞩目的一盏明灯。

第六章

从专制到革命：阿布杜尔哈密德二世苏丹时代（1878—1909）

在史家笔下阿布杜尔哈密德二世苏丹的日子并不好过。国内外对他的评价大都根据反对派的看法。青年土耳其党人以及他们在现代共和国的思想继承人都把他看成是专制君主，认为他在 1876 年到 1878 年的第一次宪政和 1908 年革命开始的第二次宪政期间践踏了自由。西方人则因 90 年代大肆屠杀亚美尼亚人而大为震惊，他们不仅把阿布杜尔哈密德二世视为暴君，还称他是“血腥的苏丹”和“该死的哈密德”。阿布杜尔哈密德在长期统治岁月里所养成的那种不容置疑的独特个性，诸如行动鬼秘和近乎偏执狂的猜忌多疑，更加深了人们的这些看法。但这些看法却未能全面把握这位人物或他的时代。与前任 3 位苏丹相比，阿布杜尔哈密德留给他时代的印记当然更加难以抹掉，在这方面，他堪与本世纪初马赫默德二世苏丹媲美。不过，哈密德是这样一个人：他既是

独裁者、镇压者，又是改革者、奥托曼爱国主义者，还是环境的牺牲品。

阿布杜尔哈密德头几年统治期间所发生的内外事件，可以解释他的一些态度和行为。从登基继位时发生的有关事件中，使阿布杜尔哈密德懂得，对于哪怕有一点儿阴谋味的事情都应该加以猜疑。他毕竟是在 1876 年米德哈特和一小撮官吏两次图谋废黜苏丹后才掌权的。他自然不愿受到那些自封为王位拥立者的庇护，也不愿重蹈前任苏丹的覆辙。前任苏丹之一，阿布杜尔阿齐兹苏丹在放逐后自杀，而阿布杜尔哈密德相信也许这是王位拥立者犯下的一件谋杀案；总之，他非常害怕暗杀。阿布杜尔哈密德那位被放逐的哥哥穆拉德——阿布杜尔哈密德是继他为苏丹的——当时仍然活着，但被监禁在王宫。1878 年曾不止一次发生过未遂政变，企图把他释放出来重登王位。一名当地的新奥托曼党人叫做苏阿维的，曾领导过一次这样的阴谋，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希腊共济会则是另一次阴谋的领导者。

与此同时，众议院曾动议召回被流放的米德哈特帕夏。米德哈特终于获准以叙利亚和当时伊兹米尔总督的身份回朝，但他在 1881 年抵达首都时，却以谋杀阿布杜尔阿齐兹的莫须有罪名，成了阶下囚。对他的审讯是一出闹剧，无助于树立阿布杜尔哈密德苏丹的威信。米德哈特被判流放到阿拉伯的塔伊夫。1884 年大概由阿布杜尔哈密德直接下令，在那儿绞死了米德哈特。凯末尔和其他几个 1876 年阴谋宪政运动者都被流放到外省直到死亡。也许阿布杜尔哈密德从未忘却过发生在这些早期年代的恐惧。米德哈特虽被干掉了，但穆拉德

一直活到 1904 年,而且不时传说他已完全恢复了因精神病造成的体力衰竭,可以重登苏丹宝座,行使职权。

阿布杜尔哈密德统治头几年发生的外部事件同样的糟糕。1878 年的柏林会议宣布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独立并永远脱离帝国,保加利亚则获得自治——虽说自治的范围比俄国要求的稍小些。奥地利占领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英国占领了塞浦路斯。此外,俄国还取得了它在欧亚的战略边疆地区。1881 年,欧洲国家为了贯彻柏林会议的诺言,要奥托曼给予希腊一次包括谷仓塞萨利在内的相当大的北方领土。同年,法国占领了突尼斯,把它变成了保护国。翌年,英国占领埃及。埃及虽说早已不直接受奥托曼帝国管辖,但即便在英国控制下,它名义上还是帝国的一部分。由于法俄的压力,阿布杜尔哈密德在 1887 年没有能够批准德拉蒙德沃尔夫会议的约定,这个会议曾规定英国撤出埃及,从此之后,就没有作过英国撤出埃及的安排。终阿布杜尔哈密德之世,埃及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不准土耳其报纸提及。迟至 1906 年,英国迫使奥托曼承认一条位于地中海和亚喀巴湾的行政边界线,这使奥托曼地面部队无法通过西奈半岛直接和苏伊士运河接触。诚然,在 1881 年到 1908 年这段时间内,再也没有丧失过其他领土,但获得自治的保加利亚在 1885 年吞并了东鲁梅利亚,而阿布杜尔哈密德却得不到大国的足够支持来制止这一行动。由于这种种失败,苏丹对欧洲列强的干涉,便格外地小心,一心一意想保全剩下来的领土,担心少数民族的骚动会给新的叛乱分子以可乘之机,而一个或更多的大国将会支持这些叛党。

在诸如此类事件的影响下，阿布杜尔哈密德把权抓在自己手里。这确实是个人的统治时期：权力从政府转向宫廷。这位苏丹既不愿受官僚的摆布也不愿听命于议会，他巧妙地利用情势来达到他的目的。在登基的六个月内，他利用宪法撤了米德哈特辅政大将军的职务并流放了他。宪政改革运动这个小团体只得目瞪口呆，大气也不敢出一下。此后6年内，阿布杜尔哈密德不准在位的辅政大将军享有不受侵害权。在这6年中，统共有16位辅政大将军，其中的几个未受封辅政大将军的官衔而称首相，却无西方首相通常所拥有的广泛权力。直到赛义德帕夏在1882年底出任辅政大将军，这个古老官职的任期才通常为一年或一年以上。阿布杜尔哈立德总算找到了多少可以信赖的人，国内外局势这时也开始趋向平静。

米德哈特流放一年后，阿布杜尔哈密德以俄土战争结束时的危急形势为借口，解散了议会。从1878年到1908年，他根本就没有召集过一次新议会而统治全国，尽管从未公开废除宪法而且还继续把它刊在帝国年鉴上。这30年的专制统治也许是非法的，因为宪法特别规定，倘若苏丹解散议会，新的议会必须在六个月之内开会，并进一步规定，宪法条款不得以何种借口予以中止，而阿布杜尔哈密德本人是接受并亲手颁布这个宪法的。但宪法并没有强制苏丹行动的条文，相反，它宣布苏丹是非责任者。就穆斯林臣民总体而言，他的这些行动不一定不得人心。因为议会政府于大众根本没有意义，他们所尊敬的，还是奥托曼家族的天潢后裔。人们大多认为专制君主用心善良，会慈父般地帮助他的臣民。在早期年代，阿布杜尔哈密德也许确有这种好心。与前任两位苏丹

相比，他俭朴而不奢华，饮酒有度，体力充沛，思路敏捷，虔诚笃实。这些品性使他颇有名声。所以，在掌权的头几年，他给人们的印象是个聪明肯上进的统治者，以个人专断来拯救和改善帝国的统治者。

阿布杜尔哈密德很注意博得大众的好感。这特别表现在他强调自己作为哈里发的地位以及重视增进伊斯兰的团结。政府以往在意识形态上强调奥托曼主义，现在则逐步强调泛伊斯兰主义，随着阿布杜尔哈密德统治的加强，泛伊斯兰主义便日益壮大。泛伊斯兰主义的部分目标，是专门为了确保阿拉伯臣民对他的忠顺。阿布杜尔哈密德选拔一批阿拉伯人充当近侍，在阿拉伯城市新建或重建了几所大清真寺院，并鼓励人们去朝圣。泛伊斯兰主义思潮最令人难忘的物质证据，是 1901 年到 1908 年修筑的希查斯铁路，这是一条从大马士革到麦迪纳全长 800 英里的铁路，而且不要欧洲资本参加。在奥托曼帝国，没有第二条铁路是本国修造的。对于阿布杜尔哈密德自封为哈里发，某些阿拉伯和宗教领袖只给予有限的支持，某些人诸如的黎波里的塞纳西教派根本就反对。阿布杜尔哈密德本人担心阿拉伯领袖会反对他，故强令后任麦加沙里夫的胡赛因住在远离圣城的伊斯坦布尔。看来，强调泛伊斯兰主义确实在某些方面起到了把帝国的各个部分连结起来的作用，尽管它的后果还难预料。

强调泛伊斯兰主义还有两个但很快就合二而一的作用。首先，它鼓励外表的虔诚而不让伊斯兰教获得新生的内在活力。因为，使伊斯兰教义现代化的重要思潮发源于阿布杜尔哈密德控制范围以外地区，诸如印度或埃及，或者发生在他

统治地区的边缘地带。笃信宗教、蒙昧主义和迷信无知是帝国首都和土耳其地区的特征。经院虽多，但未经改革，相反，宗教狂热的修道院却与日俱增。另一个作用是反西方势头的增强。在欧洲列强尤其是英、法、俄向非洲和亚洲进行帝国主义的扩张，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屈服于外国统治的年代里，就阿布杜尔哈米德来说，也许他是有意要起这个反西方作用的。与 70 年代初的阿布杜尔阿齐斯一样，阿布杜尔哈米德利用人们反抗西方侵略的心理，至少赢得了人们在感情上团结在他这位哈里发周围。此类泛伊斯兰主义，目的在于提高奥托曼统治者的国际威望，当然顺便抬高了阿布杜尔哈米德在广大臣民心目中的地位。阿布杜尔哈米德当时得到了德王凯塞·威廉二世的支持。威廉二世为了对付英、法、俄，改善德国的国际地位，鼓励阿布杜尔哈米德自封为哈里发，并在 1889 年和 1898 年两次访问这位苏丹。在第二次访问时，威廉在大马士革的萨拉丁墓前发表演说，宣称他是全世界三亿穆斯林的朋友。就此而言，阿布杜尔哈米德强调泛伊斯兰主义至少收到了暂时的效果。

除了以宫廷为中心的君主专制和宣传泛伊斯兰主义外，阿布杜尔哈米德的统治还包括使用新闻检查、警察、间谍和流放等手段。他似乎对谁都不信任。新闻检查有两个机构，一个设在政府，一个设在宫廷，相互监督，共同对付报刊。报纸被禁或暂停发行乃家常便饭。来自国外的期刊和书籍尤其受到怀疑，奥托曼政府虽不能控制伊斯坦布尔和其他城市的外国邮局——这些书刊大部分通过这种渠道进入——但政府间谍有时照样能拆开邮封。有些地方报纸受政府津贴；本地

和外国记者抓住这位苏丹害怕公开报道会造成不良印象的心理，大敲“竹杠”。告密者把报纸或报告送到苏丹办公室，这些报告往往控告无辜者从事颠覆活动。欧洲或美国教会和慈善团体在帝国境内开办了一些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受到严密的监视，土耳其人往往被禁止进入这类学校求读。奥托曼大中学校的学生也受到监视，1890年以后尤其如此。通过奥托曼驻外使领馆和告密者，政府照样可以监视土耳其流亡者和少数民族移民。新闻检查制度和间谍特务活动引出了一连串稀奇古怪的事，有些是杜撰，可有些确是事实。举例来说，如果你使用宪法、发电机、米德哈特帕夏、穆拉德、王储、马其顿等词汇以及某些化学方程式，那确有危险。

80年代以后，阿布杜尔哈米德更是杯弓蛇影，越发把自己关在首都以外的耶尔德泽王宫，与世隔绝。这种猜疑气氛造成了土耳其知识分子的双重性格：公开场合的常人和私下场合的鬼鬼崇崇者。报纸有时也有不同形式的双重性格，一面雇佣专人撰写歌颂苏丹的诗句，一面也刊登一些偶尔有停刊风险的可靠消息。

当然，在帝国内不传播新思想是办不到的，一旦向西方打开了门户，要重新关上就不那么容易。西方的知识，尤其是科学和文学方面的现代思想正加紧传播。被迫回避政治问题的刊物，继续按它们在坦泽马特时代的方针办事，翻译法国文学，刊登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传播有用的和科学的知识。多产作家兼报纸主编米德哈特在这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他原先受庇于米德哈特帕夏门下，但规规矩矩地接受了阿布杜尔哈米德的统治，甚而溜须拍马，后来即出任各种官职。其

他撞上新闻检查的作家和编辑有时用换个刊名的办法使杂志得以生存，有时则在流放中继续写作。同时，由于各类学校的兴办，识字的人逐渐增多，读者亦随之增加。

在教育领域，阿布杜尔哈密德是继承坦泽马特传统的改革家，虽说不那么一以贯之。初级小学兴办的不多，没有什么进展，但高小和初中在他统治时期确有增加，这类学校大都办在省城和大城镇。在一些省城还兴办了军事预备学校，学生毕业后可进入高一级军事学校。首都伊斯坦布尔以外的学校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常常与统治阶级培养他们成为高级梯队的目标相冲突，1908年的革命就是明证。有些高级专门学校如文官学校和军事学院扩大了规模，此外，还有一所法学院和新建的医学院。法学院最后成为伊斯坦布尔大学的一个学院，该大学虽在坦泽马特时代三度死里逃生，总算在1900年开学招生。高级学校虽受到哈密德制度的监视，不满现状的思想仍在部分学生中滋长开来，因他们受的是西方式教育，他们学习科学、数学、法语甚至还学习历史。世俗主义而非宗教迷信成了学生和课程的特征。军事学校和绝大多数其他高级学校都是为哈密德制度培养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才——虽不是知识渊博的政治家，至少是合格的技术专家。在这方面，阿布杜尔哈密德是个向前看的人物。为了帝国的生存，必须拥有一支有效率的武装部队。海军进展不大，虽说吨位和火力有所加强。在阿布杜尔哈密德统治的大部分时期里，海军最大的装甲舰停泊在金角湾。这位苏丹似乎害怕舰队远离他的视线，即便巡戈演习也是如此；也许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废黜阿布杜尔阿齐兹时，海军大臣怎样把军舰从博斯普鲁

斯调来对准王宫的。但陆军是另一码事。为了防止少数民族造反，保卫各省安全，陆军尤为必需。1883年，帝国聘请德国军官兼军事史学家冯·德·哥茨来改组奥托曼陆军。他为此工作了12年，其结果便是1897年打败希腊的辉煌成就。

在其他物质生活方面，阿布杜尔哈密德统治下的帝国也是朝着西化方向发展的。在欧洲资本的资助下，修建铁路，兴办矿山和公用事业。因此，绝大部分的利润以货币形式从帝国流向海外。但帝国得到的好处却是物质生活日益方便以及随资本渗透而来的技术和知识上的进步。在克里米亚战争年代开始建设的电报网，到了阿布杜尔哈密德二世时期已四通八达。它有着双重政治意义。新建的电报线路，简化了的电码以及受过训练的接线员，可以使这位苏丹对各个行省进行严密的监视。另一方面，电报局里受过教育的技术人员，后来在许多场合将同反对伊斯坦布尔政府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和基马尔主义分子合作。电报又可以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一种工具，今后他们可以通过电报在远隔千里之外向政府发出威胁，提出改革要求。

与电报相比，铁路自然在长度上要短得多，但它的兴建也是件了不起的事。阿布杜尔哈密德在这方面继承坦泽马特开创之风，仍朝着西方化的方向前进。在那个时代，租给欧洲人修建的铁路都比较短，但已打通了富饶的内地与附近港口城市之间的联系。伊斯坦布尔和埃德尔纳直到1888年才经过维也纳和欧洲铁路网连结起来。此后，阿布杜尔哈密德显然更多地从铁路的政治和战略利益出发，而不是注意经济上的好处，他与德国集团签订了合同，在安纳托利亚修造铁路，

先铺设到安卡拉的线路，然后修建科尼亚一段。这两条铁路都在 90 年代通车。

1903 年，由德意志银行控制的巴格达铁路公司获得特许，将线路延伸到科尼亚之外，经阿马纳斯和陶鲁斯山脉沿幼发拉底河直达巴格达。这条线路的走向完全根据土耳其的战略利益，它要求铁路远离受奥托曼保护的地中海沿岸。同样，俄国也施加了压力，即未经它的许可，不得在安纳托利亚东北部铺设路轨。巴格达铁路公司着手开拓新商业地区，很快发了财，只是山区一时无法打通，因筑路成本太高。这条铁路使得德国从原先获得的经济好处变成政治上的利益。德国开始把他们的巴格达铁路称作“势力范围”，这条铁路后来终于成为列强争吵的主题。它是德国与奥托曼帝国最坚强联系的象征。德国的投资与贸易不久即在奥托曼帝国名列第三，仅次于英法。对苏丹来说，这条铁路是他连结遥远行省的钢铁纽带，是运输军队的工具。

铁路建设和其他经济事业能够得到发展的部分原因，在于当时出现了一个机构，它起源于 1875—1876 年奥托曼的财政危机。由于政府信誉受到影响，加之无力偿付巨额外债，帝国便在 1881 年同意和持有奥托曼公债的欧洲国家作出安排。据此，建立了奥托曼债务管理局，由外国贷款人代表组成的理事会进行领导。债务管理局授权管理以各项税收为基础的帝国岁入，并垄断了处理债务的一切事宜。该局征收和分配帝国的岁入，它同时成了征收其他税收的机构。由于管理得当，效率很高，它提高了帝国的物质福利，培养了大批雇员（但大都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恢复了帝国的信誉，还为

奥托曼财政创造了盈余。但是，一个由外国人经营的半官方机构毕竟侵犯了土耳其主权，在以后的年代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是不会不记住它的。

阿布杜尔哈米德的统治虽在教育 and 经济方面有所进步，反抗的浪潮还是从两个不同的来源兴起。其一是受过教育的土耳其人不满苏丹的专制统治。其中一小部分人曾和 20 年前的新奥托曼党有联系，大部分人只是通过阅读诸如纳米克·凯末尔等人的著作才知道这个党的。阿布杜尔哈米德专制统治的个别反对者在 80 年代初出奔欧洲，直到 80 年末，学生团体尤其是军事学院和军事医学院的不满现状的学生团体才成为反抗的中心。1889 年，一小部分军事医学院的学生组织了后来叫做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秘密组织，人们通称它为青年土耳其党。包括一些文官在内的其他人，也参加了这个组织。这些当时的自由派接触了西方思想，愤懑于专制主义和特务统治。哈米德统治的蒙昧主义使他们格外对立，他们抗议西方列强的外交和军事干涉，这些人既是奥托曼的爱国者，也是哈米德家族把特权荫及儿孙和亲属的批评者。他们许多人都来自外省。

另一个反对派起源于非土耳其民族日益增长的独立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在一些受过教育的阿拉伯人中间，通过阿拉伯文化复兴培植了阿拉伯主义的意识。叙利亚甚至一度产生要求自治的思想，阿尔巴尼亚也开始发展了类似的地方主义倾向。马其顿和克里特的希腊人，希望和他们独立的希腊同胞结盟，希腊自然怂恿这类活动。保加利亚人同样垂涎马其顿；当一个团体在获得自治的保加利亚为马其顿工作时，

1893 年成立的内马其顿革命组便在马其顿省内鼓动人们起来反对苏丹。亚美尼亚人现受到本民族文化复兴的鼓舞，萌发了民族独立的新意识，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这些组织打算用武力取得他们在柏林会议的代表未能获得的自治。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的自我民族意识要高于阿拉伯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况且这三部分更靠近帝国的中心，这便引起阿布杜尔哈米德的严重关注。90 年代初，他组织了所谓哈米德团，由非正规的库尔德边境部队组成，来对付亚美尼亚人。

由于这些分裂主义运动，奥托曼帝国在 1894 年到 1897 年这段期间面临一个既是国内又是国际的头号危机。尽管城市上层分子和普通农民都不同意，亚美尼亚革命组织还是发动了起义和抗议示威，接踵而来的便是大屠杀，使许许多多无辜的亚美尼亚人丧生。欧洲列强于是开始讨论改良措施，强使阿布杜尔哈米德政府贯彻执行。保加利亚人在马其顿的暴行激怒了希腊人，他们要以牙还牙。与此同时，克里特岛上的希腊人揭竿起义，要求与希腊合并，其结果是大肆屠杀基督徒，以致希腊公众怒火中烧，雅典当局便派兵声援起义，并在 1897 年向奥托曼帝国宣战。奥托曼陆军彻底击败了希腊，这是阿布杜尔哈米德统治生涯中唯一的一次胜仗。但在列强协调行动的压力下，奥托曼陆军不得再向前挺进或实行领土的吞并。事实上，列强已迫使土耳其承认克里特在希腊王子乔治管辖下的自治。赢得战争胜利的奥托曼帝国仅得到一笔赔款。

然而，奥托曼帝国作为胜利者乃是因为欧洲列强在干涉

及至瓜分这两个更大问题上拖延不决。列强之间的意见分歧连维持现状和保持平静的最低限度协定都难以达成。索尔兹伯里勋爵对英国长达 60 年之久的政策早就表示严重的怀疑，这项传统政策认为奥托曼帝国可以获得再生并维持下去。这位勋爵提议欧洲国家采取共同行动来强制阿布杜尔哈密德苏丹，但得不到其他国家的支持。20 年前就热衷于剥夺奥托曼帝国组成部分的德国，时下却深陷远东，无法帮助亚美尼亚人，只得同意奥地利关于保持巴尔干安全的建议。在圣彼得堡，俄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关于沙俄军队应作好准备占领博斯普鲁斯海峡基地的建议，也被搁置起来。有些欧洲国家为东面的亚美尼亚省制订了一项温和的改良计划，但由于缺乏强制手段而毫无结果。奥托曼帝国的命运再次操在外国人手中，即便这次外国人不采取行动。亚美尼亚和马其顿问题依然未获解决。阿布杜尔哈密德加强了对国内的镇压，同时，更强调他这个自封的哈里发地位的重要。

在这内外危机年代里，反对阿布杜尔哈密德统治的地下活动日见增多。团结与进步委员会建立的 5 个秘密支部已扩展到学生和出任文官的毕业生，在兽医院和其他高等学校也发展了组织。政府的镇压激起了秘密的反抗，反抗招来了镇压，如此循环往复。1895 年，政府逮捕了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某些成员。1896 年，团结与进步委员会因叛徒告密，使他们推翻政府的计划落了空。是年与次年，政府在全国实行大逮捕，很多人被判入狱，充军流放。能逃的就逃到欧洲或埃及，居住巴黎的，是一些出身各异的个人主义自由派人物，其中数里萨最有名望。他在法国受过部分教育，是奥古斯丁和

康德的思想门徒。作为实证主义者，他信奉普遍的进化，同时认为伊斯兰教义仍有活力，足以推动此种进化。里萨和几个逃亡者合作，于 1895 年创办了《协商报》，以土耳其文和法文两种版本发行。其纲领是号召维护奥托曼帝国，反对一切外国干涉，号召改良和奥托曼主义，主张重立 1876 年的宪法，借鉴西方科学同时保存东方文化，摒弃使用暴力。报纸通过外国邮局偷偷送到奥托曼读者手里。

一个叫穆拉德贝伊的高加索人，他受过俄国教育，是个记者，当过奥托曼债务管理局的雇员，在 1895 年逃亡到了伊斯坦布尔。他向阿布杜尔哈密德苏丹呈递了一份改革备忘录，但没有结果。他在埃及再度出版了《平衡报》，报纸再偷运到帝国。由于它的土耳其色调比《协商报》更浓，于是受到了更多的青睐。他在欧洲参加了团结与进步委员会，但他和里萨未能精诚团结。由于穆拉德贝伊更受大众欢迎，他便成了团结与进步委员会在欧洲的领导人。他留在日内瓦开展工作，里萨则住在巴黎。但在 1897 年，“平衡者”穆拉德——这是人们根据他办的报纸而起的绰号——受阿布杜尔哈密德苏丹派来的一个特务的诱骗，回到了伊斯坦布尔，说是苏丹将大赦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成员。可是苏丹没有实践诺言。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被拉下了水，与苏丹妥协，唯有顽固的个人主义者里萨仍留在巴黎。穆拉德贝伊的被拉下水，使伊斯坦布尔地下活动处于瘫痪状态。团结与进步委员会在巴尔干、开罗和日内瓦的支部仍积极活动，但它们之间本就不多的协调，这时几乎没有了。

1897—1898 年，阿布杜尔哈密德的统治似乎进入了一个

新的平稳与安定状态。亚美尼亚和马其顿即将发生外国干涉的危险已经过去，欧洲列强的注意力集中在瓜分中国以及当时在苏丹酝酿的一场英法对抗。阿布杜尔哈密德的陆军从希腊班师回朝。德王凯塞移樽就教前来访问好友苏丹哈里发。铺设新铁路的工程开始上马，泛伊斯兰主义的宣传似乎也日见效果。被流放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彼此不和，留在伊斯坦布尔的，或遭逮捕或停止了活动，沉寂下来。阿布杜尔哈密德的统治甚至越来越压制新思想了。

但表面上的平稳与安定是靠不住的。大城市知识分子的思想活动仍处于半秘密状态，报刊依然不谈政治以逃避检查制度，然而，它至少向读者传播了西方物质世界及其科学进步的一般情况，这种倾向从根本上动摇了当局反西方的蒙昧主义，重新研究突厥语言和突厥历史，在文学中反对阿拉伯主义以及愤慨于少数民族的骚乱，这一切都是新生的突厥民族主义曙光的曲折反映，它最后必将推翻奥托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1897年的希土战争为突厥民族的爱国情绪大爆发提供了机会。“我是突厥人，我的宗教和我的民族是神圣的”，诗人穆罕默德·埃明（尤达库尔）写道。在这里，“突厥人”是个自豪的口号，虽然这个词在传统上是奥托曼上层分子专指无知者或农民的。人们对于奥托曼疆界之外尤其是居住在俄国的突厥人以及对于亚洲——蒙古人重新感到兴趣，又加强了对突厥的注意和研究。推崇亚洲——蒙古人这段历史的列昂·卡翁的著作被翻译出版，他的早期著作甚至在哈密德控制的报刊上连载。但是，突厥民族主义浪潮的真正兴起尚待时日，它当时还不成气候，哈密德统治并无坐卧不安之感。

1904年，一位俄国出生的土耳其人阿克蒂拉在开罗的一家杂志发表文章，指出作为一种统一力量，坦泽马特和哈密德初期的奥托曼主义或哈密德当前的泛伊斯兰主义也许还不及突厥主义更有效果。但没有什么人赞同他的看法。

伊斯坦布尔和重要省城依然有人阅读青年土耳其党人批评哈密德统治的报纸，这些报纸是从欧洲偷运进来的，这件事才更有迫切的重要性。凯末尔和其他老一代新奥托曼党人的禁书也在人们中间传阅，还有人背诵他们的诗句。此外，出现了反对哈密德统治的知识分子所写的新诗。这些新诗自然不能出版，人们传阅手抄本，产生了一股秘密的激情。最著名的一首诗叫做《雾》，作者是西方出生的人道主义伦理学家特弗菲克·菲克雷特。这首诗描述黑沉沉的夜幕笼罩着哈密德统治的伊斯坦布尔。菲克雷特的另一首诗“陈旧的历史”，进一步抨击古老伊斯兰国家的暴政，倡导对理性和真理修理想主义的探索。对于不满现状的人来说，他的这种呼吁是震撼人心的。

当知识分子继续在帝国范围内激昂不已时，流放的青年土耳其党人突然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动力。阿布杜尔哈密德苏丹的姻兄、马赫默德帕夏和两个儿子在1899年底逃亡到了巴黎，他赞同里萨的看法，还写了一封强烈谴责苏丹的公开信。他的儿子萨巴哈定三子于1902年在巴黎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奥托曼自由派大会”，吸引了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库尔德人、希腊人和切克西人的代表。大会虽号召恢复1876年宪法，奥托曼臣民应一律平等，奥托曼的领土完整应予以维持，但也暴露了与会者的

不同观点。萨巴哈定和里萨此后即分道扬镳。当里萨越发土耳其化时，比较国际化的萨巴哈定却逐渐觉得必须学习社会科学，相信盎格鲁—萨克逊政治上非中央集权和个人创造性的优点。1907年以前，两人各走各的路。

与此同时，尤其在1906年及继后年代，帝国内部出现了反对哈米德统治的新组织，有些组织设在伊斯坦布尔本城，一个在大马士革（凯末尔即属于该组织），大部分设在仍受奥托曼统治的巴尔干领土。马其顿是这类反抗组织的发源地，萨洛尼卡成了反抗运动的中心。阿布杜尔哈米德在那儿的统治要比在首都脆弱得多，检查制度也无多大效果，此外，萨洛尼卡容易接触欧洲思想，那儿有个共济会支部，城里的犹太人可以提供资助和交通方便。

最重要的是，萨洛尼卡是陆军第三军的基地，很多军官参加了秘密组织。这些军官毕业于西方式的军校，他们不仅抱怨政府不如期发放军饷，而且对马其顿和保加利亚游击活动的增加使大国采用宪兵队（由欧洲人充任军官）的方式进行干涉，极为不满。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威胁，会进一步削弱奥托曼的控制。爱国主义和不满苏丹的情绪两者结合起来，1906年终于在萨洛尼卡成立了“奥托曼自由委员会”。创始人之一泰拉特贝伊出生于埃德尔内的贫民家庭，曾在联合犹太人学校学习法语，后升任萨洛尼卡邮电局首席书记。萨洛尼卡和巴黎虽在1907年就有联系，并在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名义下，一起通过了一个新章程，但两地的协调很是松散。两处组织曾同意恢复宪法，里萨虽很勉强，但还是接受了萨洛尼卡纲领，即在必要时用武力推翻阿布杜尔哈米德——而不

是推翻王朝。1907 年底，在巴黎召开了奥托曼自由派第二次大会，但对帝国的事变进程没有直接影响。巴黎的知识分子被马其顿的实践家远远地抛在后面。到 1908 年，团结与进步委员会宣称，它在马其顿至少有 15000 名成员。

起作用的是陆军军官的背叛，虽不可否认外部事变创造了有利条件。除青年土耳其党人从巴黎、日内瓦和开罗偷运过来的宣传品外，这时还发生了其他各种事件，鼓舞着反叛者采取行动。这些事件是：1905 年日本打败俄国，这似乎可证明一个西方化的亚洲民族即便遭到欧洲列强的反对，照样可以获得胜利；1906 年伊朗宪政运动的胜利，1908 年英王和沙皇的雷维尔会谈，它预示大国将进一步干涉，以镇压马其顿再度发生的骚动。

陆军内部的不满确实触发了 1908 年的起义。1906 年和 1907 年，陆军一些部队曾因军饷拖欠不放，发生过兵变。次年，阿布杜尔哈米德的特务察觉到萨洛尼卡正酝酿一次更大的政治阴谋，可他们显然低估了它的规模和程度。从 1908 年的 6 月底和 7 月初起，因政府进行的一系列调查在马其顿陆军部队激起了一阵同时发生但互不相关的叛乱。恩维尔少校和尼亚兹少校助理公然反抗当局，开了小差。西姆斯帕夏将军被遣前来弹压兵变。他在马纳斯特尔电报局向伊斯坦布尔拍完镇压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进展报告电文后，步出大门时，当众被人开枪打死。杀人犯是个穿制服的军官。陆军第三军的部队当即要求恢复宪法，马纳斯特尔军事学院院长终于在 7 月 23 日出来讲话，强烈要求恢复宪法。同日，马其顿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领导人电请阿布杜尔哈米德苏丹恢复 1876

年宪法。苏丹此番受到了在陆军军官领导下发动政治叛乱的直接威胁。此类事件在奥托曼历史上自非罕见，但目前领导这场叛乱的，是相当一大批毕业于西方式军校的中层军官，这却是头一回。

斟酌再三，阿布杜尔哈密德决定恢复立宪政府以保持他的王位。7月24日，伊斯坦布尔各报刊出了举行议会选举的官方通知，全文统共三行，没有标题。首都市民大都对马其顿事件一无所闻，看了这项通知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直到第二天报纸发表欢庆宪法恢复的文章，人们才明白过来。洪水于是冲决了大堤，造反变成了革命。欣喜若狂的群众涌上街头，穆斯林教士热烈拥抱希腊和亚美尼亚的神甫，到处贴满了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标语口号：“自由、正义、平等、博爱”。正义是伊斯兰和奥托曼政府最古老的传统。平等与博爱坦泽马特时代的奥托曼主义里已得到了反映。自由意味着议会对专制君主的监督，但也许不至于止，在某些省城，它尤指不受基督教国家干涉的自由，有着浓重的伊斯兰主义和排外主义的色彩。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来说，自由有时等于放纵：小孩子可以任意打碎窗玻璃，大人可拒交税金。革命的真正含义，人们还不清楚。但是，这个时候的苏丹不仅保住了王位，还颇得人心。7月26日，他终于在耶尔泽德王宫前接见群众，说了几句“共同和解”的诺言便急忙离开，不然，局面就会弄得非常难堪，因为有人希望苏丹卫队开枪射击聚在王宫庭院中的群众。废黜阿布杜尔哈密德的想法当时只得撇在一边，因为群众对苏丹——哈里发的崇敬已深深扎根于普通士兵心中，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军官亦无法控制他

们。

最初，革命似乎为奥托曼帝国写下了光辉篇章。从表面上看，街道上的乞丐和狗群不见了，新的公共工程项目上马了，如在金角湾建造一座新桥。少数上层社会的妇女摘下了面纱，可不久舆论又迫使她们重新戴上。最令人嫌恶的宫廷奸党或逃或被监禁。苏丹被迫颁布大赦令，取消了特务制度和新闻检查；报刊、图书和漫画犹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多年来过着压抑沉重地下生活的人们，仿佛见到了白昼的光明。1908年整个秋季，流亡者纷纷归来，其中有戴着黑纱出席其父重新安葬仪式的萨巴哈定王子，接踵而来的还有里萨。马其顿军官不那么招摇，不过，诸如恩维尔贝伊和尼亚兹贝伊等少数人还是以备受欢迎的英雄姿态出现在人群之中。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一些人们留在萨洛尼卡，不出头露面，它的中央机构仍不公开，但团结与进步委员会正巩固本身组织并试图影响军队和即将到来的选举，下一步的行动方向犹待决定。革命后不久，上演了三出戏，足以代表当时整个思潮。一出是凯末尔歌颂奥托曼爱国主义的《瓦坦（家园）》。一出叫做《土耳其的觉醒》，它歌颂流亡者特别是萨巴哈定，该剧放眼世界，思想比较开阔。另一出由陆军第三军军官卡津姆创作，它讴歌奥托曼黄金时代、伊斯兰教和陆军军官尤其是恩维尔。

但是，新生命篇章的希望受到两个突如其来事件的冲击。1908年10月5日，藩属保加利亚宣布包括东鲁梅利亚在内的完全独立，这就使它控制了通向欧洲铁路的重要地区。次日，奥匈帝国悍然正式并吞了自1878年即被它占领的波斯尼

亚和黑塞哥维那两个省。以维护帝国尤其是巴尔干为目标的马其顿军官，希望接替阿布杜尔哈密德君主专制统治、比较自由开明的立宪政府能够采取更有力措施。但他们的目标和希望都落了空。经过一系列有欧洲列强参加的外交谈判，奥托曼帝国根本没有得到什么补偿。土耳其可以使用的唯一压力是所谓自愿贸易抵制，这对奥地利颇起作用，因为奥地利是向土耳其市场出口红色土耳其帽的生产国。运用贸易抵制总算使奥托曼和奥地利做了一笔它所能做到的最佳交易，即永远放弃这两个地区以换取奥地利的一些财政补偿。在协定中，奥地利和保加利亚承认苏丹是这些被脱离的行省中穆斯林的哈里发，奥地利还答应取消它在奥托曼享有的治外法权。拥戴哈里发和取消治外法权这种丢车保帅的手法后来再次为青年土耳其党人使用。

虽有这些冲击，1877年宪法代表会议创建的选举制度仍于1908年秋开始执行。选民选出选举人，选举人再按每省5万男性公民选出一名议员。选举中出现过一些摩擦和被控有舞弊行为，但每次选举之后，大都举行庆祝活动，欢呼自由。人群高举投票箱，赛似藏有摩西十诫刻石的约柜。选举结果，议会由帝国一切阶层的代表合理组成。大部分议员不是得到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支持便是与该委员会有关，虽然团结与进步委员会本身仍没有露面而且也没有宣布它是个政党。12月17日，阿布杜尔哈密德出席开幕仪式，宣布议会开会，他端坐在金交椅上听别人宣读他的讲话稿。他的反对派，流放了20年的里萨被选为议长。革命至少在外表上意味着议会对君主专制的限制，并恢复了自1878年后被中断了的向立宪政

府方向前进的势头。

然而，1909 年头几个月的事变进程使人们不得不怀疑上述这些设想能否实现。自由派反对团结与进步委员会在政府中占统治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并赢得了一些议员的支持。而普通士兵和神学院的学生却听信流言，说新当局不信宗教，触犯了伊斯兰教法，他们因此而采取的行动在那个时候是件非同小可的事。士兵们对西方式军校毕业的军官集团继续控制他们表示不满。他们要行伍出身的人来充当军官。1909 年 4 月 13 日，这类盲目的不满情绪促使普通士兵爆发了一场骚动，但军官都没有卷入。士兵闯入议会，赶走了团结与进步委员会控制的政府，接管了首都。但这场骚动在政治上很是无知。阿布杜尔哈米德虽被谴责为反革命的豢养者，这时却过高估计了这些无知士兵的力量，在骚动发生后立即予以支持，忠于新统治当局的部队很快就开始行动，来扑灭这场骚乱。正如交通革命产生了电报，而团结与进步委员会正是利用电报这个工具在 1908 年 7 月取得了胜利，那么，这一次交通工具也将被用来对付这场保守的暴力行动。谢夫凯特帕夏将军率领军队从萨洛尼卡开赴伊斯坦布尔——这回是乘火车赶来的。4 月 21 日，经过几番战斗，重新控制了首都。这场宗教性的骚动在内地也有所发生。在阿达纳和东叙利亚，发生了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的冲突。4 月 13 日以后的数天内，亚美尼亚人死亡数以千计，土耳其人葬身的也不计其数。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统治一旦恢复之后，立即为这些不幸事件作出司法的和财政的补偿。

但一个大问题是阿布杜尔哈米德能否继续留任苏丹。萨

洛尼卡援军开来时，是否有推翻阿布杜尔哈密德之意，一开始并不明确，因为援军的目标只是为了拯救宪法。但团结与进步委员会后来转而反对苏丹。议会恢复后，即开始辩论废黜苏丹的问题，但同样有重要意义的，是干脆以国家的名义还是从伊斯兰教长处取得一项伊斯兰宗教法庭的判决书来废黜他。为了尊重宗教舆论，决定采用后者。“国家”只派出一个由4名代表——其中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各一名——组成的议会代表团，向苏丹宣读议会的决定。阿布杜尔哈密德被流放到萨洛尼卡。1876年，一场由政界人物和军官领导的政变使他登基接位；1909年，同样的方式使他跌下苏丹宝座。可是，他的登基和下台却有个强烈的对照：统治之初，他宣布议会开会，随后解散了它，统治之末，他再宣布议会开会，随后议会驱逐了他。

阿布杜尔哈密德的弟弟梅赫默德五世接位为苏丹。梅赫默德在登基大典上宣布，他将恪守伊斯兰教法、宪法和挑他上台的“国家意志”。显然，革命乃至帝国或许都得到了拯救，而人民主权正处于转机之中。

第七章

从帝国到共和 (1909—1923)

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有两个目的：抑制阿布杜尔哈米德的专制统治和维护奥托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到了1918年，当青年土耳其党人时代在一片失败的吵闹声中结束时，事实证明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统治和苏丹同样的专制，帝国也就此崩溃。因此，从直接意义上说，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统治失败了。但就长远意义而言，它不仅为土耳其的将来传下了前几百年所取得的进步，并且还在制度、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方面作出了贡献，而这一切又为现代土耳其民族和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这一成就来之不易。有三个问题尤为紧迫，其中没有一个得到最后解决，而且，一个也回避不了。这三个问题是：第一，在青年土耳其党人废黜阿布杜尔哈米德之后，奥托曼政府的性质是什么？第二，怎样规定和识别帝国的公民？有无统一的概念？第三，怎样规定领土完整？怎样使边界稳定下来？这三个问题盘根错节，相互关连。

1909年以后，奥托曼政府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梅赫默德五世君临而不统治。是年8月通过的一项宪法修正案，严格限制了苏丹解散议会的权力。现在由辅政大将军委任各部大臣，内阁集体为它的行动向议会负责，完全按西欧常规行事。由于新闻事业的再度兴旺，政治讨论亦越来越活跃。议会中出现了政党、集团和联盟，1908年到1913年期间，共有13个这类组织。虽说议员由代议制选举产生，这并不等于实现了完全的人民主权。因为，1908年革命实际上只是上层分子的内部政变，并非群众运动。1909年发生的一场企图反对革命的骚动被成功地镇压下去，这一事实就是个明证。作为政治权力源泉的王宫消除了，但中央政府仍操在一部分上层分子手里，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统治年代里，这部分人有所扩大，他们是军官、官僚和某些专业人员。一部分穆斯林教士在议会中拥有议席，他们很有影响，但从不占统治地位。

青年土耳其党人统治期间，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影响日益扩大。它在1909年虽还不是一个政党，它的5名成员包括干练的内政大臣泰拉特贝伊和很有才华的财政大臣查维德贝伊都是内阁成员。团结与进步委员会还在外省扩大影响。1912年前，团结与进步委员会每年在萨洛尼卡举行秘密代表大会，马其顿被希腊夺走后，会议便移至伊斯坦布尔。在议会中，团结与进步委员会如1908年革命那样，吸引了多数议员，但仍有一些人因政策上意见不一或个性不合而与之分道扬镳。由于内部的分化，团结与进步委员会并非铁板一块，议会则更加四分五裂。尽管如此，团结与进步委员会仍设法确保它对政府实行更为独裁主义的控制，因为在1919年它曾受到一次

暂时的挫折，当时议会中的自由同盟曾反对过它。1912年4月，在团结与进步委员会高压下举行的“大棒”选举，只准一小部分反对派议员重新回到议会。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另一次挫折，发生在这以后的几个月里。一部分持不同政见的陆军军官迫使议会接受一个新的“大内阁”，它将限制军队在政界的影响。但团结与进步委员会很快就采取了报复：1913年1月，1908年革命的英雄之一恩维尔发动了一场新的政变，他的对手国防大臣被害身亡。此后，团结与进步委员会控制了政府，它本身也变成了一个政党，在各省城镇建立了组织。整个潮流于是再次趋向独裁而不是民主。同时，陆军军官之留在政界已是一清二楚的了。

议会与政党在这几年所辩论的，大都与帝国的结构是中央集权还是联邦化这个问题有关。团结与进步委员会赞成前者，自由派倾向后者。这些辩论反映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即明确政治实体的性质和确定帝国臣民的公民身份。当时有三种思想：一种主张以奥托曼主义作为团结帝国的思想力量；第二种强调伊斯兰主义；第三种强调突厥语言和文化。这三种思想并非一直泾渭分明。而且，每一种思想的倡导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混杂着强调迅速西化，主张在保持传统文化的同时逐步西化或反对西化。尽管如此，这三种思想毕竟各不相同，足以展开辩论。

奥托曼主义是坦泽马特时代的遗产，它主张奥托曼帝国所有臣民不论宗教和语言都一律平等，都应忠于一个共同政府。它是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的信条，在宪法恢复之后的一片亲如兄弟的欢腾声中，得到了暂时的加强。待到

1909年，提倡奥托曼主义的势头开始消失。巴尔干尤其是希腊的基督教徒发现它不及民族主义更有吸引力，不久，阿尔巴尼亚和阿拉伯的穆斯林也有同样的看法。除了非土耳其人的分裂主义倾向，使奥托曼主义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统治使得奥托曼主义变形为突厥主义。1908年的一项法律禁止按民族或种族组织政治团体，这可解释为实际行动中的纯奥托曼主义。但随后强调的突厥化甚至强迫阿尔巴尼亚人使用阿拉伯文字和突厥语言，这就引起了人们反抗突厥化的奥托曼主义。

强调伊斯兰主义的人，在政治上表现为反对迅速西化以及提倡泛伊斯兰主义学说，这是坦泽马特时代后期的遗产，更是阿布杜尔哈密德二世时代的思想。难道不是伊斯兰这条纽带将土耳其人、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库尔德人以及其他人的信仰凝聚在哈里发之下？伊斯兰是不能分裂为民族的，虔诚的伊斯兰主义者争辩道。这个学说也许对帝国以外的穆斯林有点吸引力，他们希望奥托曼能支持它们反对欧洲列强，但在帝国内部，这个学说无法回避严酷的现实，即阿拉伯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族觉悟正在增长。秘密的阿拉伯团体纷纷成立，目标是本地文化和政治自治甚至独立。阿尔巴尼亚人整日想的，是发动一系列反抗伊斯坦布尔控制的起义。此外，还存在着萌芽状态的库尔德民族主义。

如果奥托曼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在国家的性质和居民的确认方面都提不出可行的定义，如果每种思想的主要障碍都来自基督教徒和非土耳其穆斯林日益增长的分裂主义或民族主义感情，土耳其人能使用的，合乎逻辑地就是强调突厥主义

作为振奋精神的集合点。突厥爱国主义虽不是完整的民族主义，在坦泽马特年代的新奥托曼主义作家的著作里就已经埋下了它的一些种子。在阿尔杜尔哈密德二世统治年代，尤其在希土战争期间，这些种子还发了芽。但土耳其人的真正民族主义发展较慢，他们毕竟是使用多种语言的帝国的统治者，他们创立了这个帝国当然要维持它。绝大多数土耳其人把自己看成是当地的居民，是穆斯林或奥托曼苏丹的臣民，而不首先是土耳其人。然而，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期间，突厥意识逐步发展成为泛突厥主义。

泛突厥主义主张“土兰族”，即所有讲究厥语的民族在文化上也许还有在政治上的统一。这些民族的大部分居住在俄国的高加索和中亚，伏尔加的喀山以及克里米亚。受过良好教育的俄国突厥作家如加斯普林斯基（加斯比拉利）和优素福·阿克基拉都提倡泛突厥主义。有些人来到奥托曼帝国定居工作，他们和奥托曼突厥人为《突厥故国》杂志撰文修稿。该刊物以增进“所有突厥人的共同理想”为目标，于1911年在伊斯坦布尔创办。第二年成立了“突厥之家”这一新组织，以加强成人教育和传播突厥文化。然而，泛土兰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毕竟不合实际，不管偶尔有人很热情地予以支持，也不管恩维尔帕夏是最有名望的支持者之一。强调文化的泛土兰主义所起的主要作用是在奥托曼突厥人中间增强了突厥意识。突厥主义而非泛土兰主义便注定要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

在报刊上大力提倡突厥主义的是突厥主义的哲学家古卡尔普。他出生于东部边境地区迪亚尔巴克尔，大部分时间在

那儿受教育，90年代曾是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成员，后从伊斯坦布尔流亡外地，1909年成了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中央委员。原先他很拥护奥托曼主义，但后来跟随时代步伐，倾向于突厥化。对他来说，泛土兰主义不及突厥主义有吸引力，后者能更好地为奥托曼帝国的突厥人服务。他认为，1909年的政治革命应该由社会和文化革命加以补充，以便每个人都意识到他们属于突厥民族。在他看来，伊斯兰乃突厥主义之必需，但应该现代化。欧洲科学以及欧洲一般“文明”，都可以而且应该引入借鉴。但伊斯兰和欧洲舶来品都要和突厥文化相结合，因为突厥文化发源于人民的根本民族精神，它必须冲破奥托曼文化附加物的藩篱，使真正突厥主义得以发扬光大。他的口号是：突厥化、伊斯兰化和现代化，但最根本的，是突厥化。“突厥”一词便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用来称呼他们自己。他们以历史上突厥族使用过的名字为婴儿取名，而不取惯用的阿拉伯渊源的穆斯林名字。

青年土耳其党人必须正视的第三个问题即维护帝国的领土完整和边界不受侵犯，深深地影响着古卡尔普思想的变化，影响着更为广泛的关于民族主义的想法，同时影响着帝国政府的变化。除阿尔巴尼亚人的多次起义以及差不多所有少数民族——犹太人例外——都有反抗和不满外，青年土耳其党人还面临着两次外部的冲击。1911年，意大利借口扩大它在北非的殖民地，入侵奥托曼的黎波里省（今利比亚境内）。在意大利即将在的黎波里战争中取胜的时刻，巴尔干国家同盟乘机进攻奥托曼在欧洲的领土。1912年10月爆发的巴尔干战争，对土耳其人是场大灾难，到该年年底，除几个据点外，

土耳其人统统被赶光。当保加利亚部队即将兵临伊斯坦布尔城下之时，双方达成了一项停战安排。恩维尔和泰拉特在1913年1月发动了政变，他们怀疑“大内阁”会求和。政变政府重新开战，失败更其惨重。根据1913年5月30日的伦敦条约，奥托曼政府得割让一切除保护海峡的狭长地带和伊斯坦布尔本城外的欧洲领土给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克里特岛也失去了。后来战胜国因分赃不匀重开冲突，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总算收回了埃德尔纳，但土耳其人仍是大输家。况且，的黎波里和包括罗得岛在内的多德卡尼斯群岛早已输给了意大利。

巴尔干战争使得奥托曼帝国的团结与进步委员会政府很快成了真正的独裁统治。1913年辅政犬将军谢夫凯特的被刺，虽真相不明，却被恩维尔及其同伙用来作为借口，放逐了一批反对派。到1914年，政府事实上由三巨头执掌：国防大臣恩维尔、内政大臣泰拉特和海军大臣詹玛尔。辅政犬将军哈里姆却没有多大权力。查维德仍是重要的财政大臣，但政治上没有什么份量。巴尔干战争还断送了作为实际行动学说的奥托曼主义。巴尔干民族反抗了奥托曼主义，而奥托曼的失败意味着目前这个帝国已不是多种语言的国家。相反，由于战争中的感受一致，对大批从巴尔干逃亡到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难民的同情以及帝国之日趋同一种族，土耳其爱国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情绪都有所增强。这场失败使土耳其人重新估计他们的地位。“我们的失败意味着土耳其现代化的最后胜利”，一家伊斯坦布尔的报纸这样写道。

事实上，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统治年代里，西化的进程加

速了，它既出于自觉也是形势使然。这不仅反映在政党、议会方式以及报纸越来越有重要的作用，还反映在财政、海关、灌溉、法律以及当然还有陆海军的训练和组织部门大量聘用欧洲顾问。公共工程得到扶植，巴格达铁路公司发展很快，兴办了许多新学校。世俗主义增强了，伊斯兰教可以公开讨论，1913年一家报纸居然敢于刊登一系列文章，议论先知穆罕默德是否患有癫痫病。变化的第一个标志是准许妇女参加公共生活，虽只迈出了一小步。妇女有更多受教育的机会，有些人在巴尔干战争中卸下面纱在医院当护士，报纸开始讨论妇女的权利。出现了少数女权主义者，有两位妇女在1913年编辑出版了《妇女世界》杂志，其中一位编辑独自驾驶一架陆军飞机向人群投掷宣传女权主义的材料。

奥托曼帝国在黎波里和巴尔干战争失败后倘有时间整顿和巩固，它的发展将如何，这已不可能知道。但和平时间非常短暂，因为帝国不久就卷入1914—1918年的大战。1914年8月初冲突爆发时，奥托曼帝国能否在德、奥轴心国和法、英、俄协约国之间严守中立，此事虽不能肯定但有可能。很多土耳其人支持英法，而宿敌俄国却与两个西方民主国家结盟，这就使土耳其很难和协约国结成交战同盟。绝大部分土耳其人和内阁多数成员在1914年是赞成中立的，可事实是，在战争结束之前，奥托曼帝国却站在德国一边作战。事实证明，这一抉择于帝国是致命的，其结果对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则至关重大。

抉择主要由恩维尔作出。恩维尔帕夏是个亲德派，但他同时毫无疑问地认为，与强大的德国站在一起反对俄国最能

实现奥托曼的利益。他老是梦想有朝一日泛突厥主义能扩展到俄国的高加索。1914年7月，他向德国提出结盟。这出乎德国人的意料，但德王凯塞赞成利用这个机会。于是在8月2日签订了秘密的反俄同盟。条约签订前，只有哈里姆和泰拉特知道这件事，前者的立场至少是根本反对与整个协约国交战。土耳其方面大概渗有错估形势的因素，因为同英法交战既非本愿也不得人心。反俄同盟条约保密了将近三个月，这在期间，奥托曼部队进行了动员并封锁了海峡。但奥托曼参加大战的准备远未完成，内阁在实际交战问题上依然意见分歧。随着西欧战线静寂，德国加强了压力要奥托曼采取军事行动。由于德国的两艘军舰“戈本号”和“布雷斯累号”逃进海峡，连人带舰假装卖给了奥托曼，并入帝国舰队，这就使得德国更有口实。恩维尔帕夏最后下令由德国海军上将逊洪领导的土耳其舰队在黑海进攻俄国。1914年10月29日，军舰炮轰俄国港口。包括查维特贝伊在内的几位内阁成员得知这次袭击后辞了职，但木已成舟。11月初，俄、法、英随即向土耳其正式宣战。

这场战争要土耳其在六条战线上作战，但没有几次战役是进攻性的——两次袭击苏伊士运河，但并无效果；一次主动向俄境高加索前线挺进。以后几年，有几个土耳其师借到罗马尼亚和加利西亚等欧洲战场作战。不过土耳其进行的绝大部分战役都是为了保卫奥托曼领土。除马其顿战役规模较小外，持续战斗的重大战役发生有抵抗英军入侵的伊拉克和阿拉伯，最后是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对付阿拉伯人造反和英军入侵。外高加索和东安纳托利亚战役则为了抵御入侵的俄

军。土耳其士兵一如既往，都英勇善战。一小部分土耳其军队在不同的时期里受德国人指挥，但绝大部分由土耳其人统率。德国从未左右过奥托曼的政策，尽管有人这样断言。通过与德国谈判交易，伊斯坦布尔政府能获得相当多的黄金和其他财政援助，还有防务方面的专门人才以及战争物资。恩维尔帕夏作为苏丹的副总司令对战争的整个进程握有最后控制权。战争中最灾难性的一次行动，是 1914—1915 年仲冬在东安纳托利亚战线由恩维尔亲自挂帅向俄国人发起的进攻。此次战役使“泛土兰族”军队的伤亡超过 4/5。恩维尔返回伊斯坦布尔，从此再不指挥作战。这一次失败似是泛突厥思想中所有实用价值的告终，虽在 1917 年俄国革命后，它曾有过短暂的东山再起。

战争还沉重打击了泛伊斯兰主义，加上它早年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时代所遭到的挫折，这下就永远不能作为复兴奥托曼国家的一种思想意识了。梅赫默德五世苏丹为了获得阿尔巴尼亚人对帝国的忠诚，在巴尔干战争前，曾打算以哈里发的身份出席萨洛尼卡和科索沃的宗教典礼，但这一打算落了空。1912 年与意大利的和约以及 1913 年与希腊、保加利亚的和约曾重申最早在 18 世纪提出过的思想，即苏丹是他领土外所有穆斯林的哈里发；可是一旦奥托曼在割让出去的领地上丧失一切政治控制权之后，这类重申无非是冷酷的安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政府尤其是恩维尔强调泛伊斯兰战略。这个战略发展到用它来威胁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穆斯林殖民地的安全，并鼓动的黎波里游击队起来反对意大利新主子。可是，进攻苏伊士运河的“伊斯兰战略”两次都失

败了。奥托曼帝国内部阿拉伯人在战时的态度使泛伊斯兰主义遭到了最严重的打击。苏丹哈里发经穆斯林教长（乌拉姆）的同意，在 1914 年宣布对协约国进行圣战。阿拉伯人却不响应。相反，1916 年在麦加的沙里夫胡赛因的领导下，一大部分阿拉伯人却和英国缔结了秘密协定，以求战后在奥托曼阿拉伯土地之外，建立新的独立国家，并开始进攻土耳其统治者。伊斯兰团结是个幻想，泛伊斯兰主义是毫无价值的政治学说。

土耳其在战争中所进行的最成功战役是 1915 年 2 月开始的保卫海峡之战。当时，英帝国和法国部队向海峡发动了攻击。英国海军最初发起的冲锋无法打通达达尼尔海峡。血战是在联军登上加利波利半岛后开始的。一支在德国将军利曼·冯·桑德斯指挥下的土耳其军队，坚守高地，抵抗近 50 万联军的进攻，当时还是土耳其陆军上校的凯末尔，就在这场战役中赢得了能干和不知疲劳的师长的美名。联军退守滩头阵地，最后不得不承认失败，于 1916 年 1 月撤退。海峡和伊斯坦布尔至少暂时得救。

在加利波利战斗方酣，俄军向东安纳托利亚挺进之际，团结与进步委员会政府开始驱逐亚美尼亚人。除西部城市外，在安纳托利亚绝大部分的亚美尼亚人被扫地出门，赶往叙利亚东北部或伊拉克。这是一场战争引起的大悲剧。大屠杀、饥饿、瘟疫以及在原始条件下长途跋涉的困顿劳累使 50 万以上的人丧生。内政大臣泰拉特把这场驱逐说成是军事上需要，因为有部分亚美尼亚人和俄国人勾结，此外，还得防止土耳其东部战线背后发生叛乱的危险。德国军官当时抗议驱逐亚美

尼亚人，但不很有力，因为他们得支持战时同盟有条不紊地发挥作用。亚美尼亚人遭难的原因无疑是这两个方面：他们大部分居住在安纳托利亚，和土耳其人、库尔德人杂居在土耳其故土上；和巴尔干基督教少数民族最近交往的经验使土耳其人对叛乱和丢失领土极为敏感。

到 1917 年，尽管土耳其初期曾在巴格达附近的库特打了胜仗，英国和英—阿联军的进攻，迫使奥托曼军队从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战场后撤。不过，这些失败因沙俄的崩溃暂时得到补偿，土耳其人于是在 1918 年重新获得了他们在 1878 年输给俄国人的—切，并长驱直入至外高加索。土军的一支部队甚至抵达里海的巴库。但这些战果并不意味着胜利，因为奥托曼的盟国——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都已疲惫不堪，正提出停战。此外，人多势众的英军已把土耳其军队推回到叙利亚北部和伊拉克。1918 年 10 月 30 日，奥托曼政府签订了摩德洛司停战协定。停战条件规定向协约国开放海峡及其要塞，土耳其军队除边防军和国内保安部队外一律复员，准予协约国占领帝国任何战略要地——如果协约国的安全受到威胁的话。1918 年 11 月 13 日，联军战舰驶入伊斯坦布尔港口，抛锚停泊。

战争后果之深远，不只是军事上的失败，比如，团结与进步委员会政府被摧毁了。1917 年出任辅政大将军的泰拉特帕夏在停战前两周挂印辞官，和恩维尔及詹玛尔帕夏一起搭德国邮船溜出了伊斯坦布尔。不过，有相当一部分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组织和地方领导人仍留在国内，可以在今后帮助建立民族抵抗运动。此外，土耳其民族主义在战时得到了发展。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兰主义虽无效果，突厥主义仍起作用。1916年颁布的语言法规定商号的帐册和来往函件必须使用土耳其文。这种“经济突厥主义”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即努力培养更多的土耳其人从事商业和技术性工作。战争开始时，奥托曼政府曾单方面取消了令人恼火的治外法权，并软硬兼施地迫使德国同意这一维护国家立权的做法。取得战争胜利的协约国拒绝承认取消这一特权，但土耳其人要求获得经济上和法律上完整主权的愿望仍十分强烈。战时，土耳其人在很多方面获得了德国指挥下的独立作战权利，这些行动的最后结果必然是朝土耳其人的土耳其这个方向发展。此外，战争使阿拉伯各省从土耳其控制下挣脱出来，只剩下安纳托利亚这个更为单一民族的领土和一块伊斯坦布尔周围的欧洲飞地，这就使得土耳其人的土耳其这个目标更容易达到。它仍然是奥托曼国家，但更多地被称为土耳其，以后成立的共和国便把它定为正式名称。

和一切战争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社会和文化的变革。自1908年青土耳其党人执政以来，上层统治集团开始扩大，新加入的有军官、文官和专业人员，他们之中很多人在1918年战败后对土耳其复兴作出了贡献。随着受教育的机会增加，战争年代上层统治集团的扩大过程仍继续进行。妇女甚至比巴尔干战争时期可更自由地上学，在办公室和商店找到工作。伊斯坦布尔的许多妇女在1918年就摘掉了面纱，用透明的纱布权充象征。少数大胆的妇女，居然戴了帽子，剪短了头发。法律对一夫多妻制作了些限制，男女共同参加的社交集会也开始出现。伊斯兰教虽仍有巨大影响，各式各样

世俗主义的势头同时增强了，如宗教法庭由世俗的司法部管理，经院受教育部领导。这两个例子证明伊斯兰教长的权力消退了。

然而在战败时刻，这些变化的迹象抵销不了土耳其的一片凄凉。战时破坏和通货膨胀使经济受到严重创伤。许多人在战争中死亡，在 1911 年以后几乎还继续如此。联军控制了色雷斯、海峡和伊斯坦布尔，奥托曼政府有义务与占领军合作。1919 年，英国接着是法国军队占领了靠近叙利亚和伊拉克边线的安纳托利亚中南部几个地方，意大利在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登陆，希腊人占领了伊兹米尔。

与此同时，胜利者协约国正在巴黎以及此后从 1919 年到 1920 年春的一系列会议上讨论要土耳其人履行的和平条款。协约国之间达成的秘密协定规定了瓜分奥托曼帝国的方案，瓜分的不仅是它的阿拉伯地区，还包括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府透露并拒绝了这些协定，土耳其人当然对协定内容非常警惕。协约国曾答应俄国控制伊斯坦布尔、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两个海峡以及安纳托利亚的东北部。现在，这些都不能付诸实现了。但瓜分安纳托利亚和外国控制海峡的威胁依然存在。1918 年继任苏丹王位的梅赫默德六世瓦希德丁苏丹政府的代表在巴黎受到呵斥，被撇在一边。一部分土耳其领导人觉得，他们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学说以及威尔逊十四点计划中的第十二点，即“奥托曼帝国的土耳其部分的主权应该得到保障”。但乞求威尔逊学说同样没有效果。

1920 年 5 月，奥托曼政府收到了和约。根据和约条款，奥

托曼帝国的所有欧洲领土除伊斯坦布尔周围一小块外都得被割掉，海峡应非军事化，向一切船只开放，并始终置于一个国际委员会控制之下。伊兹米尔交与希腊管理。独立的亚美尼亚和获得自治的库尔德斯坦出现在东安纳托利亚。留给土耳其人的安纳托利亚其余部分，根据另一协定指定作为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势力范围。恢复治外法权，土耳其财政由协约国控制。梅赫默德六世苏丹政府不得不于 1920 年 8 月 10 日在塞夫勒签署了这份判处土耳其死刑的和约。

和约签署期间，这个政府几乎不能行使任何权力，也代表不了土耳其人民。在摩德洛司停战协定和塞夫勒和约签订的两年左右时间里，出现了一个民族主义运动，它成功地开展了反对瓜分和外国控制的斗争。在停战协定签订前后的阴沉和沮丧的日子里，在色雷斯和安纳托利亚一些人在当地发起反抗，成立“护权协会”。民族主义运动由此开始。到了 1919 年和 1920 年，这个运动的组织更为严密，协调更加有方，后成为安纳托利亚政府。到 1923 年，这个政府驱走了入侵者，推翻了塞夫勒和约，要求缔结新的和约，结束了苏丹制度并宣布它自己为共和国，这个运动还找到了自己的领袖，他就是凯末尔。

在签订摩德洛司停战协定期间，凯末尔是指挥叙利亚战线的将军。他戎马一生。1908 年革命前，他还是个年轻军官，曾卷入青年土耳其党人运动。他也是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成员，然自 1909 年以后即不与该组织来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胜仗打得最多的奥托曼战地司令官，他在加利波利战场赢得的名声在其他战场再度得到。1917 年，他预见德国

即将失败，并懂得应该憎恨德国人在他国内的影响。而且，他和恩维尔帕夏关系不好。因此，当他在 1918 年脱颖而出时，他和团结与进步委员会及其军阀，和德国人都毫无关系，非常清白。他曾经有力地反对过这些人的轻率进攻战略，相反，他强调守卫国土和保存土耳其人力的必要性。可以这样公正地说，如果他早先不是一个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他的现实主义和独立意识也足以使他成为这样的人物。后来他曾公开强烈反对把奥托曼帝国加给土耳其人的重担当作牺牲品。他同时反对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认为这是幻想，他相信西方化，私下认为伊斯兰教在许多方面阻碍着进步，他的思想比他的同事更加世俗化。

37 岁的凯末尔在停战后回到了伊斯坦布尔，探索复兴国家和政府的途径。他于 1918 年 11 月 13 日抵达首都，那天，协约国军舰开入博斯普鲁斯海峡。“他们既然来了，他们就得离开”，他说的这句话值得注意。然而在首都，他那旺盛的精力却无处发挥。靠着政府里几位朋友的帮忙，凯末尔被任为东安纳托利亚军监，并要他在安纳托利亚故土帮助组织一支民族抵抗军对付入侵者。1919 年 5 月 19 日，他到达萨姆松。在今天的土耳其，5 月 19 日是青年和平运动日，全国举行庆祝以纪念长达 4 年的民族拯救斗争的开始。凯末尔就从这儿开始组织军事抵抗，加强土耳其人之间的政治团结，并为民族主义运动取得了外交上的承认。

促使民族主义运动大大高涨起来的，是凯末尔到达萨姆松前 4 天发生的希腊部队在伊兹米尔鲁莽登陆事件。根据停战条款，伊兹米尔应由联军占领，但这是表面文章，实际是

希腊部队登陆。这预兆着希腊将越过爱琴海进行扩张，以实现它那重建拜占庭帝国的长期美梦。在伊兹米尔地区，居住着许多希腊东正教徒，但他们并非多数。土耳其人立即被激怒得跳了起来，决心反击那个被他们视为臣民、在奥托曼早期年代被征服了的民族的进攻。而且，希腊人登陆似乎意味着敌人完成了对土耳其故土的包围圈：联军在海峡，希腊人在伊兹米尔，意大利、英国和法国占领南方，东边还有一个新宣布独立的亚美尼亚。

凯米尔可以得到人力，但得把他们锻炼成一支队伍。民族主义游击队在好几个地区进行战斗。东线仍有一个土耳其军，由卡拉贝基尔将军指挥。这位将军给了凯末尔很有价值的帮助。其他军官如饶夫（奥尔拜）和阿里·符亚德（詹别索伊）都这样做。整个安纳托利亚的文官通过电报与民族主义运动联结在一起。伊斯坦布尔政府很快就明显地感到，凯末尔是按他自己意志办事的，于是，下令罢免他。在他拒令之后，又下了逮捕令，可卡拉贝基尔拒不执行。相反，凯末尔却自动辞职，以便腾出手来自由行动。

在某程度上，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领导是通过两次代表大会形成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7月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埃尔佐鲁姆举行，只有东部各省代表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于同年9月在瑟瓦斯召开，出席的代表更为广泛，代表了整个土耳其。每次代表大会都设立代表委员会，凯末尔每次都当选为主席。瑟瓦斯代表大会设立的安纳托利亚和鲁梅利亚护权协会代表委员会，开始在安纳托利亚行使事实上政府的职权。两次代表大会制订的纲领以后成了国民公约的基

础：在停战线内一切奥托曼——穆斯林的领土完整；完全独立；无法律和财政的奴役。当时的民族主义运动具有强烈的伊斯兰主义色彩——土耳其主义尚未成为大众思潮。苏丹——哈里发仍被承认为合法的统治者。凯末尔虽早怀有建立世俗共和国之志，此刻却非常谨慎，以免伤害人民忠于苏丹——哈里发的感情，但同时宣布苏丹应置于协约国控制之下。在伊斯坦布尔政府能真正代表国家之前，代表委员会应起国民意志代言人的作用。

由于各地通过电报对伊斯坦布尔政府施加压力，伊斯坦布尔政府便要求在1919年秋举行新的议会选举。选举结果，民族主义者占了大多数。绝大部分议员聚集在安纳托利亚，凯末尔总部亦迁来此地。他们在去伊斯坦布尔出席议会之前，重申了国民公约。凯末尔感到去伊斯坦布尔有危险，便留在安卡拉。新议会在1920年1月准时通过了国民公约。这就成了谈判的最低限度要求，只有在满足这些要求之后，凯末尔党人才能接受和平。西方列强开始警觉，当民族主义部队将法军逐出马拉什后，他们更加警惕起来。1920年3月16日，英国在伊斯坦布尔加紧了军事控制。英军逮捕了四十余名议员，把他们流放到马耳他。英军这次占领和上次希腊军队登陆一样，对民族主义者来说，是一次新的推动和促进，使民族主义运动转化为一个有效的独立政府。议员们可逃的，都逃到了安卡拉。1920年4月23日——这也是目前土耳其的国庆日，叫做儿童和国家主权日，议员们在安卡拉投票建立了大国民议会政府。议会并不宣布废黜苏丹，只是声明由于苏丹是协约国的俘虏，只有他们才代表国家。第二天，穆斯塔法

· 凯末尔当选为大国民议会主席，并主持了部长会议。1921年1月的宪政法律把这一组织具体化了，法律宣布主权无条件属于国家。这个国家现在第一次被正式称为“土耳其”。

梅赫默德六世苏丹对这些民族独立运动的答复是强烈反对。他的伊斯兰教长法庭颁布了一项判决，称杀掉叛逆就是履行宗教责任。伊斯坦布尔的军事法庭缺席判决凯末尔和其他民族主义领导人死刑。非正规部队“哈里发军”被组织起来与民族主义者作战。这些行动使得安卡拉政府和伊斯坦布尔苏丹之间几乎不可能有任何和解。1920年8月，伊斯坦布尔最后签署了丧权辱国的瑟瓦斯和约，安卡拉坚决拒绝接受和约。倘使民族主义者还需要什么别的刺激物来采取决定性行动的话，那就是苏丹政府。他们现在可以自由行动了。

凯末尔及其同伴所要解决的任务特别困难。即使维持内部的一致也很不容易。凯末尔不是个独裁者，不是拥有一切权力的领袖，虽然他精力充沛，富有魅力。他要对付的，是议会内部持不同政见的个人和集团，武装部队和作为整体的民族主义运动。他得说理，争辩，哄骗和威胁。许多土耳其人在一开始献身这一事业的时候就止步不前。还有心怀不满的游击队组织需要抑制或合并，其中至少有一个组织具有强烈的共产主义倾向。武装部队的给养得靠勒索、偷盗、缴械或从国外获得。安卡拉是个落后的省城，什么也提供不了，它与外界有电报联系，有一条铁路通向伊斯坦布尔，但只有一家餐馆，没有可供安置一个政府的合适空间。临时凑合便是当时的状况。

1920年到1922年间，大国民议会政府设法冲破敌人在

它领土周围布下的包围圈。这方面的努力取得了成功，这不仅因为政府进行了武装抵抗，还因为大国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和所有大国尤其和英国不和的苏维埃俄国愿意向凯末尔党人提供战争物资和黄金。不过，和这些物资一同前来的共产党宣传却受到了抵制。凯末尔甚至组织了他自己的“官方”共产党来压低诞生不久、人数很少的土耳其共产党的地位。土耳其人和俄国人竞相争夺独立的亚美尼亚国家的领土，到1920年底，两国瓜分了亚美尼亚，这个国家即告灭亡。1921年，莫斯科和安卡拉签订友好条约，根据条约，苏联完全承认了安卡拉政府。同年，法国和意大利占领军撤出安纳托利亚南部。这两个国家对于英国反对凯末尔党人的政策已不抱幻想，并且对希腊占领安纳托利亚西部也无热情。

对安卡拉政府来说，希腊的占领是最严重的威胁。从1920年夏开始，希腊在一系列进攻中扩大了它的控制范围。这一年和第二年，希腊把土耳其军队赶了回去。1921年初，伊斯美特帕夏两次击退了希军在伊涅纽——埃斯基谢希尔稍西的一个小村——的进攻。但希军在七月再次发动了攻势，凯末尔本人便下令战略撤退，用空间换取时间，直到入侵者抵达离安卡拉只有50英里的萨卡里亚河。当大国民议会斥责凯末尔闯下大祸时，这场军事危机大有酿成政治危机之势。但凯末尔说服了议会，投票选举他为全权总司令。1921年夏采，在萨卡里亚河畔进行了三个星期的战斗，凯末尔终于击退了希腊军队。大国民议会大喜过望，授予他“战胜者”称号——即勇士和信仰的胜利者，奥托曼帝国早期几位苏丹曾获得过该称号，并以此为荣。希军接着沿新的路线挺进，凯末尔在

1922年8月26日再次发起反击。受到重创的希军从海上溃逃，指挥作战的希军将领被俘。9月9日，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胜利地进入了伊兹米尔。

可是在海峡对面的色雷斯仍驻有希军，防守海峡的是以海军为后盾的一小股英军。凯末尔部队现挺进到海峡地区，直逼英军战线。这时，双方明智地停了火并同意进行谈判：英国不再夺回已失去的地区，凯末尔维护胜利成果。根据10月11日签订的木达尼亚停战协定，协约国同意土耳其恢复对伊斯坦布尔、色雷斯和两个海峡的控制。协定还同意召开一次和会。塞夫勒和约已全部推翻，应缔结一项新的和约。

在瑞士洛桑召开和会前，协约国同时向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两个土耳其政府发出正式邀请。土耳其出现两个辩护人只会损害其在即将举行谈判中的地位。协约国的邀请促使凯末尔下决心废除苏丹制，把它和哈里发制分离开来。这一决定遭到了他的亲密同事和议员们的反对，他们之中有很多是伊斯兰教士，忠于传统制度的思想极深。在议会的一个委员会里经过数小时辩论后，凯末尔从座椅上跳了起来，大声说道：“先生们，主权和苏丹制都不能听命于学者或通过讨论和辩论由谁交与谁。主权和苏丹制是通过实力、威力和暴力取得的”。他说，国家已掌握了主权，余下的问题是怎样表述这一事实。在他的强硬态度下，委员会屈服了，议会也是这样。1922年11月1日，大国民议会宣布苏丹制自两年前英军占领伊斯坦布尔之日起即不存在。议会同时宣布，哈里发将由他们从奥托曼家系中选出。11月7日，奥托曼最后一任苏丹梅赫默德六世乘坐一辆英国救护车从王宫出逃，把他的首都

移到一艘英国军舰上。立宪王朝从此消失，虽然凯末尔的某些同事很希望它留下。长达六个世纪的奥托曼统治也从此成了历史。留下的，只有一位由大国民议会选出的、受庇护的阿布杜尔美志德哈里发，而且还没有佩刀。

因此，当洛桑会议在 1922 年 11 月召开时，土耳其的代表只有安卡拉政府一家。代表团团长是伊斯美特帕夏，为此，凯末尔把他从军事指挥的职位上换下来，出任外交部长。伊斯美特在会议上发挥了令人难以对付的顽强本领，来获得几乎是国民公约的全部要求。这个过程很长，使人头脑发胀，而伊斯美特在 1923 年 2 月初的毫不妥协态度，使谈判破裂了近两个月。他坚持新土耳其的绝对主权。他的辩论反映了土耳其对多年来身受大国干涉之害，对治外法权给予外国在财政上和司法上的特权以及对少数民族叛乱等等的强烈不满。

洛桑和约终于在 1923 年 7 月 24 日签订。根据和约，取消了治外法权。除了在财政上仍有某些负担和在关税上有所限制外，土耳其毋需再作赔偿。安纳托利亚东部不再有亚美尼亚或库尔德斯坦，西部不再有希腊区，大国的势力范围也不存在了。边界走向基本上根据土耳其人的要求划定。但有个重大的例外，即英国不向土耳其人归还摩苏尔，而且，在 1926 年土耳其应接受国联的判决，把摩苏尔交给伊拉克。伊斯肯德伦（亚历山大塔勒）周围地区哈塔伊，这也是土耳其希望得到的，仍留在叙利亚，成了一位议员说的“土耳其的阿尔萨斯——洛林”。尽管如此，和约大体上满足了土耳其在边界问题上的要求。土耳其在海峡地区的主权得到了承认，但得同意设立非军事区和监督自由通航的国际委员会。由于苏

俄要求唯有黑海国家和土耳其才能控制海峡，所以这也是一大收获。土耳其应接受俄国的帮助，但不能成为它的附庸。

与3年前塞夫勒和约相比，这回堪称大不同了。洛桑和约是在平等国家之间签订的，非强加于人。它满足了土耳其的基本要求。正因如此，在1918年的五个战败国中，土耳其是后来唯一不愿修正和约的国家，致力于国内发展而不是对外扩张。洛桑会议还以激烈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希腊和土耳其为了摆脱令人头痛的少数民族问题，达成了交换人口的协定，只有在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和在希腊占领的西色雷斯的土耳其人不在其列。此后进行的人口大规模转移，使一大批人遭受巨大苦难。人们不仅被迫离乡背井，而且往往不会讲新家园的语言。许多希腊人虽信仰希腊东正教，但只会讲土耳其语，而虽是穆斯林的土耳其人，讲希腊语却比讲土耳其语好得多。不过，人口交换在以后几年确实使土耳其和希腊两国易于建立良好的关系。

民族主义政府在军事胜利之后缔结了名副其实的和约，政局稳定，威望大振。于是迈出了另外两步——每一步都很实际。1923年10月13日正式宣布定都安卡拉。10月29日，大国民议会在穆斯塔法·凯末尔敦促下选举他为土耳其共和国首届总统。伊斯美特出任总理。每一个行动象征着进一步割断与奥托曼历史以及位于金湾角上那座世界性首都的联系。定都安纳托利亚故土的共和国开创了一个新时期：一个为土耳其人的新土耳其以及为新土耳其的新土耳其人的时期。

第八章

阿塔图克的土耳其 (1923—1938)

土耳其今天的青年人只是通过二手材料以及作为这一时代最后成果的继承人来了解凯末尔时代的，所以，他们对凯末尔时代的印象是群众运动和一个充满变革的时期，两者的结合便为土耳其指出了新方向。亲身经历过这一时期的老一代土耳其人，他们对凯末尔时代的印象是紧迫和快速：在压力下，一个变革接着一个变革，快得几乎来不及消化和吸收。这两种印象都合乎实际。在凯末尔统治下的土耳其共和国，头 15 年确实在许多方面发生了迅猛的变化。

一旦挣脱奥托曼帝国桎梏和卸下额外领土这副重担，变革便不难进行。变革之比较容易进行还因为奥托曼帝国已经培植起一种势头，它的方向是西化的制度思想和习俗。奥托曼和伊斯兰文明古老仪式、信仰和习惯当然没有消失。有的有所修改，更多的则面临能否存在下去的挑战。新老竞赛共存，造成人们的精神痛苦。同时，共和国继承了一批干练的官吏、军官和专业人员，这些人掌握着共和国的命运，此外

还有诸如议会政治的经验，完整的地方政府制度，刚开始的新教育制度和西方式法律等等。与今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土耳其从未丧失过独立，因而有统治和决策的传统和经验可资借鉴。共和国还大大得益于奥托曼帝国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没有战争这段历史。而更重要的，是共和国有凯末尔这样一位精力充沛的领袖。

凯末尔在共和国头 4 年里主要把精力集中在管理好政府，巩固他对政府的控制，实施他那世俗主义的理想，使土耳其更接受西方文明。这一过程在共和国尚未诞生的时候就开始了。1923 年春，当凯末尔巩固他在国内统治和加强伊斯美特在洛桑会议上讨价还价地位的时候，他建立了人民共和党。它是土耳其唯一的政党。最初，党内有着各种极为不同的观点，它还是成了实现凯末尔改革计划的工具。党内会议的讨论往往比议员在大国民议会的辩论更加自由。土耳其共和国之所以在 1923 年 10 月 29 日正式宣告成立，也是凯末尔一手造成的，他有意挑起一次内阁危机，促使共和国在这个时候成立。其结果不仅是正式承认主权属于人民，还选举凯末尔为共和国总统，增强了他的权力。

共和国的潜在对手即哈里发制度依然存在。阿布杜尔美志德哈里发很可能是共和国变革、世俗化和一切反凯末尔力量的汇合点。阿布杜尔美志德也许试图把他在宗教上所起的作用扩大到政治上，因为他一度谈到“哈里发宝藏”。1923 年底左右，两名印度穆斯林阿加汗和阿里写信给伊斯美特帕夏，提出哈里发制度应建立在得到全世界穆斯林尊敬的基础上。当伊斯坦布尔各报发表该信之后，凯末尔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他先和几位主要支持者达成了协议，然后说服几家大报的编辑，发动一场反对哈里发制度的宣传运动，说它是进步的一大障碍。1924年3月3日，大国民议会据此投票通过废黜阿布杜尔美志德，取缔哈里发制度，驱逐奥托曼王室所有成员出境。

这一世俗行动的胜利，使传统的伊斯兰教的政府形象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大大减退。此外，还伴之以其他方面的改革：取消了伊斯兰教长制，经院和密克坦布斯（古兰经学校）等宗教学校亦在取缔之列，一切学校都置于公共指导部领导之下。凯末尔撤消了管理宗教基金的慈善基金机构，改由直属总理的机构来行使它的职能。不久，关闭了所有宗教法庭，由世俗法庭在适当案例中行使宗教法律。这些行动并没有使政教彻底分离，但政府对宗教机构的控制大为加强，这些机构的重要性虽未统统消失，但却大大降低了。

1924年4月20日，大国民议会通过的新宪法总结了1923年到1924年政治改革的基本要点，新宪法宣布土耳其为共和国，首都在安卡拉，伊斯兰教是国教。主权属于国家——当时是男子国家，因只有男子有选举权，由议会行使，议会拥有立法权和行政权。议会选举政府首脑——总理。总理挑选人员组成内阁。在一党制的国家里，这意味着凯末尔控制党和议会，他那总统的权力是无限的。

但这不等于没有人反对凯末尔。废除哈里发制和接踵而来的对伊斯兰教机构的打击，使许多土耳其人感到震惊。其中的一些人和很有西方思想的人对集中在凯末尔手中的无限权力很是关切。他们之中有民族主义运动初期凯末尔最坚定

的支持者，如饶夫（奥尔拜）、符亚德（詹别索伊）、卡拉贝基尔和阿德南博士（阿迪弗尔），他们都诚心诚意地反对一人统治。当凯末尔坚持被选为议员的军官必须在军事和政治生涯两者之间选择一个的时候，符亚德和卡拉贝基尔便辞去了军事指挥官的职务。作为议员，他们退出了凯末尔的人民共和党，并在1924年末，建立了共和进步党，强调民主、分权和公民自由。凯末尔当时作了些让步，稍稍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免去了意见最多、最为这些人反对的伊斯美特帕夏的总理职务，改由温和折衷的费西贝伊出任。

1925年2月爆发了一场以不同方式反对凯末尔的斗争。东安纳托利亚的库尔德地区发生叛乱，它由伊斯兰教托钵僧纳卡希班迪派首领、帕卢的赛义德酋长率领，受到库尔德民族主义甚至主要是伊斯兰宗教感情的鼓动。土耳其陆军完全有力量平息这场叛乱，但伊斯美特和人民党其他领导人要求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以便把反对派的活动统统镇压下去。在凯末尔的支持下，伊斯美特再度出任总理，议会通过了手段激烈的维持秩序法，授予政府以特别的权力。特别法庭统称独立法庭，谴责了赛义德酋长并吊死了四十多名叛乱者，封闭了东部所有伊斯兰教托钵僧的寺院。政府运用新授予的权力，乘机查禁了伊斯坦布尔一部分报纸，逮捕记者，并镇压进步党。一党统治得以确立。

在政府仍拥有特别法律所授予的广泛权力的情况下，凯末尔主动采取了其他世俗化和西方化措施。其中最激烈也最值得称道的，是禁止戴土耳其礼拜帽。这种圆柱形的红色帽子在一个世纪前作为马赫默德二世的一个改革措施引入了土

耳其，即便奥托曼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也戴这种帽子，现在却成了伊斯兰——奥托曼帝国的象征。武装部队当时曾引进各色帽子，甚至新式的鸭舌帽，但土耳其人大都戴礼拜帽。凯末尔对此发动了批评，一些报刊也附和着大谈“文化人的头饰”和“头上顶着的玩意儿”。起先，“帽”这个词是回避的，因为它含有异教徒的习俗。但自1925年8月凯末尔手持巴拿马礼帽出现在安纳托利亚某些比较保守的城镇之后，“帽”这个词便开始被运用了。为了同凯末尔保持一致，政府赶快向官员们发放了欧洲式大礼帽。凯末尔说，文明人必须戴文明帽。11月，作出了戴土耳其礼拜帽是犯法有罪的规定。这在土耳其东部引起了一系列的骚动和游行，但都被独立法庭严厉地镇压下去，有些人还被处以绞刑。为了使人们与传统方式诀别，凯末尔显然使用了猛药。欧洲式大礼帽不单单是象征，它还是一种心理上的工具，也许戴上了西方帽子会按西方思想进行思考。于是，欧洲式的新旧帽子突然在土耳其找到了市场。流行款式之一是鸭舌帽，它可以把帽沿转过来戴，以便在祷告时把前额贴在地上而头上依然有东西遮盖着。

在猛烈攻击礼拜帽的同时，凯末尔还抨击了一般的宗教仪式，他谴责托钵僧团体和托钵僧寺院，反对朝拜有名望圣者的墓地。他颁布法律，解散托钵僧团体，关闭了寺院和墓地。只是对妇女戴的面纱，似不拟用立法手段予以解决。凯末尔不主张戴面纱，但让“时尚”这个法则来决定它的命运，这个过程在城市当然要比在地方城镇和乡村快得多。这一切都是在1925年干的。到1926年初，西方通行的阳历取代了穆斯林历及其变种——奥托曼历。

不怎么激烈但更有深远意义的，是新民法典的颁布。坦译马特和青年土耳其党人时期，曾引进过一部分西方法律。这一过程到了 1926 年突然达到高潮，那就是采用了瑞士民法、意大利模式的刑法以及以德国、意大利为榜样的商法。虽说奥托曼的刑法和商法深受西方前驱者的影响，它的民法即便在 19 世纪经过部分修订，仍是伊斯兰教法。现在，必须挖掉这个宗教基础。

1925 年秋，凯末尔在安卡拉一次新法学教员就职典礼上，无情地批评旧法律及其施行者是进步的一大障碍。他说：“这个国家把这一原则认作是不可改变的真理，那就是只有在当代文明中，才可以找到在普遍国际斗争领域里创造活力和力量的知识和手段。总之，先生们，国家……尊重这一原则，并把它当作国家存亡的条件，那就是国家的行政管理和所有法律都应该只受物质需要……和世俗管理意识的鼓舞”。新民法典把这一观点实际运用在与生活最密切的范畴即家庭关系上。根据这一法典，宣布一夫多妻为非法，婚姻成了公民契约（虽可加上宗教仪式，倘愿意的话）。伊斯兰教法关于丈夫在取得离婚时有特别有利条件的规定，已扫荡殆尽。这一重大措施不仅在男女之间而且还在教派之间保证了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这等于敲响了教区制的丧钟。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居住在土耳其的希腊人统统放弃了他们遗留下来的氏族部落法律，所有土耳其公民都服从一个民法。

这类措施当然取消不了穆斯林的反抗，事实上，土耳其各个地方并非全部遵守这个民法。同时，反对凯末尔个人的事仍有发生。1926 年，当凯末尔视察伊兹米尔时，破获了一

件阴谋杀害他的案件。组织者是个前议员，此人曾反对废除哈里发制，并抚养了一个对凯末尔怀有仇恨的人。独立法庭再次行动起来，把一大批凯末尔政治上的反对派押上法庭。其中15人被处绞刑。包括团结与进步委员会时期的财政大臣查维德。其他人如饶夫（奥尔拜）被判流放。进步党一些领导人经审讯后无罪开释，他们都是颇受尊敬的军人，如符亚德（詹别索伊）和卡拉贝基尔。反对派被打得一蹶不振，凯末尔及其政党的统治再次确立。这是凯末尔唯一进行的一次清洗，他不像二次大战期间的欧洲独裁者那样滥杀乱捕。

到1926年，世俗化的主要措施均已付诸实施，其他的则贯彻得稍缓一些。1928年从宪法中删去了伊斯兰教为土耳其国教的条文。以后年代所采取的一些文化改革措施都有世俗化的内涵。1935年，把1924年新创立的周休息日从星期五改为欧洲式的星期六中午到星期一早上。实际上，这一改革主要是为了方便商业和政府部门，是个西方化而不只是世俗化的措施，因为星期五并非穆斯林传统的休息日，而是市场日和在清真寺布道的集会日。

转折点发生在1927年。这一年有三件事可以作为这一转折点的象征。第一件是凯末尔访问伊斯坦布尔，这是他1919年突然出走去安纳托利亚组织民族主义运动以来第一次进入这座国际都市。这次访问标志着他流放时期的结束。凯末尔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现在更有安全感了。维持秩序法虽延长到1929年，但独立法庭已经取消。第二件是凯末尔在10月15日到20日人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长达6天的长篇讲话。在这次讲话中，凯末尔引用大量文件，总结了自1919

年5月19日他离船登上萨姆松以来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史。这篇讲话为他的观点作了辩护,有力地抨击了反对他的人。讲话展望未来,在结尾时,他告诫土耳其青年应维护民族独立和土耳其共和国。这段话从此为无数土耳其学生背诵记忆,并铭刻在公共建筑物和纪念碑上。

1927年发生的第三件事是共和国第一次进行全面人口普查,10月28日在贝尔格莱德的一位统计专家指导下进行。除在必需的服务部门外,所有的人那天都应留在家里听候计点。普查结果,全国人口为13,648,270人,这个数字虽非绝对正确,足以作为可靠数字使用。普查还暴露了共和国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事农业的有400万成年人,在各类工矿企业工作的,只有30万人,从事商业工作的约257,000人。7岁以上有10,483,529人,识字的只占30%左右。7至12岁儿童共1,346,000人,13岁至17岁共2,076,000人,在这两大类中,只有1/7的人在各类学校上学。面临的任务是扫除文盲,加强教育和发展工业。在这三个方面,都已开始采取了措施,不过,在1928年后,推进得更加有力。在1928年到1933年间,特别注意教育和文化改革。

1928年的字母改革和帽子改革一样惊人,但更有深远影响。今天许多土耳其人虽仍偏爱阿拉伯字母,因为它便于速记,但不适应土耳其语的发音,而且,阿拉伯字母只是语音,没有别的意义。由于阿拉伯字母得依据在词汇中的位置而不断变化,学起来很困难。一切自坦译马特时代以来有关把阿拉伯字母改为拉丁字母的提议都因保守派的反对而束之高阁。现在,凯末尔要强令加快步伐了。首先在1928年引进了

“国际”字母以替代穆斯林地区通用的阿拉伯字母。凯末尔接着敦促委员会设计出一种现代语音字母来完成这项任务。9月9日，凯末尔在伊斯坦布尔公园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宣布了字母改革。然后，凯末尔去全国旅行，亲自在教室中和广场上教人们学习新字母。

全国所有识字的人都上学校，成人和儿童一样必须学习书写新字。11月3日，议会宣布了公众有义务在来年使用新字母的规定。这是再一次用猛药治沉痾。由于新字母较旧字母更易学习，识字的人增加了。经过改换铅字的初期阶段困难之后，报刊图书有了很大的发展，发行量亦因印刷成本降低而大为增加。字母改革和帽子法律同样有心理上的作用，它从另一个侧面割断了与过去、与伊斯兰东方的联系，推动这个国家朝着未来和西方化的方向前进。按新字母，受教育的儿童无法阅读他们祖先撰写的文章，除非把它翻译或改排成新字母。今在，恐怕很难找到一个50岁以下能阅读阿拉伯字母的土耳其人了。同时，新字母叫“土耳其文”而不算“拉丁文”，这也是改革中的民族主义因素。

教育和文化方面继后的措施同样显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不同程度的西方化和世俗化的目标。为了提倡一种更为深刻的民族本体感，使新土耳其人能自觉地意识到并献身给新土耳其，1932年，凯末尔同时在语言学和历史学领域实行改革。在他倡议下，成立了土耳其语言学会并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简化和纯化语言的途径。凯末尔本人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人说，他们感到凯末尔的目光几乎要穿透他们。从此之后，阿拉伯和波斯语法形式受到了批判和抑制，受过教育

的奥托曼人——以及在很多情况下还有普通的土耳其人所长期使用的阿拉伯和波斯词汇，都由其他词汇替代，它们全选自古老的突厥课本或其他突厥语族的语言。新词汇则根据突厥语根或西方词汇造成。

过了两三年后，人们认识到语言纯化过程走得太快，于是决定煞住某些极端做法。如当时有一种所谓“日光——语言理论”，认为在土耳其语中出现通用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是“合法”的。因为这一理论宣称，一切语言在词源上都可追溯到人类发出的第一个声音，即第一个仰望太阳的人——一位土耳其人所发出的声音。因此，土耳其人是一切语言之父。然而支持者寥寥无几，该理论不久即烟消云散。于是，语言的简化和土耳其化过程便逐步缓缓开展，持续至今。新词汇有的为人们普遍接受，有的只在官方场合通行，与过去相比，现代语言是大大简化和土耳其化了。今天的土耳其学生倘不借助注释，根本就读不懂凯末尔 1927 年的 6 天演讲词，由此可见语言改革变化之大。

凯末尔还促成了土耳其历史学会的建立。学会第一次会议在 1932 年举行。和语言学会议相同，这次会议提出了一个用以显示土耳其人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历史主题”。新出版的历史课本把土耳其人说成是最早的文明民族，是包括近东苏美尔和赫梯在内的世界上许多文明的祖先。在奥托曼时代，历史课讲授的，大部分是奥托曼王朝和早期伊斯兰哈里发的历史。坦泽马特时代后期，一部分作家和学者曾开始注意研究土耳其历史，只有到了凯末尔时代，土耳其的过去方成为历史研究的中心。官方修订的四卷本土土耳其

史的头两卷全部叙述前奥托曼时期，根据规定，这部书为一切教员必备，所有中学生必读。如同语言改革帮助人们树立了土耳其感和民族本体感，史学改革还有着另外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表明在伊斯兰教进入土耳其之前，早已有了土耳其文化；伊斯兰教并非土耳其土生土长，是从外面输入的；二是强调土耳其人和安纳托利亚故土的联系，此种关系在赫梯人时期就已建立。史学理论中一些非常极端的看法，后来逐一被摒弃，但目的还是达到了。迄今为止，在历史研究中，对于前伊斯兰的土耳其史、赫梯古代史以及前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的兴趣仍经久不衰。

在日益众多的学校里，越来越多的土耳其青年人学习土耳其新字母，学习纯洁化了的土耳其语言，学习以土耳其为中心的历史。文盲逐渐减少，虽然消除文盲还早得很。在1923年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各类大中小学校的在校学生约358,000人。1927年人口普查时，这个数字有了很大的增加，为497,000人，1923年为624,000人，此后逐年增加。1933年，小学生开始背诵第一句为“我是土耳其人，诚实而勤劳”的语录，立誓保护弱者，尊重老人，追求进步，服务国家。学问、道德和民族主义携手共进。

1932年起，在各大城市和主要城镇建立了人民宫，这主要是大众教育的场所，以补充正规教育之不足。人民宫是合并了团结与进步委员会时期的“土耳其发祥地”和人民共和党之后发展而成的。它作为社区中心组织活动：提倡演讲，举办展览会，上演剧本，放映电影以及开展体育活动等等。人民宫重视为西化上层分子推广土耳其各方面的民间文化，向

其他人介绍各种西方文化。人民宫和学校都成了推进民族主义的工具，在人民党的指导下，它还有个政治目的，即反复灌输共和国的革命原则——不光是民族主义和土耳其人的团结一致，还有世俗主义和西化。

30年代采取的其他措施，同样为了深化这些原则。西方式的油画、雕塑、诗歌、散文、戏剧、建筑和音乐脱颖而出，展览会、评奖活动、学术团体和艺术院校纷纷对此予以鼓励和扶植。1935年起，在公共音乐会上和电台广播中，有一段时期几乎听不到东方音乐。1934年后，政府强令推行大致在1869年引进的米制度量衡，以取代混乱不堪的传统度量单位。1453年以来一直是清真寺的阿雅。索菲亚拜占庭大教堂，在1933年变成了世俗的博物馆，从此中世纪清真寺便开始拆除。1932年，寺院尖塔上响起了用土耳其语，而不是用阿拉伯语宣布祈祷开始的声音，这是对伊斯兰传统一次更大打击。安纳托利亚城市虽有人示威反对这一改革，第二年它却成了明文规定。1932年初，古兰经首次被译成土耳其文，在礼拜时公开宣读。在第二次这样的场合里，清真寺的一万礼拜者听到了30位朗诵者用土耳其语歌唱古兰经篇章，还有3万人在寺外从扬声器中聆听这歌声。这些变革当然使保守分子大摇其头。

1934年通过了一项人人必须有姓氏的法律，传统再次受到冲击。在此之前，只有少数土耳其名门望族才有自己的姓。大多数人有名无姓，他们或在名前加上一个年轻时取用的名或父亲的名作为姓，也有以出生地点或体格特征作为姓氏的。“布拉萨的艾哈迈德”或“跷脚马茂德”这类名字在村落里也

许够用，但在上学、纳税和人口普查时，在一个识字的人越来越多、流动性越来越大的社会里，这些艾哈迈德和马茂德所造成的混乱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在 1934 年，人们便纷纷寻找姓氏。议会授予凯末尔的姓氏是阿塔图克，意即土耳其之父。伊斯美特把他战胜希腊人的那个村庄作为姓，成了伊斯美特·伊涅纽。与此同时，旧式称号诸如贝伊、爱芬吉、哈尼姆（夫人）等亦被取消，代之以比较简单的贝（先生）或贝扬（太太或小姐），放在名字的前面。但习惯并不那么容易改掉。人们在正式场合都按新规定使用姓名。但即便今天，人们仍称马茂德·布卢特贝伊为马茂德贝伊，而不根据规定称他为贝·布卢特，而且，他的亲朋好友很可能不知道马茂德的姓，也不知道怎样在电话簿上查到这位布卢特先生。

文化和教育方面的种种改革影响到妇女的地位。有更多的妇女上学，找到职业，参与公共生活。阿塔图克大力提倡欧洲人在社交场合尊重妇女的美德，以致许多妇女在第一次被邀请在公共场合参加男女共舞时大为窘困。社会解放在大城市发展极快，几年前还不可想象的健美比赛也被引了进来。1932 年初，土耳其一位美人被选为欧洲小姐。小镇和乡村妇女戴面纱往往出于心理上的要求，有时纯是为面纱而戴面纱。但无可否认，歧视妇女和男女有别的传统是在减退。1933 年，有 13 名妇女当上了法官。1934 年，大城市男女有别的最后一个遗迹——电车上为妇女专设的头两排座椅不见了。此类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是选举权分两个阶段扩及妇女。1930 年，妇女有权选举市议员，1934 年，妇女有权选举国民议员，她们同时可以成为候选人。在 1935 年的选举中，有 17 名妇女

当选为议员。

在集中力量改革教育、文化和社会的时候，还进行了组织反对党的实验。1930年8月，费西（奥克雅尔）建立了自由共和党。费西曾是凯末尔早年支持者之一，最近出任驻法大使。这一行动是在和凯末尔商量后采取的，也许出自凯末尔本人授意。但凯末尔的最终意图并不明确，是真要建立两党制，还是把反对党仅仅当作早已弥漫全国的牢骚和不满的出气筒。有些怨言是经济方面的，如对政府的经济限制、沉重的税收负担和私人企业不能自由发展的不满。连续数年的歉收和第一次受到国际性大危机的影响，更使这些满腹牢骚的人振振有词。另一个抱怨是政治方面的，如反对独裁，反对一党制等。人们的不满情绪常常集中指向总理伊斯美特和人民党，虽然凯末尔本人已不如早期年代那么受拥护，而且还有点脱离群众。这场实验把妖魔从瓶里放了出来。当费西在9月开始竞选活动时，他受到了出乎意料的热情支持，支持者不仅有自由派，还有宗教反动分子和其他不满政府的人。这时，发生了几起反对人民党机关的叛乱。凯末尔显然被伊斯美特和党内其他人说服，认为这场实验过于危险。费西贝伊不愿领导一场会变成攻击战胜者凯末尔个人的运动，他在11月解散了自由共和党。

宗教反动分子的反抗究竟激烈到什么程度，这在下一个月就看得一清二楚了。在伊兹米尔附近的梅内门，一个托钵僧团体的领袖向群众慷慨陈词，谴责反宗教的共和统治。有一个名叫库比莱的青年官员站出来抗议，当场被击倒在地，砍去了头。军队立即奉命前来维持秩序。在自由党的实验和库

比莱事件之后，人民党加强了对政府和选举的控制。这些事件一方面暴露了土耳其社会深刻的分化，一方面有助于推动凯末尔党人努力加强国家的团结，上述语言和历史方面的改革以及建立人民宫讲授共和革命原则都有这个含义。人们对经济状况的普遍不满也促使人民党更加注意发展土耳其经济。

1931年4月，凯末尔提出了6条被称为有根本意义的原则。1937年人民党代表大会很快通过了这6条原则并写入共和国宪法。人民党的党徽把这些原则标为“六个箭头”，即共和主义、民族主义、人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改良主义。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含义在先前的行动和当局颁发的宣言中已很清楚。可称为革命的改良主义同样非常清楚，那就是迅速、持续而非暴力的变革。人民主义就是：人民主权以及不分阶级只有一个人民这样一个著名概念。新增加的箭头是国家主义，意指政府积极指导和参与经济活动。30年代期间，尤其是1933年以后，这个国家主义纲领吸收了大量钱财和思想。

在共和国成立头10年内，改善国家经济的工作做得并不多，虽然1923年初凯末尔曾在伊兹米尔发起召开过一次经济会议，并在会上和会后大讲了一通必须发展经济之类的话。犁头比刀更神圣，是他反复阐述的主题之一。对农产品征收沉重的什一税——实际税率是12.5%——已被取消，但凯末尔、伊斯美德及其人民党大都关心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不大注意经济。20年代在经济上的重要考虑是防止出现帝国时代外国经济占统治地位和划分势力范围那种局面。由于失去

了非穆斯林少数民族,许多有用的经商本领也就随之而失,但在政治上,这不值得惋惜。自给自足的理论决定新生的共和国不向外国资本告贷,相反,通过政府机构和开发银行管理的微薄资金——土耳其缺乏资本——尽快赎回外国控制的铁路,发展农业、矿业和工业。

一俟关税的完全控制权在 1929 年重新获得之后,海关立即高筑壁垒来保护民族工业。但此类工业水平很低。绝大多数人口仍从事农业。根据 1927 年的普查数字,雇佣工人在 100 人以上的工业公司只有 155 家。大部分农业很是落后,仍使用以往传统的原始耕作法。同一普查统计了全国的“农业工具”,几乎全是老式木犁。迟至 1937 年,土耳其全国拥有的拖拉机还不到 1000 台。

世界性的萧条迫使土耳其紧缩进口和加强货币管制。1930 年创造的贸易收支顺差是通过大幅度削减必要进口实现的,因为出口也下降了。政府发动了“购买土耳其货”运动,斋月的清真寺和寺院的尖塔灯火通明,不时传来“浪费犯罪,请买国货”的歌声。正是这一困难的处境——群众的不满使这个问题显得分外紧迫——才使凯末尔抬出了国家主义。这个纲领具有国家社会主义因素,但它不是社会主义或教条式的,它是实用主义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它最好的名称。1933 年制订了五年计划,次年付诸实施。政府接受了一笔俄国贷款和技术援助,在开塞利兴建了一家纺织制造厂。1937 年 4 月 1 日,伊涅纽为卡拉比克一家大钢铁厂安放了奠基石。轻工业如造纸、玻璃、水泥厂等——兴办起来。即使在其他进口物资大幅度削减的情况下,机器和金属仍继续进

口。这一切，都是国家主义最明显的结果。农业进展很是缓慢，1934年才首次出现小麦有一点儿出口盈余。

毫无疑问，30年代国家主义口号使土耳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开发措施往往效率很低，官僚主义的规章制度使它徘徊不前，而且没有专门机构注意分配和推销所生产的物品。私营企业得不到扶植，独立商人的不满将是今后一个重要因素。不重视农业也将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当这些因素后来有机会发挥作用时，农民这个多数派就会在政治上表示他们反对生活水平继续降低。不过，国家对于潜在于工业劳工中的问题是认识到的。1936年颁布的劳工法禁止罢工，规定了仲裁程序，创立了政府为老人、工伤、事故、失业和死亡保险的制度。

1923年到1938年的整个共和时代里，土耳其得到了历届统治王朝所没有得到的一大好处，即真正的和平对外关系，没有大国干涉的苦恼。“国内和平，对外和平”，是阿塔图克的训示。与1923年战争结束以来关系自然紧张的希腊，经1930年签订条约后，关系有了改善，达到了友好相处的地步。与伊朗的长期边界纠纷最后获得了解决。与俄国的友好关系在1925年签订的条约中得到了加强，该条约后经重修并予延长。安卡拉与莫斯科签订这一条约部分的原因，是以此表示它对摩苏尔交给英国托管的伊拉克一事的不满，但到了1936年，安卡拉已承认这一局面，与英国的关系从此改善了。1932年，土耳其成为国联的成员国。

30年代希特勒的兴起和墨索里尼的侵略势头使阿塔图克感到不安，他采取了几方面的措施来维护现状和改善土耳

其的地位。一是1934年土耳其、希腊、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签订维护现状的巴尔干公约。这是防止保加利亚修改洛桑和约、扩大版图的有力保障。1937年把土耳其和伊拉克、伊朗和阿富汗连结起来的萨阿达巴德互不侵略条约内容一般，不那么有力。由于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土耳其希望欧洲大国允许它在海峡地区设防的要求更为迫切，因为洛桑和约规定海峡地区非军事化。1931年召开的蒙特勒会议同意了土耳其这个要求。与意大利咄咄逼人的好战态度相比，土耳其通过和平谈判式大大提高了它的国际地位。土耳其的良好对外关系，是阿塔图克坚决抵制一切重振奥托曼主义、泛土耳其和泛伊斯兰扩张主义活动的结果。土耳其是在自己民族疆界之内的民族国家，不是主张重修边界的民族国家。

但在摩苏尔问题解决后，这一原则却有个例外。土耳其人要求得到位于伊斯肯德伦（阿历山大塔勒）和安培基亚（安蒂奥克）周围的哈塔伊地区。这个地区曾作为叙利亚托管地给了法国。许多土耳其人生活在那里。1936年，法国采取步骤给予叙利亚——包括哈塔伊——独立。阿塔图克为此非常忧虑。1937年，通过与法国谈判，他把哈塔伊设计为一个单独的地区，只在经济和对外政策方面与叙利亚有联系。土耳其语应成为哈塔伊的官方语言。但该地发生了骚乱，迫使阿塔图克采取威胁手段。1938年，法国同意法土两国军队可监督该地的选举。在土耳其的压力下，1938年的哈塔伊共和国有一个土耳其人占多数的议会。

哈塔伊的谈判实际上是阿塔图克最后一次公务活动。1937年下半年起，他已身患重病。1938年夏，他去博斯普鲁

斯比较凉爽的海滩疗养，但病情未见好转。1938年11月10日，阿塔图克死于一度是苏丹避暑胜地巴切宫。逝世消息传出之后，举国哀悼，悲痛万分。农民高举火炬照亮着通向安卡拉的道路，专车载着曾是土耳其人民之父的伟人灵柩经安纳托利亚缓缓驶回土耳其心脏地带。

一本最近出版的阿塔图克传，书名叫《非凡的人》。世间确无人如他。“非凡”还有孤独、孑然一身的意思。他也确是这样的人。阿塔图克一心一意以充沛的精力进行了各方面的改革，而人们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至少不可能以如此迅猛的速度在土耳其贯彻进行。受到他反抗和统治的，既有他的反对派也有他的支持后。毫无疑问，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坚强的土耳其共和国和土耳其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已成事实，对外关系有了良好的基础，西方化迈出了大步，世俗化也有同样的进步，虽然这一切能否永存还是个问题。伊斯兰政治受到坚决反对，伊斯兰教多少已土耳其化，但许多人觉得宗教和道德的价值在世俗化过程中已经丧失或大为削弱。经济进展极小，国家主义在这方面的作用犹待证明。共和人民党的学说虽认为土耳其没有经济上的阶级区别，但阶级分化的因素却存在着。

阿塔图克领导的生活各个方面的革命，无疑在城市最有效果。奥托曼帝国遗留下来的差距，即受教育的城市和未受教育的乡村之间的差距并没有缩小，事实上，在某些方面还有所扩大。因为，西方式的改革还刚刚开始触及农村，速度很是缓慢并断继续续。改革不可能在地方上全部得到贯彻，效率低下的政府官僚机构在这里倒是起了安全阀的作用，因为，

倘使一切改革措施都像帽子法那样强加推行，农民很可能起来造反。受阿塔图克革命影响最深的，是城市上层，他们是军官、政府官员和男女专业人员。阿塔图克征服了他们，改造了他们，使他们重振精神。现在，这些人将因阿塔图克的逝世而出来充任领导，处理阿塔图克刚刚开始面临的问题。

第九章

阿塔图克以后的土耳其

土耳其共和国当时幸好有个阿塔图克的自然继承人。他就是伊斯美特·伊涅纽。伊涅纽在独立战争期间曾和阿塔图克一起向希腊人作过斗争，接着又代表土耳其出席和会，同时，他曾在阿塔图克领导下担任总理职务直到 1937 年。不论在阿塔图克生命最后一年中他们两人之间曾经有过什么不同意见，大国民议会认为伊涅纽是合乎逻辑的继承人。1938 年 11 月 11 日，大国民议会一致投票选举他为总统。伊涅纽同时担任共和人民党领袖，这样，他就掌握了共和国之父曾经掌握和使用过的同一指挥机构，虽然他没有阿塔图克的个性魅力——磁石般的吸引力和急旋风似的冲动。

伊涅纽当即面临险恶的国际局势。他出任总统的时候是慕尼黑会议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希特勒的东进，酝酿着一场对巴尔干国家从而也是对土耳其的威胁。墨索里尼在地中海的侵略行径和占领阿尔巴尼亚更值得严重关切。土耳其认为，为了保护现状，明智的办法是谋求和西方国家建

立更为密切的关系。1939年5月土耳其共和国与英国发表了相互保证的声明。6月，土耳其和法国缔结了互不侵略条约。由于法国无保留地同意土耳其并吞哈塔伊这块阿塔图克渴望控制的小小领土，与法国的和解便成为可能。下了这步棋后，虽有叙利亚的抗议，与西方国家最终结盟的道路便打通了。

然而，还得考虑苏联。1939年8月23日的纳粹——苏联条约表明，苏联已背向维持现状的英法，给土耳其人出了个难题。当希特勒于9月1日进攻波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当苏联在是月下旬占领波兰东部，公开暴露了与纳粹共谋的身份之后，土耳其要谋求自身安全便更加困难了。从这时起，土耳其便夹在两大集团中间。土耳其对于他们参加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灾难记忆犹新，他们希望中立和安全，于是谋求和俄国签订一项条约。但土耳其外长的莫斯科之行毫无结果，因为越来越清楚的事实是，纳粹——苏联的主要目标就是要阻止土耳其和英法结盟。苏联的保证是不可能得到的了。失望之余，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在1939年10月19日签订了互相保卫同盟条约。根据条约，如战争扩大地中海地区，土耳其将给予援助。一条特别条款规定，土耳其没有履行与俄国作战的义务。意大利在1940年6月对法国的进攻，实际上把战争引至西地中海。但土耳其政府认为这时采取战争行动没有用处，仍试图在两大集团之间持中立的方针。

法国的迅速垮台使轴心国的胜利给土耳其人越来越深刻的印象。同时，轴心国的胜利也使土耳其人感到分外的危险，特别是1941年春墨索里尼进攻希腊大失败后，德军经南斯拉夫大举入侵希腊并占领了土耳其沿岸的爱琴海岛屿。纳粹部

队还占领了离伊斯坦布尔不远的保加利亚。在这种部分被包围的情况下，土耳其屈服于德国的压力，1941年6月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虽然同时规定土耳其与英法同盟依然有效。接着是6月22日纳粹进攻俄国之后的迅速挺进。这证明德国的压力更难抵制。1941年秋，土耳其签订了一项向德国出售铬矿的协定。铬是制造硬度很高的钢材的必需品，土耳其在签订这一协定的同时，仍履行它早期向英国出售铬的义务。安卡拉抵制了德国要求政治合作的建议，虽然那时德国人在土耳其颇为吃香，因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德国正在跟土耳其北方宿敌打仗。

1942年下半年，战局大变。随着英国在埃及阿拉曼战役获胜，俄国人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以及美军登陆法属北非，轴心国开始缓缓后撤。各有打算的三大盟国开始谋求土耳其的援助。英美希望使用土耳其空军基地。他们和土耳其政治家进行了一系列会谈，最后，在1943年12月罗斯福、邱吉尔与伊涅纽举行的开罗会议上，土耳其原则上同意为盟国提供军事设施。但土耳其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必须向他们提供足够的武器。他们当然害怕德国轰炸或入侵的报复。倘使他们被俄国人从德国铁蹄下解放出来，他们能从俄国熊怀抱中挣脱出来吗？土耳其就是这样维持了中立的地位。但关于土耳其应否参战的争论仍在继续。英美对土耳其中立立场的批评被土耳其以这一事实顶了回去。土耳其指出，盟国领导人除邱吉尔外并不真的希望土耳其放弃中立。冒纳粹入侵的风险，开辟土耳其新战场，需要盟国从其他战场运送大批武器物资，而盟国恰恰最需要把一切可以集合起来的物资用于这

些战场。他们根本没有开辟这一新战场的打算。因此，从土耳其本民族利益观点甚至从英美的利益观点来看，土耳其的政策也许是正确的。土耳其在 1945 年 2 月 23 日宣布与德国交战已是马后炮了，这是为了土耳其可以派代表出席即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组织会议。

战争深深影响着土耳其内政和经济。和战时许多国家的政府一样，土耳其政府变得更加独裁。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经济的使然和政府必要控制的结果。虽说铬矿出口价很高，许多农民赚钱，但土耳其对外贸易下降，1934 年的生活指数为 1939 年的 3 倍以上，某些商品如鞋子的价格几乎上涨了 5 倍。商人和黑市投机商往往大发其财，固定收入者则大倒其霉。虽说中立，政府的军费开支仍大得惊人。在这种形势下，再加上税收不足，政府便在 1942 年下半年开始征资本税。根据各种方法对不同集团进行了估算，对于非穆斯林少数民族尤其是有钱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商人来说，资本税是以没收的方式开征的，反抗者将受到没收财产、逮捕和押去强迫劳动等惩罚。政府原以为这是一项合法的紧急措施，却成了歧视少数民族的工具，因为他们在法律上并没有失去土耳其共和国公民的资格。这项措施后在 1943 年中旬取消，现被土耳其人认为是个羞耻的插曲。开征资本税是土耳其在战争年代发生的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或排外情绪的个别例子之一。

欧战结束后，土耳其再次面临北方邻国的威胁。土耳其在战争中得到风声，知道俄国人的意图，而战后缴获的纳粹文件证实斯大林曾在 1940 年 11 月要求希特勒同意俄国在军

事上有效地控制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以此作为纳粹——苏联进一步合作的代价。1945年春，俄国宣布它与土耳其在1925年签订的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为无效。与此同时，俄国可能发动一场直接对付土耳其的钳形攻势已很明显。俄军在1944年秋占领了接近土耳其西部边界的保加利亚；希腊共产党游击队大有席卷全国之势；在土耳其的东边，俄军占领了伊朗北部。俄国不但非法地将撤军伊朗日期拖到1946年，还在1945年下半年把讲土耳其语的伊朗西北地区划了出去，成立了阿塞拜疆这个苏联卫星国。俄国一直想得到在1918年丢失给土耳其的外高加索边界附近的领土，现在它提出了这一要求。这一系列行动的高潮，是1946年8月7日俄国要求土耳其修改国际会议关于管理海峡的条约，使海峡只受黑海国家（实际上是俄国及其卫星国和土耳其）控制，海峡的军事防卫由苏土两国联合行使。在英美强有力的支持下，伊涅纽政府称此举“不符合土耳其立权之不可转让性”，拒绝了苏联的建议。

关于海峡的辩论虽陆续进行了若干年，但它都停留在外交备忘录上。然而，俄国这些行动毕竟暴露了它对土耳其构成的潜在危险。英国在财政上无力担起继续援助土耳其和希腊的担子。因而在1947年，在所谓“杜鲁门主义”的口号下，美国开始向土耳其进一步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从此以后，支持土耳其独立和发展的积极美援项目就一直继续到今天。

在俄国构成外部威胁的同时，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使土耳其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政治变革，几年之内，结束了一党制。战时经济管制和物价上涨，不时引发人们对政府的极大

不满。商人要得到更多的做买卖自由，农民想挣脱谷物派捐，知识分子则对一党统治强烈不满，尤其在土耳其和其他民主国家一起批准联合国宪章的时候。为什么土耳其人就不能同样享有更完全的政治民主？1945年春，国民议会的4名议员巴雅尔、曼德列斯、科拉尔坦和科普鲁卢要求改革，在土耳其实行真正民主。当他们把这一要求公诸报界时，他们被共和人民党开除了。伊涅纽总统不同意党内有些人更加独裁主义的观点，提议取消对政治讨论所加的限制，以便形成反对党。1946年1月，上述4名持不同政见的议员建立了民主党，并开始为定于1947年举行的新选举做准备工作。

接着，在现代土耳其历史上，一个政治自由的时期来到了，人们激动地参加了辩论。当新成立的反对派将吸引更多投票者这一事实越来越清楚时，人民党政府把选举日期提前到1946年7月21日。民主党一方面大声抗议此举“不公正”，一方面继续在直到乡村一级的基层组织大力开展活动。这次选举使他们在465个议席的国民议会里得到了65席。民主党的最大力量在城市。倘使地方政府官员不向选民施加压力，倘使能做到公正的公开计票，民主党毫无问题能赢得更多的议席。但国民议会里毕竟有反对派的声音了。反对派要求在今后能严格做到公正计票，巴雅尔一度曾暗示，倘做不到这点，将采取更为激烈的手段。辩论非常激烈。

人民党政府起先打算镇压这个反对派。但有政治家风度的伊涅纽总统采取了超党派立场，他在1947年夏发表讲话，称多党制国家要求各党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应对各自行动负责，在朝党应尊重在野党的权利。从此，人民党政府的态

度逐步有所变化。总理一职也有变化，先是佩凯尔，然后萨卡，再是京纳尔蒂。至于取悦民主党的美国的想法对土耳其人有否影响，尚难定论，但 1947 年美国的经济援助确实加强了外交支持。总之，人民党政府不得不承认土耳其国内舆论趋向，特别得承认人们普遍要求更加开放伊斯兰教规，要求缓和人民党长期坚持的一些世俗化的规定。这在下一次的选举中便发生了作用，因为，许多目前不怎么受到抑制的宗教界领袖为了对前一阶段世俗化措施作出反应，似乎都转而支持民主党了。

1950 年，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受到两党赞同的新选举法。它规定由司法机关监督选举，秘密投票和公开计票。两党随即在竞选活动中使出浑身解数，争取选民。民主党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因为他们的对象自然是那些不论出于何种动机要求改变统治的人。1950 年 5 月 14 日，全国近 90% 有选举权的人进行了投票。选举进行得很有秩序，计票很公正。一位土耳其人谈起他乡下的情况时说：1946 年选举时，计票人奉命不让人看到计票牌，并得保证让这个党获胜；1950 年不同了，计票牌挂在公众面前并当众计票，于是，这一堆票属于艾哈迈德，那一堆是穆罕默德，分得清清楚楚。民主党虽早为许多人预见会获胜，但胜利之巨大尚在预料之外，它取得了绝对多数票，约占总投票数的 53%。人民共和党获得 39% 的选票。由于选举制规定，每省选民只投一个候选人票或一张全省议员候选人名单的票，而这些人往往是一个党的，因此，各党得票总数与国民议会议席分配的比例很不相称。民主党获得了 396 席，人民党只占 68 席。

1950 年发生如此现实的政治革命，是土耳其社会变革的一个反映。民主党投合了一大部分心怀不满的人的心意，人民党却很晚才注意到。民主党在许多农村地区力量很强，因为村民们找到了可以申诉他们意见的组织。在新议会的议员中，专业人员尤其是律师和企业家所占的比重，是前所未有的。相反，现职官员、官僚或军事人员出身的议员所占比重大为减少。在人民党将政权和平地转移给民主党之后，这场政治革命就圆满成功了。没有发生军人干涉，伊涅纽下台成了反对派领袖，巴雅尔当选新政府总统，曼德列斯出任总理。这在土耳其历史上是空前的。从此，开始了 10 年民主党政府时期。

1950 年前，两党在对外政策上没有真正的分歧，民主党上台后，也继续如此。从根本上说，土耳其的政策是对美国及西方国家友好，对俄国和共产主义集团冷淡。1950 年联合国号召出兵朝鲜，土耳其立即响应。土耳其旅在朝鲜战场上以作战勇敢著称。土耳其一贯高度重视军人品质，认为这一共同行动表示了它和西方建立起真正伙伴关系，所以在同时期提出参加北大西洋条约集团的要求被否决之后，他们感到非常难受。但北大西洋条约国家经过重新考虑，1952 年，土耳其和希腊一起被接纳为这一同盟的正式成员。土耳其港口伊兹米尔还是北约东南欧司令部总部所在地。50 年代中，土耳其和两边邻国缔结了防御性军事同盟。1954 年缔结了土耳其——希腊——南斯拉夫同盟。同年签订了土耳其——巴基斯坦协定，为建立对付俄国的所谓“北层篱笆”防御系统铺平道路。这个新防御系统的关键，是土耳其在 1955 年和伊拉

克的结盟，即巴格达条约，不久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亦加入了这一条约。大力推动这一条约签订的美国却没有参加，不过，它后来成了巴格达条约组织各种委员会（包括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签订这些条约部分可解释为土耳其紧跟当时美英“签约结盟狂”战略，尽管如此，它确实反映了土耳其政策的三个基本点。第一，土耳其渴望维持现状与和平。值得一提的，是1922年以来除在联合国旗号下在朝鲜打过仗以外，土耳其没有进行过战争。这样长时间而不中断的和平，是奥托曼王朝建立以来所没有的。第二，签订这些条约表示土耳其认识到俄国——不是俄国的共产主义，因为南斯拉夫也是共产主义国家——是土耳其安全的最大潜在危险，其根源可上溯两个世纪之久。第三，为了贯彻实现前两点，土耳其渴望与一切可能的邻国建立良好关系。

但就有些邻国而言，实现第三点颇为困难。叙利亚和土耳其关系从未好过，而大多数阿拉伯政府，除伊拉克外，一般都不支持土耳其，部分原因是土耳其承认以色列。纳赛尔统治下的埃及尤其不支持土耳其。就土耳其人而言，他们一般不怎么瞧得起阿拉伯人，因为阿拉伯人曾当了400年奥托曼帝国的臣民。1958年巴格达发生了推翻亲土耳其的伊拉克政府的革命，巴格达条约失去了它仅有的阿拉伯成员。巴格达条约组织即改名为中央条约组织，把总部从巴格达迁至安卡拉。

不久，土耳其与希腊的友好关系也受到干扰——这次是塞浦路斯问题。该地希腊族人反对英国统治的恐怖主义活动

使土耳其警惕起来，这不仅是它关心占该岛人口 1/5 的少数民族土耳其族人的安全，更重要的，是岛上希腊族人的活动有可能危及土耳其本身。倘使离土耳其海岸只有 50 英里的塞浦路斯和希腊合并，包括爱琴海岛屿的希腊领土将形成对土耳其的半圆形包围圈。所以，土耳其希望在英国结束统治后，分割塞浦路斯。在这种情况下，1955 年 9 月的一个偶然事件便煽起伊斯坦布尔一场大规模反希腊人的骚动。土耳其政府也许对示威者采取了容忍方针，但骚动确实已无法控制，城里希腊人的财产遭到了一场浩劫。塞浦路斯问题和这场骚动大大削弱了土耳其和希腊及南斯拉夫根据巴尔干条约建立起来的联系。直到 1959 年伦敦协定，土耳其和希腊的良好关系才得到恢复，伦敦协定的参加国除土耳其和希腊外，还有英国，协定规定塞浦路斯应予 1960 年独立，由一名希腊人担任总统，一名土耳其人为副总统，政府成员中，希腊人与土耳其的比例为七比三。希腊与土耳其的军队仍驻塞浦路斯，英国保留它在岛上的基地。

民主党统治期间，经济问题比外交更不好解决。两党在经济政策上，存在着实质性的分歧。人民党主张国家主义，民主党要放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使私人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发挥积极性，以及集中力量发展农业。在民主党整个统治的头 5 年即 1954 或 1955 年前，土耳其经济发展颇为迅速。由于天公作美，谷物丰收，全国显然一派繁荣。但这与民主党宣布的发挥私人积极性的政策，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事实上，新政权继续甚至增加了政府在工农业经济发展方面的开支。政府不害怕出现年度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因进口一贯大于

出口。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大都由美国提供的经援和军援帮助解决，它支撑着土耳其预算的一大部分。

后来，批评者指出，大部分经济发展虽有实际好处。但代价太大，计划不协调，有些甚至是不经济的。新工业的布局有时完全出于政治或战略上的考虑，而不严格按经济规律办事。所谓农业现代化的标志——拖拉机都是大量的进口货，在农场规模不大的情况下，这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外汇，而且还得不到合理的使用。此外，维修和保养也是个问题。渴望获得消费品的心理在城乡都纷纷有所反映，推动了物价上升。50年代后期，巨额赤字和逆差居高不下，经济形势日益严峻。到1957年，人们承认经济危机已是现实。获得大部分农民选票和津贴农业的民主党不愿用开征农业所得税来解决这个问题。1958年，一笔可观的外国贷款使严重的经济困难有所缓和，但必须施行更严格的货币控制，紧缩进口，致使有些必需品如咖啡丸在市场绝迹。

在1950年竞选中，民主党呼请给予支持的，不只是要求经济自由那部分人，还有一部分希望在传统宗教仪式方面有更大自由的人。民主党控制的国民议会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恢复用传统的阿拉伯语而不是1933年以来硬性规定的土耳其语来宣布祈祷开始。这个决定恰好在伊斯兰教历斋月开始的那天作出，通过电报传达到各省官员，受到群众的欢迎。在初等教育中，宗教课有了一定的地位，开办了培训领导穆斯林祈祷的学校，愿意去麦加朝圣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外汇。在政府采取这些比较审慎行动的同时，去清真寺的人增多了，宣传伊斯兰教的小册子和图书大量出版，修建和新建了许多

清真寺。有些宗教热具有反动倾向，蒂雅尼教派活动的突然兴起尤可作为证明，该教派成员在反对“偶像崇拜”运动中捣毁了少数阿塔图克塑像。依然忠于世俗共和的政府严重注意事态的发展，逮捕了一批蒂雅尼教派头子入狱。

50年代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至今仍在争论的问题是：穆斯林感情的兴起是政治和宗教的反应，还是宗教的真正复活或者只不过是长期存在的宗教情绪的公开暴露，这种情绪在人民党坚定的世俗化统治下，受到了压制。后面一种看法也许最接近现实，虽然同样清楚的事实是，一部分过着世俗生活的土耳其人开始觉得需要崇信宗教以及需要有宗教基础的道德观念，对这些人来说，这也许就是复活。土耳其大部分人仍在农村，阿塔图克的世俗主义对他们的触动远不及城市，所以，1950年以后，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一如既往，甚至更加公开。

民主党统治10年内，政治气氛也有巨大的变化。1950年的选举使政权由一个政党转移给另一政党，此后不久，全国出现了政治“蜜月”时期。土耳其人均称道这短短几年政治上的自由。但不久即有迹象表明，民主党人认为反对现政府应受到谴责，在这方面它不亚于人民党。人民党相当一部分财产据此被没收充公。当然，这样做也不无道理，因为这是人民党在一党制时代使用公共资金非法获得的。此外，政府封闭了人民党在地方上的党部。民主党控制的议会通过一项法律；严惩刊登有可能危及土耳其安定的失实报道。但民主党仍不失为最受拥护的政党，尤其在繁荣的50年代初。1954年的选举做到了完全自由和公正计票，使民主党的总得票率

增加到 58%，取得 503 个议席，而人民党的得票率仅为 35%，占 31 个议席。

议会中多数席位的增加以及经济形势的恶化使民主党政府朝着更加独裁的方向走，即便党内有人反对。28 位民主党议员脱党另组新党——自由党。但 1956 年通过的另一个新闻法增强了政府对舆论的控制。民主党对于批评非常敏感，甚至过份敏感。但 1957 年选举的结果，使人们对民主党的批评达到顶点。政府虽从未公布投票数字，但先前压倒多数的地位已下降到 48%，不过，根据单一选举人制度，民主党仍占 424 个议席。人民党的得票率增加到 41%，获得 178 个议席。投票公正进行，但反对党指控当局在有些场合使用了不公正的计票和读票的手法。由于政府的日益独裁倾向和压制反对派，就引起了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土耳其真能容纳政治上的反对派吗？难道多数党必然蔑视少数党权利，只认自己是国家利益的唯一合法代言人？

待到 1959 年，土耳其内政已相当不稳，虽然民主党尤其是曼德列斯在农村仍显然很受拥戴。但经济上的困难和政治上的压制，以及一部分知识分子担心宗教活动的增加将使阿塔图克的大半政绩付诸东流，这种种原因使得人们的不满情绪化为对政府的不断批评。

受到这些影响的是军官。通货膨胀使这些拿固定收入的军官的购买力越来越低。作为思想界的一个阶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军官曾出国受训，在接受美援的军队中，军人和西方多有接触——他们担心土耳其共和国世俗化进步会受到破坏。在阿塔图克缔造共和国时，军队阶层当然起了很

大作用，许多人把自己看成是阿塔图克传统的捍卫者。此外，在共和国建立之初，军队都在关键时刻干预了政治。随着共和国的发展，军队逐步和政治生活分离，至 1950 年，他们已毫无疑问地服从文官政府。但军官仍保留一种政治意识。土耳其新中产阶级的出现使军官在国内的重要地位黯然失色，这一事实也许刺痛了一部分军官。

1954 年左右，一小部分军官集团先在伊斯坦布尔，然后在安卡拉开始聚在一起议论政治形势。到 1957 年，有些人曾考虑发动政变。有人希望伊涅纽出面领导，被伊涅纽严词拒绝。但地面部队司令员古塞尔和一些校官及其他军官愿意出来担任必要的高级领导职务。他们觉得，民主党如不下台，1959 年春政治辩论中出现的暴力行动有可能发展为内战，并决定，倘 1960 年选举再不能公正进行，他们将发动政变。但政变一旦成功。今后政府应如何行动，他们并没有统一的认识。

1960 年确实发生的不流血革命的起源和动机，至今仍不清楚。但那年春季形势之紧张则十分明显。尽管曼德列斯和伊涅纽两人都在全国旅行并在实际上发表竞选演说，可选举日期始终未定。有的人说，民主党曾试图压制反对派。4 月 2 日，部队奉命去开塞利附近，阻止伊涅纽火车通行。部队确实封锁了铁路，但这位 40 年前即已闻名全国的帕夏步下火车，径直朝部队走去，官兵们急忙让路，并向他举手敬礼。曼德列斯的错误在于他以为可以要部队履行此种政治上的职责，以及他应该发出更为严重的警告。同月，民主党控制的议会经过一场激烈的以全武行告终的党派辩论，设立了一个

调查人民党行动的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被授予特权，可以禁止政治活动，没收文件，查禁报纸以及逮捕违反上述和其他规定的人。这就触发了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大学一系列学生示威，5月21日，同时发生了安卡拉军校学员的反政府示威。

这一紧急局面，使政变者无法再推迟行动。5月27日拂晓前，陆军控制了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逮捕了曼德列斯及其他官员。至于曼德列斯及其同事和调查委员会对政变计划或人民党所谓革命倾向究竟知道到什么程度，仍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调查委员会虽在5月25日宣称已完成调查任务，但从未公开过调查报告。武装部队至少在那时获得了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人民的信任，他们认为一切都会很快走上正轨。政府被推翻的消息传出后，两城群众欣喜若狂。5月27日现已成为国庆日。

对于军人来说，总是夺权容易让权难。古塞尔将军虽希望经过一段很短的过渡时期，把政府移交给符合宪法的文官政权，但他做不到这点。他成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参谋总长。权力集中在他以及其他37位军官身上。这些人大都在40岁以下。他们是新形势下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控制着一个临时政府和由技术专家组成的非政治性内阁。不久，这个被称为民族团结委员会的38个人在所有问题上并非意见一致这一事实越来越明显了。其中，以蒂尔凯什上校为佼佼者的最年轻的14名军官于1960年11月被清洗出委员会。他们一般都比其他人更加激进，更加倾向对政府施行一段较长时间的独裁军事控制，以便迅速实现阿塔图克模式的经济与社

会变革。14人中有几位至今仍活跃于土耳其政界。

与此同时，一切政党活动都停止了。民主党被解散，民主党议员和内阁部长均以违反 1924 年宪法为由被捕受审。军人决定制定一部新宪法来改正旧宪法之缺点，尤其要防止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多数党独裁统治的重演。新宪法由革命爆发后几小时才从伊斯坦布尔大学出来的律师组成的委员会起草，后来，其他律师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1961 年 1 月到 6 月在安卡拉召开的制宪会议彻底改写了新宪法草案。最后定稿的新宪法规定得非常具体。它规定设立参议院和按人口比例选举代表产生的议会，而以往议会只设一院；设立监督立法的宪法法院；加强了关于个人权利的条款；确认阿塔图克时代重大的世俗化改革，除这一点外，其余都是新的。1961 年 7 月 9 日，新宪法提交全国公民投票票决，投赞成票的占 62%，反对者占 38%。该宪法从而成了 1876 年以来土耳其第 5 个成文宪法。

可是，公民投票的结果使民族团结委员会大失所望。投票者所要回答的问题实际上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宪法上的：他们是赞成还是反对临时军事当局的各项措施？或者他们是赞成还是反对曼德列斯先前的统治？至少有将近 2/5 的投票者显然仍支持曼德列斯。这时，民主党已不存在，对民主党领导人的审讯，正在马尔马拉海的亚西阿达岛上进行。但政党再次获准开展活动。当人民党号召人民在公民投票中就宪法问题投“赞成”票时，新成立的政党——它的成员有一大批前民主党人——却持相左立场。审讯 592 名民主党被告，这使他们和一部分受良好教育的上层分子声名狼藉，但对农民

显然起不了这种作用。经过将近一年的审讯，9月16日亚西阿达特别法庭作出判决：15名被判死刑，433名被处年限不等的有期徒刑。在15名死囚中，有12名包括前总统巴雅尔在内被减判终身监禁。包括曼德列斯在内的3名部长被绞死。关于审讯和量刑是否合法和恰当至今仍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促使民族团结委员会决定不减判曼德列斯，很可能是投反宪法的票太多了。由于他很得人心，他将是个危险人物。迷信的农民们早把曼德列斯当作神看待，因为他在一次去伦敦的途中，飞机失事，陪同他的15名土耳其官员统统丧身，他却因早走出机舱而安然无恙。如果他再一次死里逃生又会怎样？

五·二七革命后17个月，参议院和国民议会选举终于举行。1961年10月15日的计票牌上找不到哪一个党是多数派。参加竞选的有14个政党，有影响的大党只有4个。根据新的能正确反映民众投票的比例代表制，人民党在国民议会获173席，正义党获158席，新土耳其党占65席，共和农民国家党占54席。参议员仍按一省一席的多数票制产生，人民党只得了36席而正义党却占70席，其他两党分别为28席和16席。人民党未能做到绝对多数，而5月27日运动的一些热情支持者曾希望它能实现。相反，选举结果表明这将是联合政府。

1961年到1965年，土耳其在几个程度不同的不稳定的联合政府下过日子，对于近400年来只知多数党政府的共和国来说，这是个新的和令人不安的时期。两院选举古塞夫将军为总统，在当时，他几乎是民族团结的必需品，他卸下戎装就任总统职位。但内阁很难组成。为了使人民党和正义党

在 11 月组成以伊涅纽为首的联合内阁，必须施加军方压力。但正义党坚持大赦被判有罪的民主党政治家，无法一致。联合政府终于在 1962 年破裂。继后的两个联合内阁由人民党和一些小党或独立人士组成，均由伊涅纽出任总理，但都缺乏内聚力。

军人政府这段插曲虽维持了一年半左右，事实上政权还是根据军方先前的诺言，交还给了文官。这和大多数发生军事政变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变进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土耳其向人们表明，它选择的是选举自由的民主和文官政府。但 5 月 27 日革命对土耳其未来确实产生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一是武装部队是否觉得在紧急情况下他们仍需再次进行干预。许多军官把自己看成是进步统治的捍卫者，压根儿就瞧不起整天叽叽喳喳的政客，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缓慢步伐很是不满。1962 年 2 月，一部分怀有此种心情的年青军官曾试图发动政变。1963 年 5 月也发生过类似的未遂政变。1964 年下半年，总参谋长桑纳将军公开警告政党不要成为分裂的因素，不要唆使人民反对军队。因此，军队仍站在后台。二是能否在联合政府下实现政治稳定。多元政治已是土耳其政治生活的现实，但远非运用自如。政客的纵横捭阖和跨党行为，不仅为军官们所不齿，还招来了人们一大堆的冷嘲热讽。三是 1960 年革命所许下的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的诺言能否兑现。民族团结委员会在其短暂的执政年代里曾朝着这个方向开始行动，设立了一个经济计划机构，并把它写入 1961 年的宪法。它恢复开征某些农业所得税，并成功地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外国资本来土耳其投资。但在把政权交给文官时，它没有抓住

党派之争所提供的机会大幅度地推行这些方针。

塞浦路斯危机再次在 1963 年下半年发生,使土耳其的内政和外交都受到影响。马卡里奥斯总统在整个这一年里试图改变为土耳其、希腊和英国三方同意的 1959 年塞浦路斯宪法,以便削弱塞浦路斯土耳其人的政治权利,使他的统治问题有所缓解。12 月,岛上两部分居民发生战斗,这很可能使土耳其和希腊进行干预甚至引起更大规模的冲突。公布的材料并不能说明伊涅纽政府确实打算用军事干涉的方式,来保护塞浦路斯土耳其少数民族免受岛上希腊人的暴力肆虐,也不能说明美国代表在呼吁安卡拉维持和平方面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总之,土耳其没有干预,而是大力通过外交途径来结束这场战斗。马卡里奥斯只要求联合国出面解决,取消土耳其和希腊有按条约进行干预的权利。土耳其则主张在北大西洋条约联盟内部解决,或与希腊政府直接谈判,因这可在平等条件下讨价还价;而人数较少的塞浦路斯土耳其居民当然不可能和岛上占多数的希腊人平等地进行谈判。马卡里奥斯虽没有硬要建立一个塞浦路斯——希腊联盟,但他反复谈到这个问题,说这是个目标。因此,塞浦路斯和希腊联合的幽灵再一次出现在土耳其上空。土耳其于是再次提出,唯一可接受的解决办法是分割塞浦路斯以及由两部分组成的联邦。

1964 年 3 月,各方都接受联合国派出的一支和平部队驻岛 3 个月,此后,驻期不断延长。联合国部队沿着首都尼科西亚停火线守卫着一个中立区,并设法减少(虽不能防止)其他地区爆发战斗。根据联合国决议,塞浦路斯的领土完整得到了承认,但决议同时承认了希腊、土耳其和英国包括进行

干预在内的条约权利。土耳其定期重申这一权利，不定期地发出威胁说要使用这一权利来防止岛上出现的被它外长称为“灭绝种族的大屠杀”。希腊的答复是，土耳其入侵将引起希腊保卫塞浦路斯。这个根本问题虽不得解决，战斗确实停了下来，只有在间歇阶段才再起。1964年6月，约翰逊总统警告希土双方不要动武。他给伊涅纽的信件在1966年1月透露之后，这就成了一个土耳其内政问题。

只要土耳其不进行干预，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少数民族肯定会受到希腊人不断施加的压力。伊涅纽的对塞政策在1964年6月只获得国民议会200票对194票的勉强信任。土耳其和它在北约的伙伴希腊之间的关系当然极为紧张，而在安卡拉把驱逐在伊斯坦布尔的希腊公民作为报复措施实施后，两国关系更加恶化。1964年春，土耳其开始驱逐希腊人，并持续到1965年。希腊方面则派出士兵和志愿人员偷偷地加强塞浦路斯的希腊族武装部队，继续向岛上的土耳其族人施加压力。

1964年8月，出现了新的尖锐冲突，当时土耳其飞机扫射了塞浦路斯北部海岸地带，因为那里的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在联合国调停下，实现了停火，但马卡里奥斯定期在土耳其这一端或那一端施行经济封锁，直到联合国代表迫使土耳其停止其军事行动。俄国通过埃及向马卡里奥斯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1964年秋，岛上战斗再次停止，但根本问题仍不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得到解决。1965年，土耳其反对联合国调停人帕拉查的看法，即认为可以直接在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之间谈判解决这一根本问

题。土耳其仍坚持与希腊直接谈判的立场。1967年11月，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向土耳其族人发动了一场新的进攻，再次引起土耳其入侵的威胁。只是在美国和联合国的调停下，这场冲突才得以避免。当时，雅典同意从岛上撤出许多非法希腊部队，安卡拉答应同样撤出少数非法土耳其士兵，但塞浦路斯局势在1968年依然不稳。

群众经政府鼓动，情绪激昂，在这种情况下，塞浦路斯问题大大影响了土耳其与除希腊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关系。好多城市兴起了反美活动，激进的学生团体尤甚。1964年夏，发生了一系列反美示威，此后几年还不时有此类活动^①。多数土耳其人对美国仍很友好，但感到悲哀，迷惑不解。他们要问，为什么美国不像它在朝鲜和越南那样来支持在塞浦路斯进行的这场争取自由和人权的斗争？为什么它不特别支持这个在朝鲜战场与它并肩作战的国家？倘使肯尼迪仍是总统的话，美国会不支持土耳其吗？塞浦路斯问题触发了这一连串问题和示威，但这也是一个信号，说明人们普遍觉得美国在土耳其的影响太深。美国的经援当然重要，但土耳其难道就应该只靠一个援助来源过日子，只听从一个外国政府关于什么是对土耳其有好处的技术性劝告？美国在土耳其的影响尤其是它的军事影响如北约分遣队、基地、军事顾问团等实在太明显了。根据1960年的普查数字，在土耳其的美国人共16000人。左翼反对美国商业公司特别是在土耳其经营的石油公司的呼

① 应当指出，雅典和塞浦路斯同样发生反美示威，双方都指责美国对它们不够同情，援助不足。

声越来越高。部分为了安抚这些抗议者，部分是向俄国作出一种姿态，土耳其政府在 1966 年撤出了它在朝鲜的一支派遣部队。

在维持北约同盟以及与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密切联系的同时，安卡拉政府开始奉行有点更为独立的对外方针。对苏联提出的建议——现在采取的是更加温和而不是强硬的立场——响应之多是 30 年来所没有的。1964 年，土耳其一个议会代表团访问了俄国，俄国的一个议会代表团于 1965 年回访了安卡拉。1964 年，签订了俄土贸易协定，并于 1965 年和 1967 年加以补充。土耳其接受了俄国贷款以及对一些工业项目的咨询。1964 年秋，土耳其外长埃尔金访问了莫斯科，这是 1939 年不走运的访苏之行以来第一次这样的访问。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 1965 年作了回访。同年，继任伊涅纽为土耳其总理的吕居普吕访问了莫斯科；俄国总理柯西金于 1966 年访问安卡拉，然后德米雷尔总理在 1967 年访问了莫斯科。通过这些互访，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立场得到了俄国方面在外交上有节制的支持。葛罗米柯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向安卡拉保证，他们赞成在一个独立的塞浦路斯国家中，保护两部分居民的权利。但这一切都不意味着土耳其脱离西方。它知道苏联集团正把武器运给马卡里奥斯，它仍然需要美国的友谊和帮助。它对 1964 年底被接纳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很是高兴。但它的对外政策则作了一番相当大的再检查。

与此同时，人民党占统治地位的伊涅纽联合政府为另一个新政府所取代。1965 年初，伊涅纽第三届联合政府在议会投票表决预算时被推翻下台。在新领袖德米雷尔领导下的正

义党在这次倒阁行动中起了主要作用。正义党和其他 3 个小党组成了以非党派人士领袖吕居普吕为首的联合政府，德米雷尔出任副总理。伊涅纽和人民党成了反对党，这是人民党自 1961 年以来第一次成为反对党并以反对党的身份准备参加新的竞选。竞选运动有 6 个政党参加。人民党的拉票对象一如既往，主要是老的官僚阶层、军官、城市知识分子、地方显贵和大地主。正义党则对土耳其社会新兴分子有号召力，他们是自耕农、成长中的商业和工业中产阶级、城市工人以及新近迁入城市的乡下人。

在竞选活动中，各党派就以下这些问题展开了认真的讨论：土地改革，经济发展，对外政策，甚至还讨论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除代表宗教和社会保守主义的民族党以及赞成独裁政府以加速发展和改革的极右派共和农民国家党外，还出现了土耳其劳工党。这个公开宣布为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政党同样有独裁倾向，它由城市知识分子领导，但希望获得劳工乃至农民的支持。这个政党的存在及其提出的纲领影响着其他政党。人民党便稍稍偏左，即伊涅纽的所谓“中间偏左”。正义党则一心一意维护自由企业和外国在土耳其的投资。

在 1965 年 10 月的选举中，人们预期将出现一个以正义党为首的多元化政治格局，但正义党不可能获得多数选票，因有 6 个政党并存。可结果却是：正义党得到了绝对多数的选票，即 53% 的选票，堪与 1950 年民主党的巨大胜利媲美。共和人民党不尽如人意，得到 29% 的选票。劳工党仅获 3% 的选票，成绩之差也使预测家大惑不解。正义党证明它确实是

个有群众基础的政党，地方组织很强，正义党继承的不仅是被取缔的民主党的外表，还有它的实质。根据新的比例代表制，正义党在议会占 240 席，人民党是 134 席，劳工党位居第五，得 15 席，但这是第一次可以在议会中听到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者的声音。

新总理德米雷尔组成正义党内阁后，联合政府随即消失。德米雷尔是个新型政客，和坦泽马特时代的阿利帕夏以及新土耳其党人时期的泰拉特帕夏相同，他们都出身寒门，然后出任辅征大将军和总理。不仅如此，德米雷尔还是个管理工程师，有一些经营私人企业的经验，并在美国短期学习过。他年轻、现实，是党内的温和派。

德米雷尔的第一个任务是向人们证明，正义党能负责任地进行统治。他做到了这一点——虽未取得陆军将领的支持，但至少使他们保持中立。陆军领导人不必因他们在 1960 年推翻曼德列斯政权而害怕正义党进行报复。^①他还得到了前将军古塞尔总统的支持。德米雷尔抑制了党内右翼，继续维持亲西方的方针并和俄国谋求缓和，他还稳定了政府以便改善经济。当古塞尔身患重病，无法履行总统职责时，他的继承人总参谋长桑纳当即被选为总统。桑纳和古塞尔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土耳其独立战争年代有经验的士兵和温和派人

① 1967 年 11 月当人们计划在埃于布清真寺为曼德列斯遗体举行重新安放仪式时，曼德列斯在土耳其群众中依然有很大影响这一事实便显露无遗。这次仪式很可能成为在实际上谴责 1960 年革命的一场大规模示威。左右为难的正义党政府最后下令禁止举行这一仪式。

物。他辞去军职，进入参议院，然后以参议员身份于 1966 年 3 月当选为总统。绝大部分在 1961 年被特别法庭判决入狱的民主党人，分别在 1964 年和 1965 年获得赦免。桑纳上台后，立即赦免了年迈的民主党前总统巴雅尔。桑纳出任总统是政局稳定的另一个迹象——军队是共和国的卫士，但超脱日常政治。

即便如此，1965 年选举仍然暴露了影响土耳其今后稳定的一些问题。第一是社会主义的作用问题。有些知识分子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比实施迄今往往效率不高的混合经济更能使国家有希望。他们认为与阿塔图克年代的文化民族主义或曼德列斯统治初期的自由主义相比，社会主义是一种更加有建设性的意识形态。劳工党迄今是知识分子的产物，吸引不了城市工人。那么，今后特别是在国家不能使经济有较快发展的情况下，它会不会发展壮大？另一个问题涉及多数派独裁——正义党在获得巨大胜利后，会不会像曼德列斯政权那样，情不自禁地镇压政治上的反对派和个人自由？1966 年和 1967 年，正义党严厉制裁了一部分左翼作家，并提议采取措施，取缔右翼和左翼的极端分子出版物。正义党能不能和这部分知识分子达成和解——这些人担心正义党将迎合全国小城镇和农村多数人的物质的有时是蒙昧主义的要求来牺牲实实在在的西方化进步。当 1967 年春人民党分裂时，这些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伊涅纽和人民党的多数派坚持阿塔图克先驱者的原则，采取更为偏左的立场。约有 1/4 的人民党议员便与之决裂，另组新党。这至少在这个时刻大大缩小了作为主要反对党的阵地。但正义党政府在 1968 年并没有实行

独裁。

因此，在 60 年代后期，土耳其仍是一个向前看的国家，有着美好的未来。与中东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它相当进步。它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这只有土耳其人最清楚。但主要问题也许在于如何把经济推动起来，因为，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政府能否做到不负众望？它能不能推动土耳其前进？

土耳其是个有将近 30 万平方英里面积的国家，相当于英法两国的总和。它最主要的资源是土地——农业和木材。全国有 3/4 左右的人居住在农村和不超过一万人的城镇，他们仍从事农业劳动。农业生产近来逐年增加，但大都被人口的增长抵销掉了。根据 1927 年的普查，全国人口为 13,648,000 人。1960 年为 27,755,000 人，1965 年为 31,391,000 人。1950 年到 1960 年的人口年增长率几为 3%，幸好此后有所放慢。即使如此，政府在 1966 年仍颁布了大规模的控制生育计划。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似，进口工业产品既满足了人们的消费期望，亦是进一步发展经济之必需，它必然会使出口增加。但目前的贸易收支还不平衡；而且，外债一项就收去了出口所得的 1/3。增加出口大部分得靠农业，它需要更现代化的方法并教会人们使用这种方法，需要扩大新的灌溉技术，种树植林，防止土壤侵蚀。烟草和棉花是最能赚得外汇的，但土耳其不想再靠这两种作物过日子。和许多中东国家不同，土耳其并不缺少农业土地，但中部平原降雨不均迫使政府采用新方法，防止丰年之后出现荒年。无地农民和佃农需要自己

的农场，同时得避免把它们分割成为不经济的单位。整个土地改革和分配问题得慢慢地解决，60年代后期对这个问题重新展开了辩论。还有一个农村失业问题，这是数百年来每年都发生的老问题，但由于农业的部分机械化而更加严重了。地方工业当然需要这部分劳力以增加国家产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许多农民举家迁至大城市边缘的贫民窟占地住下，他们想在大城市找到工作，但经常失望，这就造成了一个社会和经济问题。他们之中许多人和其他土耳其人在西欧，尤其在西德找到了工资待遇丰厚的工作，1965年在西欧便有135,000人。土耳其人干得很不错。他们从德国带来了磁带录音机、汽车，有时还有拖拉机以及新的享受物，其中还有人带来了德国妻子。他们把一部分国外收入汇回家里，大大有助于减少土耳其的收支逆差。

在共和国领导下，工业化虽有所进展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土耳其拥有某些很有价值的矿藏资源，开采的不多。东部油田产油量不高，还满足不了国内需求。1963年开始的5年发展计划执行结果很好，人们寄更大希望于1968年开始的第二个5年计划。但政府对工业发展的资助必须与私人投资的相应增加相合拍。60年代，私人投资确有增长。但土耳其的新中产阶级对于长期经济发展缺乏信心，他们倾向于把资本投向商业、建造公寓或其他的传统事业，确保迅速收回资本，不大肯在工业和制造业中投资。

土耳其中产阶级的出现是土耳其社会变化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在奥托曼时代，土耳其人大多是政府官员、士兵、伊斯兰教学者，农民和工匠，商业、银行和工业管理等工作大

都由基督徒和犹太人等少数民族或由外国人从事。到了共和国时代，这一切都起了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变化尤其迅速。现在，土耳其商人和企业家阶级正在兴起。有些人在事业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们的利益往往和官吏以及军官等传统统治集团不同。

此外，还有一支目前人数虽少但正在成长的产业工人队伍——一旦允许它组织起来，就会发挥作用。1960年革命以后，法律承认了罢工的权利。60年代中期，罢工纠察线和罢工标语牌已非罕见，例如1964年发生了87起小规模罢工，说明土耳其存在着极低的工资收入者。不过，新成立的土耳其劳工党仍未能取得这些工人的大规模支持。

土耳其的社会基础仍由农民组成。无线电和高速公路使农民和城市更加接近了。参军使得农家子弟看到了另一个世界，还使他们识了字。能读完大学预科的人，就可以跻入新的社会阶层。但城乡之间在思想和心理上的差距依然如故。自1950年农民发现选举有如此这般力量以后，这一差距便有了政治上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1960年革命是传统的上层分子对于民主党政权的抗议，因为民主党偏袒和加速这种农民力量。因此，城市和农村小镇双方在思想上的差距能否成功地填平，这将是土耳其的一个重大问题。兴办更多更好的学校似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根据1965年普查数字，土耳其7岁以上的人仍有50%是文盲，大部分在农村。

城乡差别的另一个标志，是对宗教的态度。城市虽保留着大清真寺和伊斯兰教图书馆，但一般倾向世俗主义。农村则更倾向宗教，虽说这种宗教往往是正统的伊斯兰教和一般

性的宗教仪式以及民间宗教的混合物。50年代民主党靠农民支持上台，这件事表明阿塔图克的世俗化措施从未在农村得到过彻底贯彻。一部分城市知识分子担心宗教作用将东山再起，当它形成政治力量后，将危及共和国的进步改革。他们甚至谈论在其他国家发生过的可能性，即被他们称为“黑色力量”的宗教作用将在政治上和“红色力量”——指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从而葬送共和国。共产主义在土耳其的信仰者寥寥无几，虽然有些社会主义者会被吸引过去。但黑色力量仍是一股潜在势力。

1965年发生了一件事——必须说明这纯属罕见，但值得深思，它使人们想起了1930年的库比莱事件。在伊兹米尔地区的一个农村，有几位受过教育的新上层分子教员，遭到一群居民的殴打，起因是这几位教员打算在学生中发起一场足球比赛。时间正好在斋月。一位被居民们请来主持斋月的伊斯兰教士鼓动居民们去清真寺，教士向他们宣布，足球比赛是不虔诚的。一位教员因此差一点被杀死。当地行政官员无法平息这场骚动，相反，骚动越来越激烈，当局不得不出动警察和部队前去镇压。这件事经报刊广泛报道后，引起土耳其人的深思：怎么可能在1965年的共和国发生这类事？

可是，土耳其还得解决许多问题。自阿塔图克逝世以来，它已走过了一长段路，而自阿塔图克建立新国家以来，它走过的路更长。现在，国家主权已不成问题，共和已是事实。土耳其人似已决心发挥多党民主，西化的步子始终没有停顿过。宗教并没有消亡，它也不会消亡，但蒙昧主义确已减少，虽说偶尔还有诸如足球事件之类的插曲。世俗的法律和教育业

已确立，而且，造就了一个土耳其民族来填补这个新土耳其国家。诚然，从根本上说，土耳其人仍认为伊斯兰教和土耳其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他们不可能想象有非穆斯林的土耳其人，即便承认非穆斯林可以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公民。但作为整体，土耳其人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震撼奥托曼帝国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土耳其人民恢复了主体感和目的感。老枝发新芽，新芽已长为枝茂叶盛的大树，葱郁洵润，一派生机。但成长意味着新的问题——保持经济发展，改造社会，陶冶个性以及在解决问题时不摒弃民主程序和政党政治。在共和国领导下，土耳其民族已踏上征途，掌握起自己命运。它不可能照抄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只会沿着自己的道路向前发展。正如阿塔图克所云：“我们只像自己。”